

中德學會特刊之八

俾

斯

麥

楊宗翰署



15/10

Deutschland-Institut. Sonderreihe Band 8

中德學會特刊之八

B I S M A R C K

俾 斯 麥

VON

ANDREW DICKSON WHITE

懷 特 著

Übersetzt von

TS'AO CHING-SHIH

曹 京 實 譯

Peking
1943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初版

中德學會 特刊八
俾斯麥
Bismarck

每册定價捌圓(北幣通)

外埠酌加匯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原著

Andrew Dickson White

譯者 曹京實

發行者 中德學會

編輯者 中德學會

印刷者 京華印書局

著者小傳

懷特 (Andrew Dickson White) (一八三二—一九一八) 爲美國歷史家及外交家。一八三二年十一月七日生於紐約州之荷默爾 (Hammer)。一八五二畢業於耶耳 (Yale) 大學。一八五四—五五在聖彼得堡爲美國公使館參贊。一八五五—五六就讀於柏林大學。一八五七—六三爲美國密其干大學 (University of Michigan) 歷史及英國文學教授，後於一八六三—六七在該校專授歷史。

他曾計劃建立一個大學。這個大學要具下列各特點：(一) 延攬各種學科之教授，使該校對於一切學科均加研究；(二) 有豐富的圖書館，博物館，及壯麗的樓房；(三) 不受任何黨派及宗教派別之支配；(四) 男女學生兼收。後來受到科內爾 (Ezra Cornell) 等人的資助，他所夢想的大學果然在綺色佳 (Ithaca) (紐約) 成立了。他曾爲現在的科內爾大學的第一任校長，曾將全部精力及大部金錢用在該校。

他曾代表美國參加去三多明各共和國 (Santo Domingo) 之委員會，又曾出席委內綏拉 (Venezuela) 邊界委員會。於一八七九—八八代表美國去德國，一八九二—九四去俄國。一八九七—一九〇三爲美國

駐德大使。一八九九爲出席海牙和平會議 (Hague Peace Conference) 之美國代表團團長。

在德國耶拿大學 (Jena) 他曾得過博士學位，也曾爲普魯士王廷學術研究院——即今之普魯士學術研究院——的會員。

他的最著名的著作爲：The History of the Warfare of Science with Theology in Christendom (一八九六) 及 Seven Great Statesmen in the Warfare of Humanity with Unreason (一九一〇)。
本書即由此書譯出。

譯者序

在十八九世紀，德國有兩個關乎國家存亡的問題，一是排除拿破崙的侵略，一是統一全德國。由這兩個問題，產生了德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家石太因（*Stein*）及俾斯麥。而這兩人之中尤以俾斯麥的作風最具膽略，最有彩色，最富戲劇性，故他統一德國時所用的苦心，魄力，手段都極動人。

世界上許多國家在建國歷程中都遇到困難。表面的光彩，或有不同，而骨子裏則往往大致相似。其事蹟多是鐵血交織，令人憤泣的，所以最能引動人類的正義感。美國歷史家及外交家懷特氏便是本着正義的觀點，以動人的筆觸，深透的目光，忠實的材料，將德國歷史上偉大的鬥士處理國難的血汗，靈魂，面目，及其缺點，映現在我們眼前。這部書的總名為 *Seven Great Statesmen in the Warfare of Humanity with Unreason*（一九一〇）。由這個標題可見著者的苦心及其文章的價值了。

現在我們一提起德國，立刻湧現出一個武力強勝的影子，其實在歷史上，她所遭受的壓迫與侵略會幾乎到了亡國的地步。她曾將萊茵河以西各邦及一千六百萬人口割歸法國。她曾被追允許法軍在普魯士自由通行。因為法國欺壓太甚，於一八〇八年十月八日與法開仗，但在幾星期之內，便在耶拿（*Jena*），

奧爾士大特 (Auerstädt)，賽費爾得 (Saalfeld) 被拿破崙軍打得大敗。當戰勝者拿破崙得意洋洋進柏林城時，德國市民竟爲之喝采——可見德人愛國情緒低到了怎樣地步！在普國的老王宮中，拿氏向普國提出最嚴酷的條件；在普國國境之內，法國駐大批軍隊，佔據大部分曠地；使用普國的土地金錢，就如同自己的一樣；普王 菲得利·威廉 第三退在遼遠的西北角上；勃蘭登堡門 (Brandenburger Tor) 上表示凱旋的四輪兵車與馬匹及帶翅的勝利之神的銅像曾被法軍取走送回巴黎；普商 柏爾穆 (Palm) 因有一本愛國小冊子便被法軍捉抽處死；一般王子顯貴紛向拿氏獻媚，希求官職。普國滅亡，真是間不容髮，就在這個時機，幸而有石太因，哈敦伯 (Hardenberg)，沙恩赫斯 (Scharnhorst)，格耐色 (Gneisenau) 等志士，起而改良內政，外交，軍事，抗戰到底，百折不屈，卒將法軍逐出，而爲俾斯麥立下統一全國之基礎。這是在俾斯麥以前的德國大略情形。

德國第二個大問題是統一。當十八世紀之末，在德意志境內有三百三十多個大大小小的國家。德皇等於虛設，對這些小國並無統轄權。這些小國各自獨立，各有自己的權利不受皇帝干涉。這些國大約可分三類：(一)以正式王公爲首領的國家，(二)以武士爲首領的國家，(三)由中古傳下來的獨立城市。這些國家之中以奧地利及普魯士爲最強，其次爲巴燕，薩克森等國，其中極小的國祇有幾十里地。各國之

聞不但政治獨立，就是關稅也是分開的。所以德國的統一便成了最嚴重的問題。當時南德意志與北德意志互相仇視，法奧又極力阻止德國統一。本書便細細寫出俾斯麥爲統一德國所下的種種工夫，種種策略，及在外交，在軍事上是怎樣的預備與實行。自他登政台之後，幾乎每個身段都有光有彩，但是給我們印象最深的是他自從認定以普魯士作爲統一德國的領袖之後，他思想之精密，手段之敏捷，態度之沉着，氣魄之勇猛諸點。他什麼都不怕，可是絲毫不莽撞，對一個問題往往有許多年的研究與實地的觀察，有充分的認識與十二分的準備，然後才舉手一擊，一擊必成。而成功之後又能以遠大眼光看清事實，絕對不意氣用事——他戰勝奧國時，國王，大將，人民，兵士，甚至他的夫人小孩都願普軍堂堂闖入維也納，給奧國一個大羞辱，給普魯士在勝利的榮譽上，再加一個花冠。然而主戰最力的俾斯麥，竟出人意料，堅決反對。甚至有人說他因爲反對進軍維也納而得不到國王與將軍們之諒解要跳樓自殺。這種爲國深謀的遠見與魄力，真真動人！當然他也有不能被人原諒的缺點，有應受攻擊的行爲，不僅不是十全十美，並且因他對於民衆之敵視，及思想之反動，還要受到後世的嚴厲指責，可是比一般以「看風使船」，「圓滑」，「巧得民衆」，爲從事政治事業的不傳之祕的政客使天淵相隔了。所以這本書，也可以說牠並不是僅僅歷史而已。這裏沒有空洞的政治理論，虛誇的描述，每字句都是活鮮鮮的事實。著

者筆下雖然沒有火，但是字字句句都充滿燎人的火花！

著者曾為美國駐德大使，與俾斯麥相處甚久，此中材料多是親見，親聞，親經，故對於俾氏這樣複雜多面的角色能有如此的深透的分析。這是著者對於歷史的一件珍貴的貢獻，譯者以此文向國人介紹，頗感快慰。

不過本書在許多好點之中似乎有一點應稍加補充，就是俾斯麥所以統一德國的最有效力的武器 Zollverein（關稅同盟）在本書中祇提其名而未加敘述。德國的統一史，最值得注意的，是她先有經濟的統一，而後方得到政治的統一，以致在國內未發生內戰，而同時又令全國人士得到統一的實惠，因而認識了統一的價值。關稅同盟來源甚久，在一八一七年德國各邦便熱心討論經濟制度之劃一，但因奧地利反對未能成功。一八一六普魯士決計改良關稅制度，一八一八年馬先（Maassen）因受亞當·斯密司（Adam Smith）學說之影響，向普魯士提出自由貿易之計劃，後來訂成法律，規定：普魯士境內之稅關概行撤廢，外國貨物之入國境者計其自由流通，本國貨物亦通行無阻。普魯士既成爲商業自由之國，所以引起各國之妬視，而羣起抗議。但普魯士仍設法與隣國訂立通商條約。一八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與士窪（薩）孫德豪森（Schwarzhurg-Sondershausen）成立關稅同盟，是爲關稅大同盟之先聲。一八二六年瓦特

俾 (Warburg) 與巴登 (Baden) 成立通商協定。後來，普魯士亦根據與黑森—達姆城 (Hessen-Darmstadt) 之條約擴張關稅同盟範圍。因此此兩團體成爲對立的局面。後經長期談判，於一八三三年這兩個團體結合成爲一個德意志關稅商業同盟 (Deutscher Zoll- und Handelsverein)。隨後其他各國均因經濟之需要相繼加入，至一八三六年，德意志南北兩部他國家，除奧國而外，幾乎全部加入。

經濟決定一切。經濟既經統一，於是便自然的要在各國間修築道路，開闢運河，建設郵政等等。有了物質的聯繫，則國家統一的意識自然而生。所以俾斯麥能夠利用這一架關稅同盟的經濟利器作爲剷除障礙統一的工具。如果沒有這個利器，俾氏的統一努力也一定能達到目的，但其中必生更多的波折，是否能那樣容易去戰敗奧法都成問題了。俾氏的功績是是否能如現在這樣大也成問題了。

關稅同盟對俾斯麥統一德國的成敗既有如此重要關係，所以稍述數語，以爲補充。

還有，本書在開首極力寫俾氏親奧，忠普，後來突然仇奧並且由一個普魯士人變成爲德意志人。這一點是本書的關鍵，是俾斯麥一生所持的政策之根源。但是著者未能將俾氏所以轉變之原因以及轉變程序歷歷寫出，以致讀者覺得有突然之感。這或者也是著者千慮一失之處。至於對俾斯麥個人的缺點，如敵視羣衆，反對議會政治，及以暴厲手段壓制自由主義等，著者雖時常提出，但在質量仍嫌不足，故俾

氏的整個靈魂仍然不能立體地聳立在我們眼前。祖護偉人是一般傳記家的通病，著者仍不能避此，似一憾事，但是，無論如何，本書所提出的材料多是原始的，多是他書所未經寫過的，立論也透關公平，的是一部難得的佳著。在譯文方面，錯誤之點，當不能免，如蒙讀者指正，衷心感謝。

曹京實 一九四一，十二，二十燈下。

原序

我寫這些文章的目的，在使對於近代政治史有興趣的人，得以認識各式各樣的政治家。不過，我所寫的，不是那些用狡猾手段，或陰險行爲，攫取官位，竊取虛名的人物，而是將時間用在尋求現代國家及人類的偉大福利的偉人。當寫述這些政治家及他們的工作時，我特別着重在幾點；就是凡想服務國家的人，無論怎樣做，都值得去研究之點。

這幾篇關於歐洲歷史的論文，都是以傳記形式寫出的，因為卡來爾 (Carr-Saunders) 說過：任何國家的歷史，均載於建造該國的人們之傳記中。這句話，對於我幾乎成了有力的真理，所以就這樣寫出了。

爲了處理我所選擇的這幾個題目，我不僅使我自己與那些舊的，新的，最優美的著作家們發生親密的聯繫，並且還藉助旅行，及與人與物相識，而使我自己盡量地走入這些人物所生活的空氣之中。因爲我與俾斯麥生在一起，所以能得到機會，知道一些別人所不知道的事情。我很幸運，從一八五四到一八五六曾在德國，所以對他能有密切的觀察。並且在一八七九，一八八〇，及一八一，這幾年中，我在柏林又因職務的關係，常常與他談話，聽他與別人談話，及在議會中親自聽他對於重要問題之討論，和

看到一些他的家庭生活。並且在彼時，及後來由一八九七至一九〇二，我因公務在柏林幾乎住有六年之久，所以我很知道一些贊助他以及反對他的人們，並且，同着這些人們去討論他的目的與手段。

當我貢獻一些參考材料，以備研究歷史的學者們去證實我的言論及能由此而作進一步之研究時，我在心中，時時注意到一般的對於政治事情有興味的讀者，因此，在寫每個人物之前，都先述敘一些歷史的背景。這樣，可以使每位讀者都能瞭解這位人物當時所處的環境，所處的人與事，及其企圖與已完成的結果。

我願在此特別感謝科內爾大學 (Cornell) 的林白爾·喬治 (George Lincoln Burr) 教授，麻沙匹賽次，康橋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的泰爾·威廉·羅斯扣 (William Roscoe Thayer) 先生，德國，明興 (München) 的麥森·伊文斯·愛德華 (Edward Ingvon Evens) 教授，及現在正在夫賴堡大學 (Universität Freiburg) 讀書的柯李威蘭·菲得利·亞 (Friedrich A. Cleveland)，他曾給我許多極有價值的建議，並且有數章他都曾加以很仔細的校正。

懷特

一九一〇年二月，科內爾大學。

俾斯麥

目次

著者小傳	一——二
譯者序	一——六
原序	一——二
正文	
一	一——三七
二	三七——七一
三	七一——九九
四	九九——二八
五	二八——四六
六	四七——七三

專名詞譯音表

..... 二

俾斯麥

懷特 (Andrew Dickson White) 著
曹京實 譯

假如德國能從石太因 (Stein) (I) 的工作生出一種演化，而這種演化又能本諸正義，則多少次長期的痛苦及在牢獄中，放逐中，斷頭台上，戰場上所犧牲的寶貴生命，都可避免了！祇於使用革命的過激行為，是一定要惹起反動勢力的報復的；同時反動勢力所採的手段一定也與革命勢力所施用的有同樣地殘酷。所以在丹敦 (Danton) (II)，馬拉 (Marat) (III) 及羅伯斯庇爾 (Robespierre) (IV) 所作的狂熱的殘酷行

(一) 譯者註：一七九七——一八一三。見拙譯之石太因，楊山山先生譯之石太因男爵傳，載中德學報三卷二期。

(二) 譯者註：一七九九——一七九四。爲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時領導人物之一，爲趨向民主主義之雅克賓俱樂部之領袖。

(三) 譯者註：一七四三——一七九三。生於阿爾，當法國舉行三級會議時曾辦民友報 *Ami du Peuple* 攻擊宮廷，僧侶，貴族。曾著奴隸鎖論，眼科學，光學新發明論，英國憲法之流弊等書。

(四) 譯者註：丹敦受刑時說：「布甲衣是銀製紗織的，也像羅伯斯庇爾此時想殺一機，他們都是好殺同氣的」。法國當時只巴黎一處，被冬孫例下手所殺的共爲二千六百二十五人。謝氏在四月間殺一七八百人，故著者認爲他們「狂熱殘酷」——參看 Louis Madel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爲之後，跟着就來了布爾邦系 (Bourbon) (五)，哈布斯堡系 (Habsburg) (六)，及羅曼諾夫系 (Romanoff) (七) 的酷冷的殘忍行動。按照自然法則而言，這乃是當然的。因爲奸黨們一方面煽動暴君，一方面製造悖理的統治，再加上不斷的革命與反動，乃使這種混亂情形延續了五十多年之久。

當德國的君王正向各方徵援，作最後努力以抵抗拿破崙的時候，他們對於其臣民所允許的諾言是很感人的，其最迷人的是他們保證給人民以憲法的自由及國家的統一。但是，在來比錫 (Lepiz) (八)，滑

(五) 譯者註：布爾邦系爲：路易十三 (一六一〇—一六四三)——路易十四 (一六四三—一七一五)——路易十五 (一七一五—一七七四)——路易十六 (一七七四—一七九二)——路易十八 (一八一四—一八二四)——卡爾第十 (一八二四—一八三〇)

(六) 譯者註：一二七三年霍亨斯陶芬皇祚絕，哈勃斯堡系之羅多夫 (Rodolf) 設法舉爲德意志皇帝，後成世襲，乃成哈勃斯堡系。奧皇室哈勃斯堡系與波捷統治奧國外還統治匈牙利，德意志及意大利之倫巴底及威尼新。予知該島之多斯卡納 (Tuscan)，帕馬 (Parma)，盧卡 (Lucca)，摩得拿 (Modena) 之統治者亦均爲此系之人。

(七) 譯者註：此爲俄國帝系。由羅曼諾夫大起算起：Alexis—Theodosius—Ivan V—Peter I—Catherine—Peter II—Ivan

VI—Isabella—Peter III—Catherine III—Paul—Alexander I—Nikolaus I—Alexander II—Alexander III—Nikolaus II
參看本書所附之專名詞譯名表。

(八) 譯者註：來比錫之戰是俄，普，英，瑞典四國締結第六次大同盟共同抵抗拿破崙於一八一三年十月大戰於來比錫。法敗，拿破崙逃至萊茵河，其勢乃衰。

鐵爐 (Waterloo) (九) 戰爭剛剛過去之後，對於拿破崙再無所恐懼，君王的諾言便顯出要遷延不即履行的徵兆了。本來從維也納會議 (一〇) 能產生一個和平的，親善的，黃金時代，然而甚至就是在這會議中也發生了土地爭執，特別是德國兩個較大的強邦之間，有一時期，似乎非經過同國相殘的程序，這爭執便不能完結。

奧國以梅特涅 (Metternich) (一一) 爲首，又開倒車去採取老的專制手段了。奧國皇帝在來巴赫 (Lautbach) 向德國的教授曾大聲急呼的發表了一套演說，又在巴多瓦 (Padua) 向意大利的教授們把他的著名的演說另換了一套說詞。他說：「我不要學者，祇要壯健的臣民。去將青年教育成如我所希望的，那乃是你們的職份。凡是侍奉我的人必須學習我所命令的：無論誰，如不能學，或者向我介紹新思想，他可以走，否則我將辭退他。」本着這種精神，在奧國及德國南部各地，不僅私人的教學就是公共教育也均被操於僧侶；歷史與文學都受嚴厲檢查；就是那最高貴的人們——那些曾經相信統治者的諾言

(九) 譯者註：滑鐵盧之戰在一八一四，英將威靈頓及普將布納爾將拿破崙擊敗。此乃爭戰最後之失敗。

(一〇) 譯者註：拿破崙第一被放於厄爾巴島後，曾結巴黎條約規定各國在維也納開會議決該約所規定之條。乃於一九一五年六月九日簽訂維也納條約。

(一一) 譯者註：一七七三—一八五九，奧國宰相，反對自由主義。

而與拿破崙拚死命去戰鬥的學者們及思想家們——也因有信仰自由主義的嫌疑而受監禁。黑森(Hessen)的選帝侯竟變成了那樣狂熱地反動，即使同他站在一條線上的極端論者他也表示恐懼；他用盡一切力量廢止一切改革，恢復一切弊政，甚至又恢復了老式制服、假髮、髮粉，及在革命以前所用的軍事學與戰術。普魯士在某些方面比較還好，但是那個「神授君王以權，去管轄邪惡」的舊理論在該地仍然逐漸發展。有些教授因為犯有贊成憲法自由與國家統一的嫌疑，竟從撥恩(Bonn)地方的普魯士大學被黜退。這種情形並不使執政者良心上有何不安，就如同有些次，在某些形式下，在美國的專門學校與大學中有些教授們因為嬰孩洗禮或雜鳥教皇職位的繼承或自由貿易的信仰而受到黜退的恐嚇，或真地被辭退了。這是一個樣子。

在德國居於領袖地位的君主們，常常集在一起非難自由主義，及計劃新方法去壓迫這種思想。並且設置各種政治的調查及審察機關。然而，雖然法律的保護被剝奪了，並有沒收財產，放逐的處罰，但仍有一大羣愛國志士散佈於全國各地，從阿爾盆(Alpen)到北海，從萊茵(Rhein)各省到俄國，都懷着爭取自由的高尚理想。這種運動在各大城市為最顯明，而尤以各大學為這個運動的主要活動地。

在各城市之中有影響力的作家們奮然而起，不顧那些受人收買的敵人之反對，將求自由的思想努力

推動。在大學之中不斷地有教授們將憲法的權利及統一的德國國家之觀念向學生灌輸。雖然這種行為一定並且很顯然地要引起放逐或監禁的懲罰，但是他們不管這個。於是全德國大學學生會乃成立了——這是一個很普通的學生組織，以演說與歌詠為贊美自由與統一的利器。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八一七年十月十八日在瓦特堡 (Wartburg) 所開的學生大會。在圖林根 (Thuringen) 在中古詠誦情詩的人們（約在一一五〇至一二三五年——譯者）及路特 (Luther)（見註二七——譯者）的堡壘之內，學生的熱情似乎全都表現出來了；但無可避免地與那些高興的演說一同發表的也有誇大的說詞。在這樣的運動之中，其最可怕的敵人並非反動派而是自己的人，與許多前例一樣，在這個運動中出現了無理性的狂熱者。有個名叫散德 (Sand) 的學生刺殺了反動作家寇次布 (Kotzebue)，這個給了反動派一個極可寶貴的口實。並且使頭腦穩健的人與冷靜的人驚訝，使君主們因怕無政府主義得勢，而帝新施用壓迫手段愈加殘酷——在受壓迫之羣中有阿倫特 (Arendt) 及雅恩 (Jahn)。阿氏曾以詩歌煽動德國為自由而去戰爭（二），雅氏曾犧牲一切去救祖國。但他們均被監禁且陷於囚貧。

(二) 譯者註：一七六九—一八六〇，著有時代之神神 (Gott der Zeit) 再版達十五次之多。又為偉大的歌德意志祖國是什麼 (Was ist des Deutschen Vaterland?)。

在一些小邦之中，有些統治者曾允許多少有些價值的憲法。例如歌德（Goethe）與釋勒（Schiller）的朋友威瑪（Weimar）的大公便是首先贏得了忠實地去試着實踐那些德國君主們在困難時期所作的諾言之榮譽的人。

就德國一般情形而言，在拿破崙侵略這老帝國之後，德國廢下三十九個分立的主權國，這三十九國現在已經組成一個聯邦。這個聯邦有一個全國議會，其組成份子不是由各邦人民舉出的代表，而是各邦統治者所任命的代表，故他們的任務不是立法的而是外交的——這個議會的會址在邁恩河畔的佛蘭克府，各邦代表都像各邦君主的公使一般圍坐在綠棹之旁，議事都是祕密的。這個議會由始到終所玩的均是陰謀：——奧國反對普國，普國反對奧國。其他各小邦均以自己的最大利益為標準分立於兩方面。不過通常都是奧國得到大多數的擁護。這個聯邦議會不作任何好事，故其影響除了趨向專制與分裂面外，別無他用。

此時，法國的一八三〇年革命已起，這個革命推翻了布爾邦朝，並伴同着其他各方面的努力多少也生了一些影響。在意大利及其餘各地卒將壓迫人民的政權推倒，在英國也通過了改革法案，由此又在各地引起了新希望，但此時又有熱頭熱腦的人試着要起革命；於一八三二年在漢巴和堡壘，及次年在邁恩

河上的佛蘭克府等地均有人鼓動革命。因此，無可避免地又惹起反動的辦法，這些辦法與革命辦法是同樣地悖謬不合理。這些辦法之一，是國王安斯·奧故 (Ernst August) 取消漢諾威 (Hanover) 的憲法及黜退格廷恩 (Göttingen) 七教授——這七人是德國最傑出之士，因為信仰用憲法的方法以統治國家而被取消教職。從革命到反動，由反動到革命，各處都顯着互相消長的局勢。很顯然地那種遵守穩健的判斷與正義的演化，無論在什麼地方都不存在了。有思想的人所得到的是失望與冷淡：康特 (A. A. C. Comte) 的哲學及對於責任之最高呼求曾鼓舞起為自由而戰爭的有力思想與工作；但是在這種思想之後，接着便來了黑格兒 (Hegel) 的哲學——這個哲學的最普遍的解說是：「不論什麼事，都是對的。」——並且這個哲學竟普遍地為各方面所接受。

德國的整個經濟組織是與牠的政治情形一樣地不合理。牠與美哥 (Turco) (13) 在法國所努力去改革的情形是一樣，不過所不同的是法國的不合理的情形被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所摧毀了，而在德國則無此革命。在一八一五年德國被分為三十六個商業區，每區自有關稅及稅章。幸而在所有這些不合理的情

(一三) 譯者註：一七二七—一七八一。法路易十六之財政大臣。主丁商自由發展，不立新稅，不舉債，節花費，裁冗員，減貴族懸俸，凡僱傭員族均不免稅。

形中竟起始興起一種對德國之自由與統一有利的思想，那便是漸漸地發展出來一個關稅同盟（二四）。這個同盟系由普魯士發起，各邦隨着加入。這個機關愈來愈有驚人的成功，並且默默之中對於有思想的人暗示出兩個問題：假如在商業上合理的自由是好的，爲何在政治上不可以呢？假如商業統一是不可能的，爲何政治統一不可能呢？

在此期間在德國各邦都設立了根據憲法而產生的議會。但都羸弱無力，規模微小，僅是一建議機關而已。然而牠們也有一點好處，便是使一些合理的自由之胚芽得以生存。然而就是這一類的陋不足道的可憐的議會也在德國遭受了阻撓。自代議制政府得到許可之後，有三十多年議會因遇到阻撓而未實現。在一八四〇年菲得利·威廉第四（Friedrich Wilhelm IV.）爲普魯士王，他雖仍沉溺於中世紀的迷夢與理論，但是他却是個有天才的人，人們都對他懷着很多的希望。在起首他所作的事情頗受歡迎。他釋放了那些被監禁的愛國志士，他令那些被驅逐的教授們仍回到大學講學——阿倫特便是其中之一，——並且在一八四七年他命在本國各省所存在的八個地方議會合併成爲一個聯合的普魯士議會，地址在柏林。

（一四）譯者註：德國關稅同盟是漸漸成功的。其發條件有二（一）自然趨勢：自三十年戰爭，普魯士革命逐漸波及德國各邦，各邦深感有結合之需要；（二）人力之促成：關稅統一，在計劃與實行方面應歸功普魯士財政大臣摩次（Mozart 一七七五—一八三〇）。

原來的那八個地方議會本是軟弱無力的團體，完全受皇室與警察的轄制。現在這個聯合議會却代表整個的普魯士國家了。(二五)

但這個機關所受的限制與拘束是很嚴格的。他的職務不是立法而是供諮詢。當開會時國王所說的詞極令人灰心，他說：「在地球上沒有權勢能勸誘我把國王與人民間的自然關係改變成爲協定的及憲法的；無論現在或以後我決不許有一份寫成的文書，牠像第二個上帝似地去替代那個舊的天經地義，而置身於天上的上帝與此土之間。」

其他各統治者，對於有限制的自由也偶而作一些讓步，有些是實行了，有些乃是說說好玩而已。並且每個國王所作的這些讓步，很顯然地其目的均在使人稱頌國王而壓抑人民。

使一般困難更加困難的是貴族社會；牠仍保持其中世紀的地位與特權，就如同石太因並未曾取消農奴，未曾賦與城市特權時一樣。因此他生出了許多激動與騷亂。羣衆暴動不已，穩健派與安份守己的人士均因暴動而驚訝，於是專制主義的統治者乃得到他們所希望的藉口了。

(一五)關於這個機關的特色請看 Bryce, *Holy Roman Empire*, p. 463 關於牠的組織請看 Vahlke, *Die deutsche Reichsgeschichte* 卷一。

一八四八年二月，法國起了革命，教立安（Orléans）皇室被逐。沒有革命能比這個更無理由，更無用處；沒有革命在兩方面所表現的愚蠢能够更甚；沒有革命更能生出一種反動，這種反動使自由與國家的自尊更能陷於無能爲力的境地。然而，雖然牠是無用，但牠竟使全歐洲燃燒起來；梅特涅從維也納逃跑，永不再回；老皇斐迪南（Ferdinand）被逐出了維也納，新皇帝，年青的約賽夫（Franz Joseph）登極就位；在柏林方面，國王菲特利·威廉第四被一羣暴民所辱，他們強迫他取消他的那一套中世紀的理論，解散他的衛兵，迫他允許憲法並召集普魯士全國議會。這個議會與以先那個可憐的用來宣推託敷衍用的聯合的普魯士議會大不相同。巴燕（Bavaria）國王被迫讓位於其子。德國的君主們都不得不向人民的暴怒與侮辱低首而允許憲法。王子們與他們的大臣們都向英國逃命，在這些人們之中有普魯士的威廉王，即後來新德國的第一位皇帝。由奧國，匈牙利，意大利各方面來看，戰爭即在目前，而丹麥同普魯士的戰爭已竟起始。

但是爲了求德國的統一，現在又要向另一個方向努力。爲了代替那個可憐的，老的，代表君王們的邁恩河畔的佛蘭克聯邦議會，現在選出一個代表全德國人民的國會，並且在五月於該城開首次會議。很少有公共團體包括像這個國會那樣多的具有深遠的思想與高尚理想的人；很少有公共團體包括像這個

國會那樣少的有實際經驗的份子；結果也是很少有像牠那樣失敗的。

在起首這個議會很好。其議長爲馮加爾恩 (Von Capper), 他像似一位能最令人滿意的議長；但不久他很令人失望。在各方面看，戰爭就在目前；在各城市暴民的精神都在沸騰；舊政府，公開或秘密，拚命去得回他們的舊權；全國人，有時以卑鄙的手段，有時以兇猛的作法，試着去取消專制；全國人民，其實是全世界，都渴望實際的辦法。在這種情形之下，這個議會變成爲一個別無他用的辯論俱樂部了。教授們，法學家們，一天一天地，一星期一星期地討論國家的理論，主權起源論，民權性質論，——討論各種事情，只是不討論獲得國家自由與統一所必需的實際辦法。於是詭辯家，諷刺家，漫畫家都得到了他們的工作，無疑地，他們之中有許多人是被擁護專制的人所收買的。自然人民對這個議會的信仰減退了。到後來，牠像似要作出一些較比合於實際的努力；因爲受純理論哲學及漂亮言詞的影響，一位孚衆望的奧國大公成了德國的執政。並且，大約在一年之後，事情竟發展到極端：一八四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國會推選普魯士王菲得利·威廉爲德國皇帝，並由議會中的第一流人物組成代表團赴柏林，很莊嚴地向威廉呈獻皇冠。然而這個禮品被拒絕了，由是世人方知這位國王不願從人民得到皇冠，必須由人民的統治者們向他奉獻方可接受。

對於國會而言，這是一個致命的打擊。各地暴動蜂起，並且愈來愈甚。在巴登（Baden）爆發叛亂；革命在薩克森（Sachsen）突然出現；匈牙利陷於大革命的痛苦；奧大利帝國的存在汲汲可危；將軍們，統治者們，政論家們之被暗殺者時有所聞，不僅在德國，就是在法國與意大利也是如此。帝國的執政，約翰（Johann）大公，忿然放棄王位；出席佛蘭克府的議員有百餘人辭職。在這些辭職的人們中有議長及一大羣最受人民信賴的領袖，在一星期之後約有百位議員由佛蘭克府遷至斯圖加德（Stuttgart）。在該地又大開辯論，唇槍舌劍，爭強鬥勝，所提出之議案均矯奇無用。如此辯論，不及兩週，全國均對之生厭。在開會第十二日有魏登倍（Württemberg）公使將會場所在地的騎術學校關閉，又受到軍人的幫助將議會解散。這個偉大的佛蘭克府的全國議會，就這樣地被結束了，其服務期間僅一年有零耳。

尚有其他事件，更足使德國之愛國志士意氣銷沉。如在柏林有一憲法會議，這個會議竟被奧郎爾（Wranzel）元帥逐於戶外。當時從意大利來的消息是：在拿頗利（Napoli）舉行反抗布爾邦皇室之工作已經失敗；在羅馬各邦舉行的憲法自由運動所得的結果乃是兇猛的民衆獲得勝利與羅西（Rossa）之被暗殺，——羅西是意國惟一政治家，在彼時可以希望從他得到某程度內的意國的自由與統一；在別蒙（Piedmont）所舉行的建立國家的自由與統一之英勇的努力也因在奧瓦拉（Novara）一役而被奧國擊成泡影。

從法國來的消息是：共和主義的憲法由於各演說家及各黨派之爭吵已不爲人民所信任，露易·拿破崙·博那帕特 (Louis Napoleon Bonaparte) 已被選爲新法蘭西共和國之總統；每個愛護自由的人都本能地知道這件事是什麼意思。正當此時，在德國各地專制主義也得了勝利，在這一長串勝利之後，從俄國來的消息是：俄國皇帝尼克老斯第一 (Nikolaus I.)，一位信仰專制主義的祭司長，曾進兵去救援哈布斯堡皇室，曾克服了匈牙利軍隊，到此際爲止，俄軍所向無敵。從歐洲各地來的消息是：在歐洲對於自由主義者所施的根本待遇是大規模的沒收財產，及將自由黨之領袖放逐與判處死刑。在每個地方，專制主義都似乎得了勝利。在這個長而可怕的期間，有許多高尚的德國人均垂頭喪氣出走他國，——特別是去美國，在這些人們之中有李波爾 (Francis Lieber)，芬初 (Carl Follen) 及舒爾茲 (Carl Schurz)——這三位是命運註定的要對美國貢獻很可貴的勞績。當時的德國不若似乎沒有什麼希望，在全國各地凡是品格極端純潔之士都被下獄或監禁；那個老的高壓政治現在比以往更可怕了；並且就在這個時候，在這最危險的時候，當憲法的自由及國家的統一似乎到了最後關頭的時候，竟出來一個年青的，反動的，信仰專制主義及反對統一的使徒，伊斯麥·封·仙豪森·奧透 (Otto von Bismarck-Schenhausen)——由此，憲法自由與國家統一乃完全完了。

他的性格淵源甚遠。一看他的姓氏及其家族史便可知他的祖先們是邊疆的居民——住在德國埃爾貝河 (Elbe) 流域之下部，大概住在僧正們所試着用以立足的「分界地」(Mark)，或界邊上，或者，像許多考古家所主張的，住在以小河比色 (Biese) 為分界的地方邊界上……因此，僧正的邊記 (Bischoff's Mark) 或筆色麥 (Biesemark) 這個名字，便變成了一般人口頭所稱呼的俾斯麥 (Bismarck) 了。(一六)

他的祖先之中，第一位有史可考者為赫保德 (Herbord) 或赫保特·封·俾斯麥 (Herbert von Bismarck)。大約在二二七〇年他是石滕達爾 (Stendal) 市鎮中布商協會的首領。我們知道更清楚的是在半世紀之後，他的孫子魯勒夫 (Ruloff)，或魯爾 (Rule) ——一位有資產又有力量的人，他因為公共學校的問題曾領導石滕達爾的公民與隣境的僧正相爭，並被逐出教會。

魯勒夫的儿子尼克老斯 (Nicholas) 所留給我們的材料比他父親的明顯動人多了。一般人都稱尼克老斯為克老斯·封·俾斯麥。他此時已家資富有，已有權勢，且與教會也和好了。他曾領導石滕達爾城的貴族以爭求城市民主政治的實現，並且被逐出於該城，但後來他得到了一個諸侯的堅固堡壘及其附近

(一六)關於 Biese-Mark 及 Bischoff's Mark 的問題請看 Dr. J. Langer 見 Horst Kohl, Bismarck Jahrbuch, IV,

的一些肥沃的地產爲其住所。他是他的偉大的後人（指俾斯麥——譯者）的先驅者，不僅在戰爭方面，即在政治方面亦然。在十四紀的中葉，他聲名遠播；他與地主們如勃蘭登堡（Brandenburg）的侯爵和馬德堡（Magdeburg）僧正等結爲同盟；他的地位是與他們的高等顧問官相並列；他對於管理大量的資財顯有才能；對於反抗布勞恩史外（Braunschweig）的公爵，反抗德國皇帝，及後來反抗教會等戰爭，他均參加，並且與他父親一樣也得到被逐出教會的處分。在此後數世紀，這個家系的人們常常地因爲戰爭或交涉而聞名於世。在十六世紀，至少有一位曾參加反抗土耳其人的戰鬥；在十七世紀有數位參加三十年戰爭（一七）；在十八世紀初葉有一位被放逐到西伯利亞（Siberian）之後及在英國從事外交工作之後曾在彼得大帝（Peter der Grosse）領導之下去與瑞典人相戰鬥而戰死於波爾塔瓦（Poltava），並且在十八世紀，這位將來的親王宰相（指俾斯麥——譯者）的曾祖父在菲得利大王（Friedrich der Grosse）（見註三）——譯者）指揮之下與奧國相戰，而戰死於塞斯路（Sassau），他的祖父曾參加菲得利與法國的戰爭，在羅斯巴何（Rossbach）那場出名的勝仗，他也曾躬身參與；他的父親在布勞恩史外的公爵指揮之下曾

（一七）三十年戰爭（一六一八—一六四八）爲新教與天主教之最後決戰；初爲宗教戰，後轉爲各國之爭地戰。一六三二大戰於呂岑，（Lützen）德軍大敗，一六四八開會於維斯特法倫，議定德國信教自由，割埃爾薩斯與法，割威羅的海沿岸地與瑞典，承認瑞士荷蘭獨立。德國乃衰。

參加反對法國革命而受傷。在十九世紀，有兩人參加釋爾 (Zell) 的自由軍團，該軍團頑強的與拿破崙相戰鬥，甚至在梯爾西特和約 (1807) 之後仍與拿氏相戰；並且有七人參加一八一三年的自由戰爭，這七人之中有三位戰死，有四位因戰功而得鐵十字勳章。俾斯麥在他老年時，把這些事情總起來說道：「在最近三百年間，我的祖先未有不與法蘭西相戰爭者。」(19)

這個家族頗具一些特殊性格，以致揚名於埃爾貝河下游各地。該族之大部代表人物是粗野的騎士，兇猛的獵人，強悍的射手，健壯的饕餮家，及酗酒力飲的人。

這位未來的宰相的父親，雖有一時期曾為軍人，但似乎屬於溫和一流，且以可受尊敬之鄉下紳士身份卜居於仙豪森 (Schönhausen)。他的母祖之能引起人們注意之點是她為俾斯麥家系中第一位不是來自貴族血統的人。固然她的家系曾產生過卓越的學者與教授，固然她的父親曾在菲得利大王手下為官並且政績卓著，且在菲得利·威廉第二(見註三一——評者)治下得到極密顧問官職及在菲得利·威廉第三治

(18) 譯者註：時在一八〇七。

(19) 俾斯麥家系中之各支派作文武官員者甚多，其詳細情形可看 H. H. V. von Bismarck, Stammbuch des (18-19) Geschlechts Bismarck, Berlin, 1900。

稱贊，但在她結婚之前，在她名字之前不能加以「封」(von)字。至於柏林人士對她所能知道的，乃是她才華出衆，讀書甚多，善談吐，喜愛城市社會與旅行，並且很能花錢。她的子女對她所知甚少，大約下得到石太因的她是從羅梭 (Rousseau) 學來的，使子女遠遠地離開家，並且待遇他們就如同年青的斯巴達人 (Spartan) 似的。但無疑地，那是由於她，給俾斯麥家庭中注入了對於偉大文學之喜愛，對於刻苦讀書的熱望及深刻的思想。此點在她的兒子雷歐波德 (Otto Eduard Leopold) 身上曾顯現了出來。

奧透生於星期日，一八一五年四月的第一日。同胞六人，他居第四。六人之中除他而外，得存在的有一長兄，後來頗受人尊敬但名不虛，及一幼妹，漂亮聰明，熱心宗教。他與她感情甚好，曾給她很多信札。由這些信中，我們可以知道他的家庭生活及政治經驗是怎樣的愉快。他七歲時就被送到柏林預備學校，在那住了六年。這個對於他是一個試驗時期：規矩嚴厲，教師嚴苛，飲食清淡。學校固然宣稱她是在訓練年青的斯巴達人，可是所採用的方法則像斯圭爾斯 (Squire) 所用的。甚至就是在這個期間，在他老年時所極喜愛的兩件事：愛好鄉村及農事，已經在這位幼帝心中佔據很牢固的地位了。他認為拘束於城市之中乃是一件殘酷的事情。在他受早期學校之末期，他家在柏林得到一所房子，因而他轉到柏林一個大的高等學校。後來又轉到另一個。這兩個學校的教育對於他似乎很有用處。他與一些教師

發生了友誼，並且這種感情一直維持到他們死亡時為止。在這整個的預備期間，雖然他在他的儕輩中是一位體育領袖，然而他却具有學者的態度，並且也富有思想。他的學校作業無疑地是好的，可是他的行為却有些奇怪。據傳說，當他在學校選擇語言課目時，他選英語，其目的是因為這個可避免去上法國教授的課。不僅在此時他已表現出學習語言的非常才能，就是以後也是如此。他說法語英語都極準確流利。當他在聖·彼得堡 (St. Petersburg) 為大使的時候，他對俄語也可應用，並且對荷蘭文，波蘭文，及賴特文 (110) 均知道一些。他所喜愛的學問是歷史——最喜希臘史與羅馬史，其次是他本國史與英國史。(111)

一些較比觀察力銳敏的教師，都承認他才幹卓越。有一篇他在高等學校所作的拉丁論文，上面記着很好的分數。並且從以後他在演說中所引用的成語看來，都表示他的早年訓練給他的印象極為深刻：直

(110) 譯者註：Lakka 為奧立陶宛人種民族之一，其主要居地為 Kurland 半島。

(111) 著者有一次曾問傅斯步在英國曾住了多麼久，竟能說這極好的英國話呢？他答道：「不過兩三天而已，並且其中有一天還是星期日。」這是他為了取笑而故意少說。他曾去英國兩次，一在一八四二，一在二十年後，不過每次住的時間都很短。他曾由英國給他父親一封很快活的信，日期為一八四二年七月，請看 Horst Kohl，見前註，四卷，四一六頁。

到暮年他尙常常引用簡潔有力的拉丁語句。

在十六歲時，由世萊瑪哈 (Schleiermacher) 在柏林的聖三一 (Trinitar) 小教堂施堅信禮，由這事留下一個有趣的可資紀念的佳話。這位偉大的神學家在當時所放在他手中的聖經引句是從使徒致歌羅西人書 (載新約——譯者) 摘來的，「他不論作何事，均熱心去作，如對神明而非對人。」有各種證據，可以證明這個教諭所給他的印象。固然，有許多時候由於他的誇張，莽暴，懷疑，譏諷而將這句話遮掩了，可是他終將這些缺點改正，所以這句話現在用金字刻在非得利斯魯 (Friedrichsruh) 地方的墓上。

在十八歲初年他預備進大學。對於此事，他父母的意見不相一致。父親以為用家庭的勢力可以為他在教室找一位置以維持生活，故贊成他以僧侶為業；母親贊成他預備從事外交事業。兩人都怕大學生活放蕩——因此乃不送他到海岱倍 (Heidelberg) 而送他到格廷恩 (Göttingen) (111)。

在大學的頭三個月他將大部精神用在讀書，並且特別被吸引在當時傑出的歷史家黑倫 (Heeren) 的講室之中，但不久那個舊的野蠻的俾斯麥精神便不可遏止地暴發了。他在格廷恩留了三學期，在這期間的許多天都因決鬥及其他不遜行為而在大學監獄將光陰度過。他似乎對於決鬥頗具熱情，曾參加二十八

(111) 關於俾斯麥的父親願令俾氏在教堂作事及其理由，係著者親自從俾斯麥口中聽得者。

次學生格鬥，有一次用手槍。他曾得一個寬而深的疤痕，終其一生他臉上都帶着這個疤痕。由表面上看來，他的大學生活大部分都是擺架子，傲慢，莽撞，但在實際上他讀書很多並且很好。他不常去聽講，他不與教授接近。給他印象深的教授，似乎祇是黑倫一人。他的惡名傳播甚遠；耶拿（Jena）大學的當局聽說他要到該城去遊玩，立刻在事先下了一道驅逐他的命令。在他晚年口述的回憶錄中，他說：當他為學生時他是一個汎神論者及共和主義者；但在彼時給他一種影響使這種趨勢稍加緩和的是一小羣新英格蘭的學生，其中最傑出的是摩特利（John Motley），以後摩氏因為尤美國駐維也納及倫敦公使及為荷蘭共和國之歷史家而出名。

在格廷恩過這類生活有一年半之久，以後他的心情與心智似乎反對他自己的這種放蕩的愚蠢行為，又因為決心努力學習法律，他乃去柏林。在該地他又與摩特利在一起；兩人的關係更加密切；以後他們書翰往還，只要摩氏蒞臨德國，立刻成為俾斯麥的賓客。直到俾氏末年他都喜歡與美國人及駐在柏林的美國公使談說他當學生時與這位朋友的快樂關係。

雖然他與摩氏有這樣的友誼，而摩氏又很反對莽撞與放蕩，並在格廷恩兩人分手時俾斯麥也頗沾染了一些學術空氣，可是他一回到柏林便又對大學監獄有所貢獻了。現在他學法律，但很多時間並未用在

法律上，可見他對法律並不熱心。雖然與他同時代的最偉大的法律教授薩文宜 (Savigny) 彼時在該地任教，但俾氏到他講室聽講祇有兩三次。

然而他在求智識方面決不怠惰：在他學生時代，甚至在他的放蕩與莽撞時期，他猛勇地繼續讀斯賓挪莎 (Spinoza) 黑格兒，歌德，莎士比亞，及其他偉大的思想家的著作，——他對歷史用去許多精神，並且與石太因一樣，他不斷地表現出來對英國史有特別的愛好。有兩年多的光陰就這樣地過去了，在表面上看是毫無目的地度過了，但是當他起始在事業上表現力量時，他的工作有後來竟變成了歐洲的奇蹟。因為，雖然他忽略了去聽講，但他却奮勇地捉住他的法律書籍，並且由於日夜的工作，他通過一切阻礙，成功爲 Auscultator，或者法庭的法律參贊，並且因爲擔任這種職務，他用獨創的見地審判各式

(二三) 關於這兩人友誼生活之回憶，博斯麥曾有所敘述，請看一八九八年有波斯頓 (Boston)，由 Oliver Wendell Holmes 出版的 Memoir of Motley，十七—十九頁。關於其他細節，及兩人間的通信，請看在一八八九於紐約由 G. W. Curtis 出版的 Correspondence of Motley。關於比這更詳細的敘述，請看 Horst Kohl, Bausteine zur Lebensgeschichte Motleys 第三卷，由九十七頁起的 Drei Briefe 一八五九—一八五八，及該書第四卷，由二〇九頁起的 See a Thule，八六四—一八七四。關於博斯麥以代森摩特利而感到驕傲的奇特的文件，見 The Correspondence of William I and his nar'k, 德譯本，倫敦，一九〇三，第一卷，第一三六頁。關於與他們的友誼有關係的其他事件，而從博斯麥口述所得到的，本作者曾有所著的自傳中有所敘述。

各樣的案件，但他對於證人與法官常有輕率鹵莽的行爲，這個幾乎時時處處將他的法律生活給完結了。

此際在他的事業中的許多突然變遷中又來了另一種變化。他自己說他喜歡行政工作比喜歡法律工作爲甚。他乃努力準備。因爲他考試成績之卓越，使當地的法律家都爲之驚訝，他成功爲阿痕 (Aachen) 地方的 *Referendar*，或者官方法律報告員。在這個新事業方面，他又試着輕視他周圍的官僚政治。然而他仍不斷地多讀書，大部時間用在與外國賓客的交際，用以培養自己。他現身於柏林王廷，並又向普魯士的威廉親王推薦自己——威廉後來成爲德國的皇帝。但此時他又突然開始度新的放蕩生活，這在他晚年非常地後悔，並且由此使他生活不安定達十年之久。這位青年似乎「事事常換，無事持久」。他在波次丹 (Potsdam) 當一名小的局員，又起始在皇家衛隊服役，並在最高貴的人羣中往還；但是突然發生了打擊，——他家財政破產，由他母親喜歡度高貴生活而將田產忽略，因而陷入財政混亂。(二四)

俾斯麥宣稱他要改善自己。他立刻認清目前環境，立刻實行，與波次丹斷絕關係，與一切宮廷的吸

(二四)關於俾斯麥在應法庭法律報告員之考試時，所寫的論文，其全部，見 *Horn's Kohl, Bismarck's Jugend*, 二卷，三一—四七頁。這些論文表現出他博覽群書，推理精密，及很深的普魯士的愛國情緒。

引及奢侈斷決關係。他乃上規模較小的格來福華 (Greifswald) 大學，又重新在該地服兵役，此時與他接近的人都是比較儉樸的。他又到與此地為隣的愛爾登拿 (Eldena) 農業專門學校去研究農業。他在波美倫省 (Pommern) 有一小塊地產，他就利用該地作實驗。

一八四五年他的父親死了。這更增加了他的責任。並且此時他變成爲仙豪森——他家庭中最重要的地產——的鄉紳了。他對農家生活之愛好更加深了；在後來他作了偉大事業時，他的夫人告訴來訪他的政治家們說：「他對於蘿蔔的關心比對於你們的政治爲甚。」

他應用在愛爾登拿所學來的科學方法去開墾他的田地，但同時也應用實際的常識。應用常識永遠是他主要的癖好。他從他周圍的人學習很多。一直到他生命之末，他喜歡農人的那種粗樸的生活方式與他們的精明的談話。他透澈無餘地瞭解他們，他變成了他們中的一份子，並且因爲將科學與實際的觀察混而爲一，而使他得到成功並贏得敬仰。不久他使成爲埃爾貝河堤監督。這個與他的性格很合適，因爲這個職務在危急時需要敏捷的決斷，急劇的應付危險的能力，強制執行的威權，及頑強地與沿河一帶與在宮廷之中的侵犯者與劫掠者相鬥爭。

和他的許多的祖先們一樣，他時常打破慣例與禮節。因爲他是一位不顧前後而作冒險事業的英雄，

於是那「瘋狂的」俾斯麥一名便爲人所周知了。他常豪野地在夜間騎馬馳騁，常常墮馬，跌斷肋骨，使他在醫院中住上幾個星期。他賭酒痛飲，其爭吵之甚不亞於三十年戰爭之戰場。當他去拜訪他那一羣酒友，因彼等尚沉醉未醒，乃向窗哄然一鎗使彼等醒來。並且有一次他竟將一隻狐狸放於跳舞廳中以博婦女之一笑。

與他喜愛田間有同樣的熱度，他常常去柏林，並且親臨各式各樣的社會，——由宮廷到兵營。由他在這個期間所說的話，所行的事來看，特別從他的信來看，其中流露出豐富的幽默情調；但他常常很快地就由快樂而變爲憂傷——這種心境在他的大批的家信中特別顯明，尤其在當時及後來給他妹妹及其未來的夫人之書信爲更甚。從心理及文學的觀點來看，這些信是可以列入自古以來的最優美的書翰之中。機智，幽默，精明，對於事情與性格都極微妙地有鑑賞力，繼續不斷地顯露鋒銳的思想與深沉的反省，並且一切都十分自然——每句話都直接地出自他的心靈；信件就是寫信者自己的寫照。

他仍然是一位貪讀的讀者——利用冬季的漫漫長夜讀歷史，哲學和詩——德國的，法國的和英國的；並且他的記憶力似乎能使每件事都不遺忘——他甚至能從那個龐大的二十部德國地理詳細地將歐洲中都很微小之點認識得清清楚楚。這個，在數年之後，當他在議會中及在外交會議中是那樣地使他的敵

人驚訝。(二五)

但是這種身體的與腦力的浪費，對他並無損害，他常常引用這些材料，或由這些材料產生新意見。在彼時在以後，他永遠是一位善「研究」的人，——他寫的東西淵博而辛辣，——在他早年為報紙所寫的及在以後他所作的報告及公文均是如此。

他非常喜歡旅行，——到過英國，法國，和瑞士，後又到過俄國，匈牙利，意大利，西班牙及斯干的那維亞各國。(二六) 由他的信件看出來，他要使他的眼界寬朗，他似乎要看每件東西——並不僅僅是物質的東西。在他的信件之中對於家庭及田間事情之記載是充滿了諧謔之趣的，對於刻畫人的性格及描摹風景巧妙之至。假如這些信不是寫得那樣的好，則牠們有時使似乎流於狂幻了：他在紙上寫出山上的

(二五) 他喜歡博覽群書。這種愛好，直到他生命之末似仍存繼續。本作者於一九〇八年秋，在拜得利斯魯 (Breda, Holland)，在與俾斯麥逝世的屋子相連的，他所常常工作的桌子上，看到一堆他晚年所閱覽的雜書，其中有一部是攻擊紐約城市生活的很優美的英文小說。

(二六) 譯者註：斯干的那維亞各國為：瑞典一國及挪威十國。挪威古為海峽與六，第八世紀末始有國家組織，後瑞典崛起遂隸於瑞典，時為一三一九年。一三九七年瑞典，挪威，丹麥曾聯合成爲一邦，繼而瑞典獨立。一八一四年瑞典復併挪威，至一九五〇年挪威始離瑞典獨立。

柔和的影子，海的微微閃光，沿路邊的地層的顏色，陽光在牧場草地上之玩嬉，耕地的性質及耕種所得的收穫。他表示出來他能對於高尚的精神工作發生深的印象。譬如他到了瓦特堡 (Wartburg) 他便想起路特在該地所作的工作，並默想那工作所含的深刻意義 (二七)；或者後來當他坐在賓根 (Bingen) 萊茵河畔，他便回想他幼年的放蕩行爲 (二八)。

(二七) 譯者註：路特 (Martin Luther) 幼習法律，後專神學。爲瓦特堡大學教授。嘗遊羅馬，目擊教會之腐敗，毅然生改革之志。會一五二三年教皇出敕第十 (Leo X) 以建華·彼得 (St. Peter) 教堂爲名，懸掛教皇符 (Indulgence)，謂凡買教皇符者，其人之罪即可爲上帝赦免。德皇爲本與教皇相結納，故罪符乃得暢銷於德國，國人乃直接感受經濟與道德之痛苦，因此宗教改革遂以德意志爲策源地。路特曾以拉丁文著論又九十五條，公佈於瓦特堡教堂門首，以示反對。教皇聞之，應路特以破門罪；路特焚其令狀，並倡言反對教皇及教會自解釋基督教教旨之權利，謂祇有個人自己已經直覺能力能獲教旨之真理。適西班牙卜卡爾第一 (Karl) 又被選爲德皇是爲卡爾第五，主關四國，凡慈第一 (Ferdinand) 已其版圖過大，有妨國力平衡，欲爭得意大利以自廣，卡爾乃設法得教皇之援助以抗法，以禁止路特派之傳播。一五二一年召集國會於臥海尼 (Worms)，召路特使改前說，路特不允，遂獲罪，與其徒逃於薩克森 (Sachsen)，乃將罪狀譯成德文。是不特路特之氣節足以感人，其對德文文法之統一亦與有功焉，故足以使俾斯麥臨其地而爲之追念不已。

(二八) 關於他的家書，見俾斯麥何伯特親王 (Fürst Herbert Bismarck) 所認可所蒐集的書信集，其名爲 *Briefe an sein*。Brant und Gattin (哥倫布·特威 O. T. Lewis, Harper 及 Brothers 譯成英文，紐約，一九〇一)；還有他發給他的親近人們的親切的信件，見 *Kondell, Bismarck et sa Famille*，這書是 Lang 翻譯的，巴黎，一九〇二。關於他私人的及政治的特殊信件，見 *Pöschinger's Bismarck-Portefeuille*，及他所發刊的其他著作。關於俾氏從佛蘭克府發給柏林大臣們的機密信件，見 Lang 所翻譯的 *Lettres Politiques Confidentielles* 巴黎，一八八五。他給他的君主的信，見 Ford 所譯成英文的 *The Correspondence of William I and Bismarck, with Other Letters from and to Prince Bismarck*，共二部，倫敦與紐約，一九〇三年。

漸漸在他的宗教的與政治的理論方面起了一種新的演變。因為他常常喜歡譏諷人及苦薄地評論人，所以現在的轉變無疑的是一個真正的轉變。在政治方面的轉變是完全自然的；這是法國革命的一種反應，很多有健全思想及強有力的人，一思考由法國革命及種種想在德國試行暴民統治之舉動所作的放蕩的，殘酷的，愚蠢的行為及令人惡心的口頭禪，其反感使油然而生。其宗教方面的轉變也是自然的。他從他的母親的會客室中所曾聽來的十八世紀的盧梭的思想是已經破滅了（二九）。由於與各式各樣的朋友相接近，並且，因與一位可愛的，出衆的基督教的女人之談話，將他的人生觀改變了——一個很深的改變。這位女士是俾斯麥的隣人也是朋友，當她清醒地與死神相接近時曾與俾斯麥談話多次。又加上此時他與住在比隣的鄉紳之女訂了婚——這位女士的品格中所具有的天賦的力量及宗教的直覺對於俾氏整個的事業具有極深的影響。因此他將原來傾向於反動的趨向更加强了。他永遠尊敬大選帝侯（三〇）及菲

（二九）譯者註：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一七一二—一七七八），曾著愛彌兒（Emile）人類不平等之起源（一七五三）及民約論（一七六一）等。

（三〇）譯者註：大選帝侯即普得利·威廉（一六二〇—一六八八）。

得利大王 (三一)，而一部普魯士歷史又特別地歷述這兩人的事業的，所以這兩人的史實對於他所含的意義又比對別人更爲深切。漸漸在朋友之間人人都知他是一位不可救藥的反動者。

當此時期將要告一結束之時，來了一串事情，爲他啓開了一種新事業。我們已經知道在普魯士曾設立了八個省議會及各邦規模甚小的議會。這議會系由地方紳士組成，可以討論地方事情，但其方式祇是建議的而不是立法的。在一八四七年非得利·威廉第四，因爲人民要求成立一個中央議會，並且他又被強迫而不得不接受這種要求，因而在柏林召集一個聯合議會。這個議會是由各地方議會之代表組成。俾斯麥便是赴這個聯合議會的代表之一。他剛進入政治時，前途毫無希望。他之能入這個議會並非由於選舉，而是因爲那位被選的人病了，方由這位青年鄉紳補人。人們都以為從他身上是不能得到什麼的：他告訴我們，當他作第一次選舉演說時，他竟被人用石頭投擊。在彼時他的第一的打破空前記錄的議會演

(三一)譯者註：非得利大王即非得利第二爲非得利·威廉第一之子。他在位期間爲一七四〇—一七八六。曾佔取奧國的施雷仙

(Gollheim) 時爲一七四〇至一七四八。是即所謂之奧地利一位繼承戰爭。後奧女，瓦利亞·特西西亞 (Maria Theresia) 聯合法德

奧普對土，英國助普，是謂七年戰爭 (一七五六—一七六三)。初普國敗績，勢將被瓜分，幸非得利與英國經濟之援助，及其卓越之軍事天才，乃轉敗爲勝。後普奧俄聯合瓜分波蘭，使普魯士東西之土地聯成一片，乃與奧或法四強並列，而爲十八世紀末之五大強國。故俾氏對之景仰不已。

說是在一個小的省議會中，對於「濟貧院中牛脂消費過多」之抗議。

但有一點應當注意的是：雖然很多人認為他僅是一個喧嚷的高聲朗誦的演說家，但他早已表現他在某些事情方面較為優越。對於法廳他看出訴訟手續所必須應當改革之點並且他曾起草一個改革的計劃，這個計劃表示出他的愛國的目標與建設的力量。不過他這些較比優越的這一方面的一切活動，祇為一小圈人所知，除了這一小圈之外，是沒人知道的並且在開會的初期，他似乎給人的印象並不怎樣的深。(三二) 但是在他尚未曾作討論較大的政治問題之前，他已經開始將他想要作一些好事的見解為人所知了。於是與他一同議事的議員們都起注意他所說的話。並且，真的，就是外界的人也起始注意他的說詞了。他的辭令甚劣，但他百折不回的毅力是無比的。再沒有比他那樣勞苦無人的反動了。他堅持着權神聖。他輕視立憲主義。他認為普魯士曾在偉大選帝侯及非得利大王這類人的統治下曾變成強盛——而這兩位統治者都是以鐵棒為統治的武器——並且祇有在專制政治之下，這種統治的方式方能保持牠的權威。有些人很贊美英國的君主立憲制度，但他却堅持說：英德兩國國情完全不同。他說：英國的王權

(三三) 見 Horn Kohl, Jahrbuch, 第三部, 第三十六頁以下。關於他所提出之六點改革, 在第三十七頁在他給 L. von Gerlach 的第二封信中有很實際的敘述, 並在其前後均有註釋。

神聖的觀念已經被革命及內戰給連根掘了。而在普魯士神賜王權的觀念是一般的政治思想的主動力，並且也是整個政治制度的中心。在他的眼光中，祇有國王是制定法律者，或解釋法律者，至於議會或任何法廳都不是的。他不贊成對現代精神讓步。他發表很多言論，反對解放猶太人，反對基督教國的觀念。他說：「上帝將其權威授命於君王們，君王們使應以上帝所授之王權，本着上帝在其神聖的福音中所顯示的意志，去統治人世。這個目標，無論如何是不能藉着猶太人的幫忙而能得到的。」凡想使普魯士聯合議會成爲一個立法機關之一切努力，他均猛烈反對。甚至允許該議會有個定期的開會日期，他也不贊成。他宣稱德國統一乃是妄想。他衝着代表統一德國之國旗發嘲笑，並表示蔑視。而對於普魯士的國旗及顏色，他却表示喜愛——對於專制的奧國他表示敬意，且甚至還帶着親切的喜愛。

、由以上種種，他給我們一種證明，證明他有一種力量，直到後來，當他支配國家之命運時，這種力量乃顯出其重要了。就通俗的意義言，他絕够不上一位演說家：他口吃，訥訥，含糊，常常侮辱他的聽衆，並且有一次，因爲他的這種演說態度，使集會的人都喧鬧騷動起來，他竟轉過身來，以背衝着集會的人，從口袋抽出報紙立而讀誦，直到秩序恢復方才停住。但是他對於事情極認真而且熱心。他強迫與他同事的議員們聽從他，然而在議會之外，柏林雖然嘲笑他，但却記念着他。(三三)

(三三) 本作者曾有多次，聽過在重要辯論時，博斯麥所作的演說，並對他的態度有所記述，見他的自傳（指本文作者的自傳——譯者）第一卷，五九八，五九九頁。關於他對於議會中聽衆之藐視，見 Mendell 的書，已見前註，七頁。

到第三個月底，人們看出來這個普魯士聯合議會，是不能作出什麼事情的。結果牠被解散了。正在此際俾斯麥結婚，事實上證明這件婚姻很圓滿，他給夫人的信件均為德國文學中的珍品。對於他的事業她有很好的影響。直到他生命之末日，他的家庭生活很給他不少幸福。無論什麼時候，凡是提起這些幸福，他均認為都是受他夫人的影響所致。

一八四七年當他作結婚旅行時，他在威尼斯 (Venedig) 遇見國王非得利·威廉，他與國王自由傾談無所不講。就個人性格而論兩人不同之甚，無人能比。但是這位國王顯然被這位青年的政治理論說動了。他的理論乃是以高壓手段去執行政權。

在次年上半年，革命爆發，在柏林的情形更為激昂，並且第一次爆發時竟發生流血慘劇。俾斯麥立即顯示他是一位富有智謀的敵對革命的人。在與他的地產為隣的村莊中，他將德國國旗扯下來，升上了普魯士旗。因為受了他的鼓動，在那一帶的農民都宣稱：他們準備出發柏林以鑲刀與槍矛往救國王驅逐暴民。並且凡是他的隣人如與他的意見不同，他均加以恐嚇威壓。

他也用報紙作為他的工具。所謂的「十字報」(Kreuz-Zeitung) 乃是普魯士的大反動報之一，乃是極端的路特教派及教會和國家無限權力之擁護者的機關報——直到今日仍是如此。他為這個報，寫了許

多清楚，辛辣，鑿確的文章。這些文章雖然有時是很古怪的，但他們的確能夠煽動及團結那些極端保守的人們。

然而革命仍在進行。民衆將王宮包圍。在民衆之前，國王對於不堪的羞辱屈服了。他允許將軍隊開走，他同意制定憲法並召開普魯士議會，——不再像那個可憐的，老的，僅僅有建議權的普魯士聯合會議，而却是一個實實在在地制定法律的國會。

在這個普魯士議會之中，俾斯麥很快地就被人認為是一個領袖。其實，當他僅是一位代理議員時就被人認為他是領袖了。關於人民要求選舉代表參加議會，關於採用不記名投票箱以爲選舉國會議員之工具，關於由大多數表決國家問題，關於規定定期開會等事，他均大聲急呼地，不斷地加以藐視。菲得利大王仍是他的理想人物。他認爲提高國家地位的，不是國會而是軍隊。(三四)

這種情態並非祇是狂吠而不噬咬。比他的言論更可怕的是他的行動。從來沒有權謀家比他更固執的了。當他不在議會中去煽動人們去抗拒立憲派時，他日夜地在埃爾貝河下部，或在波次丹，或在柏林，

(三四)關於俾斯麥早年在議會中的一切努力，在給他的未婚妻的信件中，曾寫出一些很有趣味的事實。見 *The Love Letters of Bismarck*，紐約，一九〇一年。關於他的家庭生活的特殊動人的景象，特別請看 *Kendall* 的書。

集會他的朋友，去作抵對那些爭求憲政自由的一切努力。不問合理與否，他採取各種手段。幸而他有一片真摯的心與魄力才使他不致於變成爲一位荒謬可笑的好事者。當在革命爆發那些天，他喬裝雜入民衆之中，並且擠入將軍們，大臣們，王子們，及國王之羣中。有一次因爲國王對於革命讓步，他是那樣地叱責國王竟使王后叱責他，說他鹵莽。因爲他向這兩位將來的皇帝背誦反動的詩句，竟使他們流下淚來。他深深地陷於鬱熱之中：常在議會中，立起發言時，他的聲音有時訥訥吃吃，並且至少有一次他還落了淚。議會裏的自由派這方面的過激人物給他很多題目和機會，因爲這羣人之中，大多數均慣於在採取第一步驟之前，先行了第二步。在王宮，在兵營，他用精細的方略及尖刻的嘲笑推進他的極端兇暴的辦法。並且到最後還似乎得到成功了。因爲得到國王的允許，一位倔強的，傲慢的老軍人吳郎爾 (Wraugel) 元帥，將普魯士國會解散，但這個仍未能使俾斯麥滿意。他頗覺失望，因爲尙未發生流血。他所希望的是：應當用血寫出一種教訓，如此，牠方能延長達一世代之久，不致被人們立刻忘掉。並且他的最得意的計劃是挑播民衆走向瘋狂，然後立即用軍隊擊毀之。

但是並未需要流血，因爲大多數人民均厭煩空談，並嫌惡不安定——並且此外，因爲國王又取消了他的封建方式而允許了一個尙可滿意的憲法，並且又命令舉行新的選舉，因之乃頗得民心。因此新普魯

士國會一經成立，國王陛下的忠實人民便以感謝之忱，將大多數的反動代表送到了議會。俾斯麥便是其中之一——他終於成功爲正式議員了。

對於俾斯麥而言這是一個勝利。但雖然如此，各重要人物仍對他的意見抗戰不已。國王的新憲法像是欺騙了他們。並且，甚至俾氏所曾經幫助那些得到大臣職位的反動人們，不久也對於現代精神表示讓步了。在許多年之中，一切均陷於混亂，——有力量的人，心中既無清楚的宗旨，並且其趨向也無一定的目的，祇是在雲中，在黑暗中去戰鬥。

正當在柏林生出這樣的大失敗之際，在邁恩河畔的佛蘭克府也起始發生另一件大失敗。我們已經看到，在一八四八年五月，在這個古老的堂阜的城中曾有德國聯合議會在此開會。這個議會懷着極深的渴望，想建立德國的自由與統一。對於這個議會的工作，俾斯麥所表示的態度，與普魯士國會所表示的態度相同。對該議會的一切努力，他均以嘲笑與尖刻的諷刺去反對。並且，當議會將皇冠獻於普王時，他極動感情地反對國王接受牠——他的理由是這個皇冠是來自德國人民，這就是主權在民的表現。有一次他講演道：「這個佛蘭克府的王冠也許是輝煌的。但是必須先將金子熔成爲普魯士的王冠，然後那才是地道的真貨。」他對於用議會的方法完成德國統一之觀念不斷地加以嘲笑，曾向上帝表示他的希望

說：「即使佛蘭克府憲法早已如凋零的秋葉一般腐朽了，而此後普魯士人將仍然是普魯士人。」

在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期間，那個老的聯邦已變成爲稀薄無力的空氣，並且在彼時所成立的國會，如我們曾經看見的，也在佛蘭克府及斯圖加德變成碎片。混亂又來了。這時在歌塔(Gotha)有一個「會議」，又有一個由普魯士、薩克森及漢諾威三國組成的「三王同盟」，「依附」這個同盟的有二十八位小國王，他們都是傾向普魯士的，還有一個由巴燕及魏登倍所形成的聯盟，在這個聯盟之內有許多王子都是傾向奧國的。最後在一八五〇年在艾府(Erfurt)由普魯士國王又召集一個新的德國議會。這個議會的會址在奧古斯丁(Augustinus)教派的老教堂裏開會，因此使受一般人的信賴，因爲這個老教堂是因路特而被人記念着的。有一點，這個議會與以先在佛蘭克府的議會顯然不同，就是：——在佛蘭克府的議會其壽命達一年之久；而此議會幾乎尙不滿一月。牠的惟一的重要工作是爲德意志族國想出一個現成的，照例的，簇新的憲法。這個爲國王菲得利·威廉所建議，但竟陷於重重困難之中。俾斯麥也出席這個議會。他的惟一工作是對每件事均加非難。並且特別對於這個議會有自由傾向的每一方面都表示不滿。在彼時最足表現他的特性的是他激烈地反對公共集會。他辱罵那種集會，說牠是：「民主主義的煽火風箱」。他反對德國的三色國旗，——他拿起國旗輕蔑地說牠是「叛逆的徽章」。雖然更較自由的

意見很正常地在流行着，並且那個新憲法立即被批准，但是俾斯麥的諷刺似乎使牠凋枯而無生氣。牠在政治熱情的狂風中消失了，並且永遠不再聽見牠了。

比這個更壞的是：自一八四七至一八五一，在他首次參加議會的全部期間，凡是他出席的會議，他都因憤恨革命而使他不僅是國家統一的反對者，並且還是擁護奧國霸權的戰士。最壞的是：當奧國因受到俄國的幫助，在俄爾木次 (Olmütz) 使普國受到她有史以來的最可恥的羞辱時 (三五)，俾斯麥依然贊助奧國。那場羞辱是奧國強迫普國放棄一切統一德國的努力，屈服於奧國的恫嚇，並且要馴服地又回到以先佛蘭克府議會時的狀態——各國使臣坐在老舊的綠標之旁祇代表各國王而不代表人民。

甚至在他的演說詞及文章中，他也未曾使德國王及其大臣們的軟弱。他很刻薄地反對他們的政策。並且在普魯士議會開會時，他竟投票反對因允許憲法而對國王表示感謝。此次投反對票的祇有兩人，佔極端少數。國王非得利·威廉看他大概可以成爲一個有用的人，乃在一八五一年派他到佛蘭克府參加復活的綠標聯邦議會。起初任命他爲普魯士公使的參事官，不久即任命他爲公使。從此，這位青年政治家

(三五) 譯者註：一八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因奧國及俄國反對德國各邦與普魯士聯合，普國屈服，乃在俄爾木次開會議，使雖意志在普魯士領導下的統一夢想，告一結束。奧地利重新擔任聯邦會議主席之職，一切又都變成一八四八年以前的樣子了。

在此工作了八年。這種陞遷頗令人驚訝。他才三十六歲，並且僅是一位貧窮的及許多人均不信任他的鄉村紳士，沒有權貴的援引，也沒有外交的經驗。然而他竟被任命在普魯士整個外交工作中佔據了最重要的職位。

一一

俾斯麥在他的新職位上所表現的品質，其最足令人驚訝的是他的深刻的見解與先見，其最足動人的是他的毅然對抗反對者的勇氣，及其衝破反對勢力之力量。他的卓識與先見似乎由於直覺所致——由於突然的靈感將他的途徑看清，他乃決定他的作法；但是其實在大多數事件上這些靈感都是由於讀書與反省而來——有時他要用一年的工夫去研究所發生的事情，有時他又把這些靈感的火花集中在發生事端的那一瞬息。

他的勇氣永不銷沉。無論是反抗議會，或報紙，或民衆，或街頭發生的暗殺，或會議室中的國王與皇帝，他的勇氣永遠是一致的。當他晚年，他向全歐洲說道：「我們德國人祇怕上帝，此外別無所懼」。他祇是以自己的見解來曲解德國的歷史。

在他壯年就有許多顯然的例子表示出他這些性格。他入議會時對奧國極具好感。他是贊成奧國政策的人，及信仰奧普聯盟的人。誠然，當發生俄爾木次事件時，奧國確實立於受非難地位，不易為她辯護，但俾斯麥竟為她辯護了。他的理論是：關於德國內部事情奧國願意幫助普國，所以在外交方面普國應當幫助奧國。

然而此時他得到一種啓示，他發現老奧國是恨普國的。這種恨心在普魯士君主國之初期已經開始，由於菲得利大王的成功而更增加。他覺得這種恨心直到現在仍是對普國有害的。他發現凡是關於普國想向好處發展的每個作法，奧國或公開或秘密均加反對。就是普國想擴充她的合法的勢力，奧國也反對。他又發現小國們均懼怕奧國，並且在議會開會期間，奧國都是為自己打算，而反對各小國之一切要求。奧國在佛蘭克府議會中立於最高地位。但這種崇高地位的外表與顯而易見的種種作態都是很滑稽的。奧國的代表是當然的主席。並且似乎以為特別做張做致地擺出主席架子乃是她份所應為的。俾斯麥立即對這種做態加以攻擊。當他將近晚年的時候，在他的談話中，他有時很高興地陳述他年青時對奧國主席所玩的滑稽劇。關於奧國主席與俾斯麥的雪茄的故事是人所週知的。原來德國國議會特別重視先例。先例之中有一個是：凡奧國議長就位為主席時，他可以吸煙，但其他各國代表均不能效尤。有見及此，俾斯

麥乃從衣袋中掏出一支雪茄，走到議長身前，借議長的煙將自己的煙燃着。自此之後，每當議會開會，俾氏均悠然自得地吸煙。漸漸他的同僚們也鼓起同樣的勇氣，便人人都吸起煙來了。有一位很傑出的奧國議長，蒲勒開士（Prokech）伯爵也因俾氏而得到反省。蒲氏按照對奧國有利的方式將議會記錄更改了，並且大家都注意到此點，因而蒲氏想恫嚇各議員，說道：「假如那記錄不正確，則我使是一個說謊者。」俾斯麥瞠目直視其臉，答道：「一點不錯，閣下！」所有到場的人都爲之駭然。決鬥即將發生。但當俾氏很安靜地堅持其主張時，蒲勒開士以爲最好是將這件事加以改正。蒲氏的繼任人是雷須倍（Reuberg）伯爵。他的行爲幾乎與蒲氏相同。有一次發生了激烈的辯論幾乎動武，俾斯麥堅決主張要草定一個調查書，並且立刻拿出手鎗，雷須倍急聲稱他變更了他的計劃，因而未發生什麼傷害。關於取消奧國的優勢，俾斯麥又作出一件典型的事件。有一個慣例：當議員們去拜訪奧國議長時，議長坐着不動讓拜訪者站着說話。這個慣例很使俾斯麥生氣，當他拜訪議長時他乃安安靜靜地自己坐下。由此便又創出一條新例。他的這一切的偉大人格，他的潛伏的力量，他的完美的冷靜的沉着，他的應付事情之敏捷，他的幽默，他的隨機應變，都使他學強不屈處處勝利。

他給他的夫人，妹妹，及親近的朋友的信件，以及他發出的公文，由此時起，都顯出他對於綠襪會

議之藐視。對於這個會議的虛張聲勢，無用，譎詐的手段，欺騙的行爲，他不斷地作不平鳴。他認爲可以用一個協定來解決當前的種種困難，這個協定要保證對普魯士更加優待，或者利用戰爭使德國脫離奧國的羈絆。從他的行爲方面可以證明他的確是具有這樣的信念，有一件事是人所週知的，即在一個公共慶祝典禮上，有個奧國軍官指着俾斯麥的外衣上所戴的很少的並且零散的徽章，用着鄙夷的態度問他，那是曾在戰場上贏得的嗎？「是的，」俾斯麥答道，「就是在此地佛蘭克府與敵人相戰鬥得的。」

此際，在他的信中及公文申，他發表的堅信現存制度不能持久的言論愈來愈多。他相信普魯士得不到正常發展的機會，並且各小國的票都是受奧國的指使而反對普魯士的一切利益與希望。他每天都罵奧國人，——結果乃生出口角。有一次因爲這種口角幾乎使兩國起了戰爭。他在議會中所持的這種激烈的苛責態度，使他個人頗不受人歡迎，以致他與他的夫人在佛蘭克府街上行走時竟有人用石頭打他們。但他沉着自若毫不驚擾。波星格 (Her von Poselinger) 曾刊行四部八開本的俾斯麥書信集。這書告訴我們，俾氏由始至終均能自制。以文學論，以實際政治哲學論，這部書所表現的都具有幽默，機智，透視，及令人信服的力量。這書所集合的驚人的特性之多，爲其他任何類似的書信集所不及。其中以在佛蘭克府期間所寫的爲最好。

但是，當於佛蘭克府正在百無聊賴，蹣跚而行之際，克里密戰爭 (Kriem-Krieg) 起來了。(三六) 這
個又表示出來俾斯麥的先見與勇敢。

在這場爭鬥之中，英國，法國，撒丁尼亞 (Sardinia) 與土耳其站在一邊，俄國站在另一方面。這
方三強極力拉攏普奧兩國加入他們。奧國祕密地爲這種拉攏所引動。在一八四九年的革命期間，俄國會
從匈牙利的威脅中救出奧國。並且一八五〇年在俄爾木次，俄國又替奧國打败了普魯士。因這二事奧國
很感謝俄國。可是感謝心終沒有舊的恐懼心爲甚。所以她也祕密反對俄國。有一時期，普魯士也似要
被引動。本森 (Chevalier Bunsen) 爵士是駐在英國王廷的使臣，也是國王菲得利·威廉的最喜歡的顧
問，他像似將國王的心轉變了，要去反對普國的東方的強鄰。但恰在此際，俾斯麥出來干涉。在信件，
公文及談話之中，他告訴國王及其顧問官們，說：目前各國所爭論的問題與普魯士毫無關係；反之，去
加強普俄間之友誼關係，纔是普國所應關心的。俾斯麥與衆不同，獨具隻眼，看出這是一個最好的機
會，如果他能使俄皇對普國生出感謝之心，則俄國可以允許普國去打奧國。並且很可能地，俄國也許幫
助普國。俾斯麥認爲將來普奧間的戰爭是一定不能避免。因此，他雖不便公開表示他的這種見解，但他

(三六) 譯者註：一八五四至一八五六。

却努力使普國不反對俄國。結果在這場戰爭中，普國果然保持中立。可是也因為此點他樹下許多敵人，甚至在德國也有人攻擊他。英國對他施以各種攻擊，從議會的演說，及泰晤士報的社論，以及胖趣 (Punch) (三七) 中所載之諷刺畫，均對他不滿。從法國也發各種侮慢他的作法。(三八) 對於法國的這些攻擊，俾氏有一答覆，頗為人所週知。有一次法國公使牟斯鐵爾 (Moustier) 侯爵與俾斯麥作激烈討論，攻擊俾氏說他引着普魯士又走上另一場耶拿 (Jena) 戰爭，俾氏立即回答道：「怎見得不是走上另一個來比錫或滑鐵爐戰爭呢？」

(三七) 譯者註：Punch 者，乃一種傀儡戲之主要人物。Punch 身材短小肥胖，與其妻 Judy 口角，出語滑稽，故以之作滑稽畫報名。

(三八) 在胖趣中有一幅很惹人注意的諷刺畫，表不當時的普魯態度，見諷刺畫 The Roa Crucifix，表普魯士喝醉了，昏迷，王冠從頭上落下，手中握着一瓶香檳酒。在科內爾大學 (Cornell University) 有三部開本的德國諷刺畫，都是關於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描寫，在這三部畫中，很少見到俾斯麥的形像，不過在與諷刺畫為鄰的 Kladderadatsch 之中，一開卷，精氣幾頁，便很顯然的見出這位青年政治家之與眾不同了。又見 Walther, Bismarck in der Karikatur, 及 Grand Caricatures, Ummarock od Caricatures。又應提及的是，在科內爾圖書館中，有五部巨大的畫冊，其中所含的諷刺畫，都是在普法戰爭時，在巴黎所收集的，特別是在公社統治時代（即，自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四年及一八七一年的法國革命政府——譯者）所收集的。這些畫冊中將俾斯麥畫得很大很兇惡。

這位德國政治家很能够忍耐，對一切攻擊，均泰然處之。因為他已經知道他獲得了俄皇的好感。有一點可以作為這種謝意的證明，即在尼克老斯 (Nikolaus) 皇帝死後——時值克里密戰爭之中間——當新皇亞歷山大第二 (Alexander II.) 在冬宮第一次接見外交官時，這位青年君主曾用很嚴肅的字句譴責奧國使臣，並很辛酸地提起奧國以往忘恩負義的行為，而却轉身向普國使臣誠懇地致謝，因為普王及普國政府當俄國在苦難時期，曾對她表示友誼。(三九)

此時，俾斯麥的能力愈來愈為普國京城的人們所承認了。非得利·威廉派俾斯麥至維也納作暫時的公使，任期為一個月。派他的意思，一部分去解決稅率上的困難，但主要目的是使他能更清楚地認識普國的大敵國的政治與其政治家們。給他的國書並非普通常用的證件，而是國王個人的書信。國王的用意是想給奧國皇帝一種印象，使他知道俾斯麥對普魯士之忠心及他對於奧國之敬重。果然，奧國因此對俾氏特別以禮相待。但俾氏雖然充分利用這個好機會，努力去誘說維也納政府對於德國要採取更合理的政策，然而，到後來他毫無疑惑地確信：用和平方法解決奧普兩國間的問題是不可能的。

在佛蘭克府的整個期間，他儘量利用他的假期，以培養他的健康，及對於人的知識。他幾乎走遍了

(三九) 本作者曾目擊此書原案，並在貝內德之自傳中有詳細的敘述。

全歐洲的王廷；在匈牙利曾遇土匪之險；在多瑙河，萊茵河，北海，泗水；在斯干的那維亞各國及俄國打獵；並往還於佛蘭克府，柏林及其他大城之間。他永遠利用他的觀察力及與領袖人物之認識，以從事他的工作。

在他投身於歐洲生活之一切活動中，其最重要的是一八五五年去看巴黎展覽會時初次遇見拿破崙第三（三四〇）這次會面給他開出一條門徑，使他在此後數年中常與拿破崙會面，並且每次見面均得到益處。在他心中永遠不忘將來普國與奧國必有場爭鬥。這個戰爭一起，則普魯士絕對必須得到法國中立。故他一回國即向普政府建議設法培植與拿破崙第三的友誼。由於這個政策，他得到很多謗罵。他的老友們，以先會尊他為神權與正統的篤信者，現在都說他轉變為邦拿帕特主義（Bonapartism）的擁護者了。而這個主義正是神權與正統的最利害的敵人。但他不管這個，仍堅持他的主張。（四一）

（四〇）譯者註：拿破崙第三即拿破崙·路易（Louis Napoleon Bonaparte 一八〇八一—一八七三）為拿破崙第一之姪，富英雄思想，曾刊行拿破崙之理想（Les Idées Napoléonennes 一八三九），闡揚他叔父的理想，及對內謀人民福利，對外揚國家威靈之方策。於一八四八年被選為法國大總統，是謂第二共和。於一八五二年十二月利用人民總投票改為帝政，因為死去的拿破崙第一之子應稱為拿破崙第二，所以他改稱拿破崙第三（一八五二—一八七〇）。

（四一）譯者註：博拿帕特（Bonaparte）族之先人本為意大利佛羅倫斯（Florenz）的小貴族，十六世紀遷居於地中海之科爾西卡島，後該島（Corsica）屬於法國，遂為法國人。博拿帕特·卡爾有子女十三人，次子名拿破崙，四子名路易。邦拿帕特為此族之姓。然此地所指之邦拿帕特主義則專指拿破崙第一及拿破崙第三而言。

在一八五七年發生了一件不幸事件。非得利·威廉因受這場亂局的壓迫，竟失掉了他的理智。他的兄弟，皇儲威廉握了實際政權，在次年又成了攝政。這種變動似乎對俾斯麥不利，因為攝政將他由佛蘭克府召回，命他去聖·彼得堡為公使。俾斯麥常說，在這個時期，攝政怕他敵視奧國的心情過於狂烈，所以「想最好暫時將他放在冰上」。俾氏在赴俄之前，寫給普國外長幾封信，將他在佛蘭克府所得的觀察與經驗均總述其中。他極鋒利地指出奧國所持的目標與所採的手段。且公開宣佈：遲早這個當前問題必須「用火與劍」來處理牠方能解決。這些文件給威廉攝政以深刻的印象，並因之而使俾斯麥留於記憶之中不為所忘。這些文件是命定地成為新普魯士政治的福音之一部分了。

正在此時，有強力的人去實行反對奧國的好機會來了。由加富爾 (Cavour) (四二) 所促動的奧意戰 (四二) 譯者註：加富爾與志尼，加里波的稱意大利建國三傑（曼志尼有意大利建國三傑傳奇），加里波出身資產階級，受英國思想之影響甚深，想建一英國式的意大利十國。由一八五二年起為撒地尼亞 (Sardinia) 之相。他見奧國為統一意國之大障礙，故努力改其軍隊以驅逐奧國，而獎勵產業，提倡改革，整理財政，主張政教分離，封禪寺院，因之教皇對統一事業更懷敵意。為木意國統一，彼曾參加兩次戰爭，一克里密戰爭聯英法助土抗俄，二，法意聯合對奧 (一八五九)。於一八六〇歐奧領威尼斯，及受法軍保護之羅馬城外，整個意大利之統一幾已完成。彼於一八六一年逝世。俾斯麥想以普魯士為領袖以統一德國，加里波以撒地尼亞為領袖以統一意國，並且二國統一之公敵均為奧國，同時法國則有時為友有時為敵。普撒國情相似，故加富爾有撒地尼亞之俾斯麥之稱。

爭開始了。假如在此際，俾斯麥被召到柏林去主持大政，無疑地，他要捉住這個機會，使普魯士執德國之牛耳。但在事實上他僅能用由聖·彼得堡發出的公文行使他的影響。在一八五六年克里密戰爭結束。俄國對奧國的仇恨及對普國的感謝，依然存在。俾斯麥用全副精神去促進俄國對普國的這種感激的情緒。從俄皇以下，所有的官員均得到他的最大的親切的表示。在他的一封信中說：「在此地的生活就如同在阿布拉罕 (Abraham) 的懷裏一樣。」

在他給普魯士的公文中，不斷地懇願政府脫離奧法別蒙 (Piedmont) 間的戰爭(四三)，並且利用牠給普魯士造機會。因為他對於這個政策過於熱心，以致他本國中一些人對他的敵視也增加了，說他「是法國人的成份比德國人爲多」，這句反對他的話，後來竟變成爲嘲笑他的一般話句。

不顧他的這一切勸告，普國政府及人民，愈來愈傾向去干涉與奧國有關係的事，並且還贊助奧國。

(四三)譯者註：在維也納會議之後，意大利祇是一個地理上的名詞，並不成爲國家。北部的倫巴底 (Lombardia) 及威尼斯 (Venezia) 是奧國的領土，多斯卡納 (Nocera)，帕馬 (Parma) 及摩得拿 (Modena) 邦之統治者均是哈布斯堡皇系的人，中部爲教皇領地，南端由西西里王國 (Sicilia) 的君士是屬於親奧的布翁那皇系。所以全意大利均受制於奧。維也納尼亞烏是個獨立國。她在大陸上的領土有薩夫瓦及別蒙兩地。此處所指奧國戰爭即指奧意戰爭，時在一八五九年。

法意聯盟軍在麻根塔 (Magenta) 及索非里諾 (Solferino) 得了勝仗，奧國敗北。(四四) 這個事實，自然地挑起普遍的大德志的覺悟。對奧國的失敗，德國報紙極爲震動。在德國全體數百位新聞記者都安安穩穩地蟄伏在自己的各樣的窩中，自然要極端希望別人「去爲德意志的兄弟之邦與榮譽」而戰鬥了！這乃是記者們的慣技，毫無足奇。

幸而在此千鈞一髮之際，普國竟發現了奧國的狡諛——普奧兩國提議將兩國軍隊合在一起，但因指揮問題這兩個德意志國家立起了爭執。從此奧國懼怕普魯士比懼怕法國更甚，乃在維拉夫朗卡 (Villafrauca) 與意國締和，將倫巴底 (Lombardia) 割與意國。全部事情便因此而解決了。

一八六七年非得利·威廉逝世。威廉攝政在科尼斯倍 (Königsberg) 自加王冠，成爲普國之王。普魯士最偉大的畫家門澤爾 (Menzel) 爲了記念這件事情，曾畫一幅畫。這畫在巴黎頗引起歐洲的注意。於是乃將他懸掛於柏林王宮中。國王威廉身穿全副禮服，立於高的神壇之前，從壇上取下王冠，自己將他戴在頭上。在所有的普國君主之中，除第一位而外，他是第一個這樣地行加冕禮的。在一百六十年前，第一位普王用這種儀式取得非得利第一的尊號，現在這種典禮又出現了，因爲這位新國王願意——

(四四) 譯者註：索非里諾戰爭在一八五九年六月。法意聯盟軍已入米蘭 (Milano)，意大利統一在望，拿破崙第三忽變計，乃訂促里哥條約 (Zurich)，將戰爭結束。

特別當於革命時期之末——比以往更熱烈地主張：他的君權不是由人民的推戴而來，乃是受命於上帝。俾斯麥也在場。無疑地，這種舉動與他的君主主張正相合。然而他却有了一種新感覺：當他仍然專心一志要作個普魯士人時，他已經漸漸轉變成爲一個德國人了。（四五）並且，當他仍然堅持他的君主政治觀念時，他已經起始愈來愈信任民衆的援助了。他的感覺與五十年前使石太因努力將那臣屬於君王的人民變成爲公民的感覺是相同的。並且到最後，我們覺得俾斯麥也認清了：此後普魯士主要的同盟者，不是德國的各君王，而是德國的人民。

這位新王威廉第一，雖未具有他先人那樣的美德，但他却是一個比他先人更具勇敢更軍人氣的角。他的力量，常識，洞察力，都比他的先人強得多多。他的最顯著的性格之一，是他能選用有鐵腕的人們並且能與他們合作。很快地他就認識了駐在聖彼得堡的公使的特點，因而當俾斯麥在該城住了三年之後，便將他召回柏林，想任命他當內閣閣員。

但這個意思竟拖延而未實現。後來俾斯麥說，他的國王怕他是一個「政治搗亂者」，因此當國王尚

（四五）譯者註：一般人均認德國與其他國家一樣，自成一國。其實德國乃是一個聯邦同盟，內中包含有許多國家。直到一九一八年這些國王及諸侯方退位。明乎此，方能瞭解爲什麼俾斯麥由一個普魯士人而轉變成爲一個德國人。

在猶疑期間，且先令他去巴黎當公使。這與俾斯麥的心意恰相符合。以將可能發生的事情來看，他願意多認識法國及拿破崙第三。顯然地他頗贏得法國皇帝贊助他將奧國逐出德國的計劃。他在法國停留期間甚短，僅約有三個月。然而他在這個期間，所學甚多。他細細地研究法國皇帝，與他散步，與他談天，並將各種計劃均向他披露，以便探詢出拿氏的各式各樣的模糊的計劃與夢想。俾斯麥用巧妙的餌食，探詢拿氏的野心，並暗示法國應當允許普國去自由處理德國事務之理由。

這兩個人對於他們彼此的批評很奇怪。拿破崙第三斷定俾斯麥沒什麼了不起，而俾斯麥則認為拿氏是「一個大的未被人看出的無能之輩」。(四六)

在此時，國王威廉因普國軍隊在各方面均顯出弱點，心極不安。在奧國與法意兩國戰爭期間，普國曾試着要動員軍隊，因而這些缺點均清清楚楚地顯露了出來。國王和陸軍部長羅恩 (Roon) 想設法大量地增加軍隊人數，並重新改編。但普魯士議會中的自由派反對這種計劃。原意祇想暫時將軍隊擴大，而他們則怕國王要永久這樣做下去，故加反對。因此，當俾斯麥在休假期中，從西班牙回任時突然接到國

(四六)關於這些大會見，及此後之多次會見，特別在華雷次 (Walters)，的很詳細而很有趣的敘述，見 Von Poschingen, Blumack-Portefeuille, 第一卷，一四三頁以下。

王召令，令他立即回國。當他到了柏林，他見國王正陷於悲觀境地。及他台現國王，覺得他不懂極端抑鬱，並且早已準備好即將退位。國王用盡力量想以合憲法的手續反對議會，並且，甚至也想以不合法的手段去反對牠，但他的家庭，王后，太子，和太子的英國妃都堅決反對他。他們用英國的理論去說服他。他們從一六四八年（四七）及一六八八年的兩次革命引出種種歷史教訓向他說。（備八）因為這個革命會將斯手阿特（Stuart）王朝推翻（四九），所以他們特別向他指出：這些革命與現在想在普魯士發動的革命所含的理論是一樣的，並且其行動之方式也都一樣。

起初，俾斯麥以為國王不肯贊助他採取強硬手段，所以他不肯當宰相。但是，當國王問他，他是否準備好了與議會中的全國大多數代表相對抗時，他立刻回答：他已準備停當了。於是國王便將退位詔書

（四七）譯者註：一六四八年指英國清教徒派逼逐傾向國王之長老會議員，並宣佈卡爾第一為叛逆而言。

（四八）譯者註：一六八八的革命是，英王詹姆士第二，仰魯教及下權神聖，國人厭惡，乃發起歡迎荷蘭總理奧諾西親王（Prince of Orange, William）及其夫人瑪麗（Mary）回國繼承王位。威廉應英人之請，立調海陸軍向英國出發，詹姆士第二孤立無助，乃逃往法國。是為一六八八年的光榮革命。

（四九）譯者註：斯手阿特王朝起自詹姆士第一（一六〇三—一六二五）——卡爾第一（一六二五—一六四九）——卡爾第二（一六六〇—一六八五）——詹姆士第二（一六八五—一六八八）。

毀棄。

就這樣地，在一八六二年俾斯麥挺身與以憲法之救主自命的普魯士立法機關相爭鬥。有一時期，他像似將大部精力均用在鼓舞國王的勇氣。有一次國王與他談到英國內戰，及卡爾第一（Karl I.）與斯特拉福（Stratford）（五〇）的命運時，他直言道：爲了維護君主的權利，他甘願接受斯特拉福的命運。因此，菲得利大王及大選帝侯所具的老普魯士的感覺，便深印於威廉的心懷中了。他與他的大臣決定與普魯士的下議院相鬥爭。無論將憲法存在或取消必鬥爭到底。國王立刻解散內閣，任命俾斯麥爲宰相。俾氏從此便不願議會多數人的意見，而以己意統治國家。並於議會通過的預算之外隨意向國家徵稅（五一）。

（五〇）譯者註：卡爾第一於一六二五年繼承王位之後，堅持主權神聖觀念，並自謂：「國」的言語，就是威權」。大位溫德華。湯姆士（Thomas Wentworth）更助業爲虐。湯氏因有功封爲斯特德侯爵（Earl of Strafford）。於一六四〇年一短期國會」被解散後，卡爾又召集國會，以使審訊應付蘇格蘭軍之侵略。此國會所自之第一件事即將斯氏處死。於一六四八年克倫威爾將衆議院中之保皇黨清除之後，立即審判國王卡爾第一，當即組織高等法庭，由法官一百三十五人宣告下兩第一爲「專制者，叛國者，虐殺者，其普人民之公敵」，乃於一七四九年一月三十日處以死刑。

（五一）關於俾斯麥在詹特伯（Jantobog）火車上及巴勃勒斯伯（Babelsberg）王宮，勸說國王採取極端手段，在以下二書均有動人的敘述：Janchulitz出版的Bismarck's Reflections and Reminiscences，第一卷，二九四——二九七頁，三一五——三一七頁。及Buch的Bismarck and Some Secret Pages of His History，第二卷，四一四，四一五頁。

在任何其他現代國家所發生的議會鬥爭，都不像普魯士的這樣嚴重。俾氏就職後第一次演說道：「普魯士必須集中牠的力量以待良機。對普國有利的機會已有數次但均錯過了。普魯士的邊界不能適應強健有力的政治機構。目前遇到的重大問題不是演說與決議所能解決的，而是血與鐵。演說與決議那是一八四八年及一八四九所犯的錯誤，現在不能再犯。」他不顧多數人的反對，執政有四年（一八六二—一八六六）之久，他解散過兩次國會，且將議員遣回他們的故鄉。他任意從國庫提款，以爲行政及重整軍備的費用。在議會中他公然反對及藐視議長，並且，當議長命令遵守會場秩序時，他宣稱除了國王而外，他不受任何人的管轄。當反對他的人非難他時，他常常走出會場，在休息室吸煙。他給憲法下了一種解釋，凡是聽到他這番言詞的人，都認爲他說的話是一種侮辱。他罵他的敵人所用的形容詞，令全歐洲的爲之驚愕——其中有一句：「卡梯里那式的東西們」。(五二) 對於報紙他強迫使之沉默，或用金錢賄買。以致賢明之士長吁短嘆，理論家們怒髮衝冠。民衆在街頭侮辱他，恨怒他的情緒遠被四表，暗殺他的恫嚇竟有遠自西班牙來者。甚至比這更嚴重的，是柏林有人努力要以特制的法律去應付他。他的朋友見他有陷到斯德拉福的命運之可能——關於此點，國王威廉早就向他說過了——乃勸他將他的田地轉讓

(五二) 譯者註：卡梯里那(Catharina)紀元前108—122)羅馬叛徒。

與他的兄弟。但他滿不在意，並且其旁若無人的挑戰態度比以往更利害了。他所認為光榮的，是他絲毫不怕危險地將自己顯示於人們之前，而却小心翼翼地保護君主政體。他願意這個保護君主政體的責任。他似乎也覺到這個責任使他趨於滅亡，他似乎覺到他要作斯特拉福第二，被人送上斷頭台；但是他清清楚楚地斷定國王威廉不能步卡爾·斯瓦阿特的後塵。(五三)

同時，他又不得不與自己這方面的極端派格鬥。黑森·卡賽爾 (Hessen Kassel) 的老選王侯堅決地作了一些反動的惡毒行爲，雖然有國王威廉的諫言，甚至奧國的反對，他仍然作去。但俾斯麥擅發一個召諭書，派一個軍事情差送去，他立刻使屈服了。

至一八六三年對於俾斯麥的恨怨又爆發了。波蘭人起來反叛俄國，俾氏根據他的歷史智識：認為都是這一類的惡毒行爲致使波蘭傾覆。所以它不猶疑地藐視波蘭的革命黨。他知道在波蘭數百年來凡是好處都被大地主階級佔去了。波蘭本具有大片土地，令人羨慕的海口，及勇敢的人民，但大地主階級不願屢次國家所發生的不幸，努力設法使國家陷於無政府狀態，並且使牠成爲僧侶的，貴族的高壓政治

(五三)關於俾斯麥拒絕將產業品給他的兄弟以充公，事，見他的 Reflections and Reminiscences, Verdun 出版，第三卷，第七十八頁，及 Kendell, Bismarck et sa famille, 114頁。

的最適宜的地方。至於農民方面，真像施雷仙（Sothenian）的那句老諺語：「無論在什麼地方，如果農民困苦到不可救藥的地步時，便見他們緊擁抱兩個主子——僧侶與威士忌酒瓶」。

俾斯麥看出這場反亂又給他添了機會去增強普魯士對於沙皇（Czar）的同情。這個正正合於他最近的希望。因為如果普魯士一旦起了事端，則俄國可不出來干涉了。於是，他與俄國同盟。以普魯士的武力與俄國共同抗壓波蘭的叛亂。

關於此事，全歐洲幾百萬良善人民，發出可怕的反對呼聲，尤其以法國與英國為最烈。但一切均屬罔然——俾斯麥堅持不變。

當畢世均憎厭俾斯麥時，奧國看出這是一個好機會。乃於一八六三年夏在佛蘭克府召集會議，凡德國當政君王及行代議制的自由市均須出席。奧國宣稱要由這個會議想出一個新的更合於自由主義觀念的德國憲法。可是在俾斯麥的心中也有一個德國憲法，無論在那方面都與奧國所主張的迥乎不同。國王威廉原想去參加這個會議，可是在俾斯麥壓力之下，他很痛苦地違反自己的意志不去參加，以致奧國的計劃化歸烏有，他的兄弟之邦都很激動的對他表示輕視。

在一八六三年末尾，丹麥國王非得利第七逝世，因而引起危機，形勢甚是險惡。各國內閣早就因此

問題而深思熟慮，而在戰場上大動干戈，並且全德國人民均爲此問題而爭論——這就是什雷斯維——荷石坦 (Schleswig-Holstein) 問題。

在十九世紀的中葉，使德國政治家及外交家煩惱的問題，多至不可勝數，然以此問題爲最。其錯綜紛紜，其難於解決，幾乎人人皆知。據可靠的傳聞說，巴麥斯頓 (Palmerston) 爵士說過：從來祇有兩個人懂得這個問題——他自己與另外一個人，並且另外那位政治家已死，而他自己又將以先所知道的全忘掉了。按照丹麥法律看來，丹麥應握有此兩地之主權，並且如按照沙利克法律 (Salisches Recht) (五四) 看來無論什麼提議與辦法，如與既成事實相反，則丹麥有權否認。德國各邦根據德國法律，認可他們有統治這兩塊地方的權力，並且認爲其他國家的權力都因條約或用金錢購買而取消了。有的國家認爲什雷斯維公國的所有權應當歸牠，因爲牠與丹麥相隣，並且有很大一部分人混有丹麥血液。有的國認爲荷石坦公國的所有權應當歸牠，因爲牠與德國爲隣並且完全屬於德國血系。如以這兩個公國的每一國的權利言，牠含着應當分開的因素；如以兩國共同的權利言，則含有應當合在一起不可分開的因素。於一八一

(五四) 譯者註：德意志民族的一種習慣法，因其中含有 *Salisches Recht* 民族法律的一部分，故名曰沙利克法。該法律中有禁止女子承襲地產或君位之規定。

五年在維也納條約中，對這個問題已經有了解決，可是於一八五二年在倫敦條約中又有另一個解決規定。普國，奧國，俄國，瑞典，英國都曾伸手來干涉；德人與丹麥人之間曾起數次血戰，有時甲得上風，有時乙得優勝。丹麥全國均狂熱地堅持應由牠統治這兩個公國。在德國也以同樣的狂熱態度主張牠們應歸德國。學識豐富的法律家對兩方面均寫出令人信服的言論；兩方面的演說家均以我們的什雷斯維——荷石坦的弟兄受了虐待作號召，挑動人們去拚命。詩人們用德文及丹麥文寫歌詞，這些歌詞均以激昂，以憤怒——甚至以流眼淚之情緒而被唱出。丹麥國王所持的要求，恰與德國的奧古斯敦堡（Augsburg）王所要求的相抵對。奧古斯敦堡王的強硬態度，並不遜於丹麥國王。在某些教堂有人為某一國作祈禱，而在其他教堂又為其他國家作祈禱。

這場鬥爭幾達一世紀之久，鬥爭的場所為會議室及戰場。其鬥爭或作或停直至一八六三—四乃達極峯。德國由佛蘭克府聯邦會議派遣漢諾威及薩克森軍隊去為奧古斯敦堡清除障礙，尊牠為合法的主權者。但是這個別無他用，不過使已紛亂的情態更加甚而已。荷石坦仍然未有滿意的辦法，什雷斯維比以先更陷入了不可救藥的混亂。這個問題所包含的區域，有荷石坦及什雷斯維的兩個主要地區及小老恩堡（Lauenburg）公國，這些地方都是很有價值的；其面積超過七千平方哩，其人口超過一百萬。該地之人

民性格堅強，剛毅，勇敢，敬畏上帝。並且因為有大海口基爾（Kiel）乃將這人民及土地的重要性更增加了。

這塊地方與德國的傳統，語言相同。俾斯麥在此際看出如果將這塊土地與本國連在一起，及使其與本國福禍相共，一定與德國有益，於是乃下手要作出一些事情來。他的傑作出現了。固然，奧國與普國在佛蘭克府有過長期的爭論，並且關於這塊土地彼此特別嫉視；固然，俾氏是挑播這種爭論的主動者；但他突然像受了魔術一般勸誘奧國與普國聯合起來，將這件亂事告一結束。他極端巧妙地運用手段利用奧國政治家在當時所最怕的兩件事：第一，假如這兩國不出來干涉，則德國將起革命，並且德國也要攫取這幾個公國；第二，怕普魯士單獨去鬥爭因而增加了她的領土與威望。因此這兩國乃攜手解決這整個的問題。兩國肩並着肩進兵丹麥半島，戰勝了丹麥人，佔據了整個的什雷斯維——荷石坦區域。奧普攜手，全歐洲均為之驚訝。因為這兩國早就準備，互扼其喉，置對方於死地。但兩國終於攜手了。普奧雖然得勝，但戰鬥極烈，丹麥人拚命作戰。在戰史上，很少見到像丹麥人在度浦爾及阿爾森（Düppel, Alsen）對比自己兵力多多的敵人所作的英勇抵抗。然此種抵抗終因一八六四年所訂的維也納條約而結束。這塊多年爭論不已的土地為丹麥放棄而被奧普兩國佔去了。

但是要牠作什麼用呢？這件戰利品更使普奧兩國擾攘不安。使他們攜手的甜美的合理的理性，現在

又蒸發完了。奧國漸漸令人疑懼，俾斯麥也日趨驕橫。凡某方提出意見，對方一定反對。奧國提議應當任命奧古斯敦王為新得的地方之公爵。什雷斯維——荷石坦的大多數人民早就渴望他去統治；德國幾乎全體一致對他表示好意；甚至普魯士大部分人也都願望他作為一個合法的君主。普國王室一般地均喜歡他，王太子擁護他，並且就是國王威廉也認為他好。除與他有直接關係的兩國外，這同樣的情緒也普遍到英國，法國，及俄國。這三國都認為這位奧古斯敦人是一個真正的王子。然而俾斯麥反對這一切。他察探出來這位奧古斯敦人是一個虛偽者，並且發現他不能認識這個真正的問題——缺乏設法使一德國統一之誠意。他不願在同盟之中再多出一位王子，在名義上是獨立的，而實際是奧國的傀儡。至於關於奧古斯敦人的「權利」，俾斯麥也會捏造一些在表面上也與奧古斯敦人的一樣有根據——最顯著的是俄爾登堡（Oldenburg）的各種權利。並且因受俾氏的指使，法院中的律師們也造出各式各樣的有力輿論。其最足令人信服的，是：一切權利與要求均因最近的勝利而廢棄了。德國各邦，大多數均應由佛蘭克府的聯邦會議將這個問題解決。但俾斯麥立即提醒他們道：德國聯邦再沒有干涉這件事的任何權利——普國與奧國現在是根據戰勝權而佔有這塊土地的。法國與英國也要干涉，但俾氏用多多少少有些禮貌的外令詞令說：這件事與他們毫無關係。

這位奧古斯敦堡王子親自向俾斯麥堅決地表示他的要求。因此便發生了一幕冷酷的喜劇。忠實的編年史家布史(Busch)用俾斯麥自己的話將此事敘述如下：

「我記得在一八六四年曾在與我書房鄰近的臺球房內與這位奧古斯敦堡人會面，一直談到深夜。在起首我稱他「殿下」，並十分客氣有禮。但是，當我提出我們所希望得到的基爾海港，他說道：「那個大約像一方哩大小那麼一塊東西，或者，甚至有好幾方哩大，不是隨便可以送人的」——自然，我對他的話不得不表同意，但當我提出軍隊的要求，他又拒絕了，我與他再答話時便改了口氣，並且僅僅稱他爲「王」。最後我十分冷刻地引用一句老德意志諺語告訴他道：我們「能够扭住我們所孵出的雞的脖子！」

俾斯麥並不是長期的保持他的消極態度。他漸變積極。他決定(一)各公國不能再變成爲被奧國管轄的區域；(二)奧國與他們距離甚遠，故實際上她與她們無有關係；(三)普國與他們爲隣故有直接地實地關係，這種關係是：她們的領土與她的領土相連，而基爾海港是她擴張所必需的港口，故她有開掘運河與牠相連之權——由這個運河她在北海的領土可與波羅的海的領土連在一起，並可將她的鐵路網向北延長。本着這些理由，俾斯麥提議，對此新佔領的土地，奧國應在事實上放棄一切權利。對於這個提議，奧國在起首是拒絕的，但後來又支吾閃避，最後又表示願意考慮，但堅決主張要有賠償：要將西里西亞領土

的一部分歸還給她。這塊土地是在一百年前被非得利大王所搶去的。俾斯麥不理這個，認為德國寸土不讓，特別是非得利大王所征服的，他更認為神聖。

在這兩強之間，時時似乎有發生戰爭的可能。然而俾斯麥並未十分預備好，因此在一八六五年八月十四日成立一個暫時的權宜辦法，即吾人所知的曼士太因協約（*Convention of Gastein*）。根據這個協約，德國得到什雷斯維，並獲得以下各種權利：用很少數金錢購買奧國在老恩堡所有的土地，管理基爾海港，開掘運河以接連北海與波羅的海，建築通過荷石坦的鐵路，吸引各公國加入普魯士關稅同盟。奧國在荷石坦的土地現在被普國領土所包圍，並且普國鐵路在其境內縱橫密佈着。所有這一切，全歐洲都承認為俾斯麥漂亮外交的勝利。在以後多年，他常常以這次外交而自己誇耀。他與布史談話時，曾告他以下的故事：「當我正與柏樓木（*Blome*）（奧國公使——譯者）交涉曼士太因協約時，我拚命的玩Quinze（五九）。我不顧一切地狂賭，以致使別人均為之驚訝。但我知道我為什麼要這樣作。柏樓木曾聽別人說從玩Quinze可以測驗一個人的性格。因此他急於要拿牠來測驗我。我自己竊想，我應當誘導他，乃故意輸了幾百元錢。這筆款我應當要國家賠償我，因為我是向國王陛下服務，而故意輸的。果然

（五五）譯者註：一種類似二十一點遊戲之紙牌戲，其目的在成十五點，或與十五點最近之數，但不得過十五點。

我用這個方法將拍樓木給繞住了，並且使他作出我所希望的事。他以為我冒冒失失，（就許與奧國動武）所以他讓步了。」

國王威廉爲了這件勳功封他爲「俾斯麥伯爵」，以表示普國對他的感激。（五六）

但是，（奧國的這種讓步）不過是徒增紛擾，俾斯麥的活動比以先更增加了。他，其實許多別人也是如此，清清楚楚地看出來：這兩個聯盟國之間的戰事是不能避免的，並且雙方均皆備戰。不過普魯士預備的更比較好些。

對於意大利，俾斯麥現在將他很久以來所秘藏的計劃也作到最高點。與意國訂一條約將威尼斯（五七）送與意國，如果三個月內普奧起了戰爭，她須幫助普國以反抗奧國。他向普國的老仇敵們，如德國南部諸邦，其最顯然的是巴燕，及德國北部與中部諸邦，其最顯然的是漢諾威，用種種理由，孜孜不息地指示他們：在即將到來的鬥爭中，這些國最好不要反對普國。但他所得的成績極小。這些國對於普國的嫉

（五六）見布史(Busch)的日記(Diary)，英文版，第一卷，一四〇頁。及 Pöschinger 的 Bismarck-Portefeuille, 第一卷，一五三頁以下。Maffei 的 Vie de Bismarck, 第二卷，第六章及第七章，有詳細的敘述，並且寫得很精美。

（五七）譯者註：此時，威尼斯爲奧國領土。

妬心比以先更利害了。

次一個問題，是，如果俄國與法國出來干涉，將如何去應付呢？對於俄國，在一八五四—五六的克里密戰事時，俾氏曾拒絕聯合奧國及其西方諸國抗戰俄國。在一八五九年以後，當他在聖彼得堡爲公使時，他努力培植兩國間社會的與政治的關係，在一八六三年他幫助俄國壓制波蘭叛亂。他又預先向俄國表示，將來無論俄國用什麼方法去撕毀克里密條約時，他都願幫忙因爲這個條約阻礙俄國向黑海發展。這一切努力，將普國東方的偉大鄰人出來干涉的危險，給化除了。但是西邊這個大強國將要有什麼舉措呢？法皇拿破崙第三，在此際其奕奕之令名已達於極點。在克里密戰事中，他曾戰敗俄國，因此得到了英國的好感。在意大利獨立戰爭時，他曾以有效的方式幫助意國，因此，他得到了意國新王的好感。他曾使一位哈布斯堡 (Habsburg) 大公爲墨西哥的國王，因此他得到奧國的好感。他曾使羅馬的革命中途受阻未成大患(五八)，因此，正如他所預想的，得到了教皇的好感。由於他在一八五五年所舉行的國際展覽會，他使巴黎成爲歐洲的首都。並且，當他初握政權時，那些嘲罵他的歐洲國王們與政治家們，現在均羣集推勸里 (Tulleries)，歡欣喜悅地作他的賓客。俾斯麥也是這些人們之一。各式各樣的

歐洲政論家們，在此時，都流行着一種意見，認為這位皇帝比他的叔父更偉大。拿破崙風變成爲一種時髦的風尚了，不僅在歐洲即在英國亦然。並且最無意識的，最討厭的是一位美國人也寫文章要求在美國也應流行這種風尚。但是，在實際上這位法國皇帝已經過了他的威權的高峯。由於身體的衰弱，以致他的智力也減低了。他變成迂緩懶惰，甚至大意粗心。自從在意大利及墨西哥戰爭以來，他的偉大的軍隊尚未恢復牠以先的力量。一般人都未看透這一點，惟有俾斯麥很快地就發現了，並且要對此點有所作爲。

現在的大問題是：這位至尊至高的統治者能允許普國去擴張她的領土麼？他能允許在法國的邊界上有一個統一的德國麼？如果肯，須出什麼樣的代價呢？他曾經允許意大利各邦聯合在一起。誠然，他曾派兵去幫助他們，可是，他之所以這樣作，是他從加富爾得到割讓尼斯(Nice)與薩夫瓦(Savoie)的報酬。他將要向俾斯麥索那一塊領土作報酬呢？對於這個問題，及與此相連的其他問題，俾斯麥曾用了十年的工夫去研究。他每次與法皇會見均苦心思索研究，並且與他討論這些火熾的問題。特別在一八六二年他所作的更是如此。彼時，俾斯麥不願立刻當宰相，寧願被派到巴黎去當公使。因爲他願在當德國宰相之前，能與法國皇帝面面相對，以研究他。就是在其他機會，他也是如此地作。最顯然地是在一八

六五年十月，他在巴黎及比阿利茲（Biarritz）去謁見拿破崙第三，藉着長時間的散步與談話，他以驚人的坦白態度，與法皇討論法國對他的計劃所持的態度。他向法皇直說他努力完成德國統一使普魯士執德國牛耳及驅逐英國不容牠再干涉德國事務的決心。真的，他這種驚人的坦白，在起初曾給法皇一種印象，使他認為俾氏『沒什麼了不起』。但漸漸地俾氏的坦白也將法皇的坦白引出來了。法皇對於將來的夢想也吐露出許多。只一句話可將這些夢想總括無餘——法國必須將其國境擴張到萊茵河。

但對於達到這個目標，他所表示的活動非常的少。在比阿利茲這次會見，似乎加給他一種魔力。俾斯麥與他的密使，屢屢地想要知道法皇所堅持的是些什麼，但法皇的一切答覆均暗昧遷延。因此，他們祇有等待普魯士國力能有充分表現時再發動。當時，拿破崙非常地活動。他提議召開一個歐洲和平會議。但是太晚了。當他假裝是尼德蘭國王的保護者時，他想從荷蘭將盧森堡（Luxemburg）據為己有。當他宣稱他是比利時的最好的朋友時，他想兼併牠。當他自稱他願意幫助巴燕及其他德國南部各邦以對抗普魯士的侵略時，他想從這些地方攫得大部分土地。他甚至那樣地輕率，讓他的使臣貝內得提（Benedit），將他的計劃寫在紙上，並讓牠流到俾斯麥手中。對於拿破崙的這些作為，俾斯麥大致都遷就容忍。但他從不表示他一定要作怎樣的讓步。可是無異地，他也屢屢使法皇高興，告他假如普國得到成

功，法國可以得到一些土地，不過不是得自普國就是了。要想得普國土地，俾斯麥永遠坦白而直捷地拒絕。他讓法國所得的乃是他隣國的領土。

拿破崙所持的陰謀，不僅與俾斯麥合夥反對奧國，並且還不斷地與奧國政治家商量反對普國。他多方誘惑奧國，其中之一，是他提議將西里西亞歸還奧國。對任何事情，似乎他都完全站在指揮地位。法國的一般輿論是：普奧戰爭顯然地即將到來。而奧國必定得勝。本文作者當時正在歐洲，覺得在各方面，不僅法國即德國各小邦也相信奧國軍隊受到德國各邦——因各邦多怕普國——的幫助，必能戰勝。特別是軍人與教士們都持這種意見。軍人們相信奧國最低限度能有六十萬精兵開赴戰場。並且奧國軍官們都透澈地在意大利戰爭中得過實地經驗。受羅馬支配下的教士們，相信這場戰爭祇有一個結局，而這個結局一定是按着神的意思決定的。並且萬能的上帝也不能允許異教在這老帝國中佔優勢。這個老帝國幾世紀以來就是受教會扶育的。並且他們在法國皇廷中又找到了令人感動的擁護者，其領袖為皇后厄熱尼 (Eugenie)。

在這一情形之下，法皇的政策，無論是真實的或幻想的，都似乎完全顯露出來了。他一方面假裝着渴望和平，並表面上主張開一會議以阻止戰爭，但在另一方面却偷偷地挑唆那兩強互相敵視。他認

爲，雖然奧國或有戰勝的可能，但普魯士一定勇敢善戰，則兩方必均力竭聲嘶。並且，當兩國均在傾注全力勉強支持時，他再出來干涉，將軍隊開到戰場，那一國肯給法國最有利的條件，便使那國得勝。沒有計劃再比這個更巧妙了。

然而最令俾斯麥頭痛的困難是在國內。德國大部分人均劇烈地反對他。而以普魯士王室反對他的情緒爲最甚。王后，王太子——就是後來的皇帝菲得利第三——他的富有才能的妻室——即後來的菲得利王后——及圍繞他們左右的各黨派都堅決地反對他。並且，最壞的是，有時他們也能影響國王不贊成他的意見。當時的信件曾表出國王威廉幾乎是極端地遲疑，不願與他有弟兄關係的奧國君王相戰爭。至少有一次，他因不願與奧國戰爭而致感情衝動涕淚滂沱。並且使其偉大的大臣陷於極微妙的困難境地。在俾斯麥的回憶錄及其私函中，我們不斷地找到證據，證明克服國王不願與奧國開戰的心意是極難的一件工作，這個工作使他受到極嚴酷的試驗。(五九)

(五九)關於戰事的進展，及戰勝之後所應取的止當態度，國王威廉與其偉大的宰相，意見不同，並發生數次富有戲劇色彩的決裂。俾斯麥與布史對此，均有所陳述。但最近的研究覺得他們兩人的陳述，均有誇張不實之處。然而，國王與俾斯麥兩人的爭執，每次均經時甚久並且嚴重，同時因感情用事而陷於危境及流淚之事，確有明證。

普國的國會也是過度地在使他受苦。下議院堅決地表示反對他。並且議院中有些知名之士之所以阻礙俾斯麥完全出於狂熱，就像在美國內戰期中菲利浦·文得爾 (Wendell Phillips) 及其同志們去阻撓林肯一樣。並且因為下議院以大多數堅決地拒絕投票通過國家費用，俾氏乃屢次解散國會，並且不得國會通過而擅自徵稅。這當然是輕視憲法的行爲。(六〇)

這種熱狂的情態現在更加狂熱了。使他不勝困擾。一八六六年五月七日當他在柏林沿着菩提樹下的大路散步時，他被步林德·卡爾 (Carl Blind) 的繼子所襲擊。此人是一個革命黨。他是一個年青的猶太人名叫柯恩 (Cohen)。他用手鎗，在一個與俾氏很接近的地方，向他放射。俾氏未攜帶武器，他的朋友會苦苦地勸他要帶隻手鎗，他也接受這種忠告了，但那天他將鎗留在家中，並且連手杖都未帶。雖然如此，不可屈服的俾斯麥精神仍然顯出鋒芒。刺客五顆子彈尚未及全射出，他衝向刺客，打倒他。祇有一粒子彈染血，其餘的祇是燒焦了他的衣服。雖然他十分相信他受了致命的傷，但他仍然表示出他那無敵的沉着。他將刺客交與警察，然後安安靜靜地同他的家人與賓客一同進餐，就如同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六〇)關於改革軍隊，及普魯士議會之反對，Mator 的 *Vie de Bismarck* 一書中曾有有趣味而詳細的敘述。關於這場爭執所得效果，祇就俾斯麥個人而論，見 Kendall 所寫的書。

一般。這一類的事情不足以改變他的宗旨。他着着逼進，並且繼續不斷地巧妙地挑逗奧國。奧國震怒了，在佛蘭克府的聯邦議會中動議反對普國。奧國與德國聯邦中較大的國家站在一邊，普魯士與其餘小國們站在一邊。因此俾斯麥令普國脫離聯邦。大戰爭即時開始。俾斯麥用了四年光陰，不顧議會的反對，公然以自己的勇氣使普國能够增加軍隊及改組軍隊，現在才看出這些努力的結果。幸而有俾斯麥，毛奇（Moltke）與羅恩（Roon）等三人以致普魯士能立刻派出四大軍團開赴戰場。漢諾威七國並未立刻屈服，但在一星期之內使被征服了。她的軍隊被擊敗，她的國王亡命他國。薩克森立刻被蹂躪，國王與他的軍隊被迫逃入奧國國境。黑森（Hesse）很久就對普魯士懷有惡意，所以也有同樣的情態上被擊服——她的軍隊被打敗了，她的遺帝侯被俘虜了。那騷（Nassau）被攻下，其公爵逃到外國。邁恩河畔佛蘭克府自由城雖然在政治上，財政上，有很大的影響，但也完全屈服了。邁恩河以南的各大區域，如巴燕，魏登倍立刻感到滿足並且態度也甚至變為謙遜的了。其時，有三大軍團與奧國相抗，不但百折不回並且獲得勝利。直到最後，在薩多瓦（Sadowa）三軍會合，獲得了歷史上最大的一場勝仗。加入戰鬥之戰士達四十六萬人。以人數而論，是十九世紀最大的一場戰爭，也是自古以來的一場大決戰。

怎樣利用這場勝利呢？凡是軍隊領袖及絕大多數的文官領袖均鳴彩誇贊。國王威廉所提議的要求

是：割據奧國的大塊領土，藉此可使普國國境完整。並且要素鉅額賠款，藉此可增強普國財政。國王，總司令，將軍們，兵士們都決定將軍隊開入維也納。維也納門戶大開專等戰勝者進城。並且如將該城佔領，則可向天下表示，自從半世紀之前，聯軍佔領巴黎以來，這算是最偉大的勝利了。這樣地一作，則普國在俄爾木次（Ormskirk）所受的恥辱及在佛蘭克府所受的一長串凌辱，都可償贖了。德國全國要求這樣作，甚至俾斯麥的夫人及小孩也催他這樣作，全世界都希望他這樣作。

然而在此際就如同在其他時際一樣，那是俾斯麥，他反對他的國家，反對全世界。什麼都不怕，毫不妥協，他反對這一切辦法。他看出來：這場戰爭已經使普國領土增大，從北部與中部諸邦所得的土地是如此之寬廣，奧國永遠不能在德國稱霸了。他又看出來：現在已竟隱隱現出，在最近的將來與法國要有一場大戰。這是他的反對者們所見不到的。他預先看出：法國失望了，受欺騙了，被挑怒了，她的一切計算均成泡影了。如果不經過一場慘酷的爭鬪，她永遠不能允許在她的國境上建立一個統一的德國。在這個將來的戰事中，他看出有一個無可疑問的重要點，就是不能使奧國成爲普國仇恨極深的敵人。普國的真正政策，不是攫取奧國的領土，使奧國人民擔負一蹶不起的賠款，或佔領她的首都，以致惹起戰敗國民心中的不能和解的仇恨。他認爲真正的政策，是以獲得戰爭的主要結果而滿足，且要避免類似

報復，懲罰，侮辱一類的行爲。傑出的美國政治家說過：「永遠不要使你的敵人惱怒到不能和解的地步。」俾斯麥的睿智便是如此。經過一個長期爭辯，國王與他的大臣各走極端，俾斯麥爲了實行他的政策，最後不得不以辭職作威脅。這個威脅，對於國王威廉是永遠有效的。俾氏僅要求國王給他一個軍官委任狀，以便在軍隊中積極服務，以反抗敵人。在這場可怕的爭論之中，除了太子贊助俾斯麥而外，再無別人，就是太子其力量也不足與他的父親相抗。然而俾氏終於成功。國王極端勉強地按照俾氏的意見作決定。平和政策因而佔了優勢，軍隊離開維也納，講和的預備草約很快地就在尼克爾斯堡 (Nikolsburg) 決定了，後來被批准，是謂之普拉哥條約 (Treaty of Prague)。

如果比較俾斯麥對於德國西部各戰敗國所採的辦法，則俾氏對於奧國的政策更使人驚異。西部各國——漢諾威，黑森，卡賽爾 (Hessen-Kassel)，那騷，佛蘭克府自由市——並沒有像奧國那樣可以有引起戰爭的理由。他們不過僅僅服從聯邦議會及跟隨奧國而加入戰爭。但普魯士要想使領土統一及使國境達到圓滿地步，則這些國的領土是有無上價值的。並且不顧他們的抗議，連他們帶什雷斯維及老恩傑及荷石坦都完全歸併於普魯士國了。在現代的歐洲，祇有拿破崙敢用這樣的高壓手段來利用戰勝的好運氣。俾斯麥是那樣的聰明去選擇他的犧牲者，以致使他的功業垂於永久，這是拿破崙式的作風所不知道

的。

全世界均爲這些驚人的成就而眩惑了。用七個禮拜的時間，普國曾打了一場歷史上最大的仗，並且戰勝了。她的領土增加了四分之一，人口增加了四百五十萬。使全國人數達到二千三百萬。現在普國所統轄的地方，比其以往的最偉大的政治家所敢夢想的，更好，更大。她又多出了一個大海口；使北海與波羅的海連在一起也可能了。並且也能在世界海軍國中佔一席之地。比這些更有價值的是將奧國逐出了德國，使普國成爲新德意志國的指導者。這個新德國，人口幾乎達到三千萬，並且普魯士所轄的軍隊有八十萬人之多。

三

偉大的事件很快地接踵而來：『無論何事，均不能與「成功」相媲美』。在德國俾斯麥是一個最被人痛恨，最被人嫌惡的人，並且在歐洲也確是如此。然而現在他變成爲最孚衆望的人了。以個人而言，他在他的多數同僚中，早就爲衆望所歸。無論窮富都易於與他見面。他的住宅永遠開放。他富創造性，奇怪，機敏，有急智，愉快，善於說解奇聞逸事，巧於摹倣。雖然他偶而有點野蠻，但是他確能贏得很

多友伴。並且他還能用他的勇氣，清晰的觀察力，將事情實現的力量及統治人的能力等去使人們不能不尊敬他。他的成功使他變成爲全國的偶像。以先他從未在普國議會中得到大多數的擁護，但是現在他得到了。普國人民準備給他一切東西。此際，他的智慧的靈感又來了。當時他威權正盛，他很可以與他的議會中的敵人挑戰，並且甚至可以毀壞他們，但是，他僅僅請求通過一條法律，赦免他以往輕視議會的罪過。這個法律立刻就通過了。並且還通過五千萬元普魯士錢以備作進一步的軍事使用。有一百五十萬元賞給這場偉大勝利的領袖們。此款的大部分給了俾斯麥。他用這筆款買了發爾津（Varzin）的橘子園，這塊地方與他以後的生活有着很密切的關係。

現在建立了北德意志聯邦，包含從北海至邁恩河所有的德意志各國。這個聯邦的議會，有一上議院代表北德意志各政治區域；一個下院，其代表由普選選出，代表大多數人民。在這個聯邦議會之上，是普魯士國王，就像是他的總統。他對於管轄軍隊具有大權，但制定法律或否決法律，他沒有正式權力。這個整個的制度是俾斯麥提出的，並由德國各邦同意。從這個制度，我們可以看出俾氏很顯然地脫離了他的早年的觀念了。他的舊的對於議會制度的恨心，對於人民參加政權的恨心，對於限制神聖君權的恨心，都沒有了。並且代替以往這些恨心的是他對於某些觀念之認識。這些觀念都是他以先所厭惡

的。無疑地，對於這個發展，美國在此期間的駐柏林公使班可羅夫特（George Baneroff）對俾斯麥有很大的影響。俾氏自從他在格廷恩那個時期起，他就表示：他喜歡那些較比高尙的美國人，而班可羅夫特又對俾氏表示很強的同情。在那個時期，美國全權大使所發出的公文，提到之點很多，不僅關於軍事，而是關於新德國憲法之演化。他煞費苦心地向華盛頓的當權者指出：北德意志的憲法與我們的類似之點甚多。班可羅夫特是歷史家，政治家，地道的外交家，同時又是一位對民主政體的熱烈愛護者。他的人格深深地感動所有與他相識的人，特別是國王。他的理論，無疑地，對於俾斯麥的意見之生長有很大影響——特別關於成立一個聯邦政府，其中含有寬泛的合於民主主義的代議制這方面的影響為最多。俾氏的意見發展地太顯然了，以致他的許多老的反動同志永遠不能赦宥他。有個極端君主的與貴族的十字報，在以先他常向這個報紙投稿，並且與該報的編輯也有親密的友誼關係。但是，現在這個報轉而對他作激烈的反對，並且不斷地與他宣戰。（六一）

（六一）在班可羅夫特離開德國之後，過了幾年，本書作者曾親他為駐德大使。所以在德國政界中的領袖們及外交界的同僚們有很多的確據，證明班氏使德國政界對他有很強的印象。最令人感到希奇的是，腓特烈國王（現在已成為威廉皇帝了）在他晚年的時候，當他遇見美國大使，常常的問：「你的前任官他起居如何？」（Wie geht es mit Ihrem Vorgänger?）這是永遠指前任官班可羅夫特而言。關於俾斯麥對於班氏的印象，可注意的，是在菲特利斯魯（Friedrichshagen）地方俾氏房內歐洲各君主的像片之中有班氏的及格蘭特將軍（General Grant）的像片，及華盛頓與米爾頓（Hamilton）的半身像。見Duch的Diary（英文版），第三卷，三五一頁。至於俾斯麥努力使班可羅夫特留在柏林，見摩特利書集（Motley's Correspondence）中的「封俾氏的信」，及Love的Bismarck's Last Talk, 一四九頁。關於俾斯麥的好意，見Life and Letters of George Baneroff, 第二卷，二四六、二四七、二五四頁及其他各處，其中對於此點有特殊的證明。

此外還有令美國人發生趣味的，是俾斯麥不僅因為關於德國的事與他的老友反動朋友絕裂，而即使關於美國的事情也是如此。當德國對我們內戰期間的美國統一派表示有力與有效的同情時，那羣普魯士的反動者們刻酷地反對我們。他們渴望美國的共和主義衰敗與失體面。他們對於格蘭斯頓 (Gladstone) (見註八四—譯者) 及卡來爾 (Carlyle) 發表的反對美國的言論表示欣喜。他們慾望國王承認美國南部聯邦，而俾斯麥使這一切活動均成泡影。他覺得德國與一個依靠蓄養奴隸而存在的國家結同盟是不可能的。(K11)

在七星期戰爭 (指普奧之戰——譯者) 之後，用了四年的工夫，使北德意志聯邦鞏固了許多。並且，對於這個工作，俾斯麥所得的勝利，其快速及堅度毫不亞於毛奇與羅恩在戰場上所得的勝利。雖然法國皇帝虛張聲勢恫嚇德國，強迫在普拉哥條約中加上一款，宣稱南德意志諸國——巴燕，魏登倍，及其餘各國——與北德意志聯邦完全獨立，但是他又被欺騙了。因為在這個條約剛簽字之前，俾斯麥已經與這幾國訂立了特別條約。這些國都誓言：一旦與法國起了戰爭，牠們與北德意志聯邦一致行動。他現

(六二) 關於俾斯麥拒絕承認奧利堅聯邦，見上註 Low 氏的書，一四七頁。關於俾斯麥個人對於聯邦領袖們之同情，及其站在政治家立場而對於這些領袖們之反對，見 Carl Schurz 的 Memoirs 第二卷內所載的俾氏與 Schurz 的談話。

在推行各種方法以便各邦團結。所以此時這些國與聯邦間的關係比以前更堅固了。如果有一邦，又受了那個老的反抗普魯士的嫉妬心的驅策，而搗亂，則他即從兵器庫中操起種種有力的武器去打牠，其中最有效的武器，是他恫嚇牠將牠排除於關稅同盟之外。那就等於將被排除的國家的財政給毀壞了。這些武器，他偶而操動，對於聯邦以外的南德意志諸國，有偉大效力。如以巴燕而論，維特路斯巴和（Wittelsbach）王室對於霍亨索倫（Hohenzollern）王室的嫉妬心很深。巴燕國主張教皇全權論的人們，因普國是一個信基督教新教的國家，故反對普國甚烈。並且巴燕人民自有生以來，無論見到什麼東西，只要是普魯士的就討厭。所以對於巴燕沒有別的方法，祇有使牠記着：斥出關稅同盟，就等於毀滅牠的釀酒業。此際，俾斯麥又使用一個比這更巧妙的武器，當巴燕與黑森顯出形迹又要與法國重敘舊好時，他安靜地向巴燕與黑森的統治者們及政治家們暗示一種事實：祇要普魯士肯讓法皇吞併他在巴燕與黑森所選定的那幾塊領土，則法皇已準備好要割讓普國一些東西作報酬。對於漢諾威的老反動國王，俾氏向他索出普幣一千六百萬元，雖然國會反對此舉，然俾氏不管這個。因此該老國王以極端堅決的態度起始反對俾斯麥，並自養一隊兵。只要他看出俾氏有可攻擊之點使新聞記者向他進攻。但俾斯麥扣留他的這一千六百萬元很給他一個致命打擊，並且這筆款的大部分，都像俾氏所說的，是用在「循爬蟲之蹤」，以知

其穴之所在」方面了。因此使用這筆「爬蟲基金」去津貼新聞記者，很有一些顯著的作用。但這場鬭爭尚不是他成功的最高峯。他等待時機。他的這種等待機會的能力也與他肯勤勉努力的能力是一樣的。有許多極熱烈的愛國者，報怨他，說他尚不够十分大膽，他未能將南德意志各邦，特別是巴燕與魏登倍，連推帶拉地立刻引入聯盟。然而像推與拉的這種努力他均不贊成。他希望這些國王們與人民自己由深的信念中，甘願加入聯盟。我們美國內戰，此時剛告結束，以致在那慘淡經營的重新建設期間，南北兩方仍然互相恨怨，互相疑懼，互相嫉妬，互相譏謗。這種事實清清楚楚地指教俾斯麥不可燥進。他與僧正巴特勒(Butler)覺悟到：「國家有時可以瘋狂」，治這個病的最好方法就是等待時機。甚至，巴登要想加入聯盟，他竟拒絕，並囑她暫等。他想，最好不要再生出使法國嫉妬普國的新理由，並且他也希望國家的情緒能更達於成熟。他很喜歡引用諺語。這次對於那些指責他的人們又引用一句平凡的農民諺語，他說：「從聯邦以外各國中將巴登拉入聯邦，就如同從牛奶攪取乳脂，其餘的要酸得更快了。」(六三)

(六三)他用一句正一類的農民諺語，竟使奧古斯敦堡(Augsburg)觀劇下位的人閉口無言了。本書作者，有一次聽到俾斯麥親口又說一句諺語。當他在他的花園散步，同時正在討論德國與美國的財政政策時，忽然談到以先的各式各樣的普國的財政大臣的問題，關於這些人，他開口說道：「在開首我信任他們，但不久我發覺，就如同向農人所說的：有一些人，他們向其鄰人假裝着像似他們能有一頓很好的午餐，可是究其實，他們除了口水與飯鍋而外，別無他物。」

Gustav Schmoller 在他的很卓越的 *Der Brauch über Bismarcks sozialpolitische und volkswirtschaftliche Stellung und Bedeutung* 中，他很用心思的提到俾斯麥善於利用農人的智慧。在事實上，這位偉大的宰相，除了從歌德，莎士比亞，及老式律師所用的簡潔的拉丁文而外，只是從農民諺語中吸取智慧了。

爲鞏固這個新聯邦，這位宰相所賣的力氣，真是大得很。他與聯邦中每一邦訂立各種不同的條約，每個條約都是他與掌權的各地政治家們經過鬭爭而成功的。無論晝夜，他不得不在三個大議事機關中與重要的大問題相糾纏。這三個機關是：聯邦議會，普魯士議會，及關稅會議。對於每個問題，都須與各領袖，各黨派相爭辯或妥協。在世界各地都有複雜的問題來困擾他。但在他的心靈極深處，他的思想均集中於法國。法國全國時時提醒拿破崙第三不要忘掉第一帝國之光榮。假如法國的勢力不能擴張到萊茵河流域，最低限度也要擴張到南德意志各部，比利時及荷蘭。然而這位法國皇帝耽於夢想，遲疑不決。在各會議之中，俾斯麥屢次努力探詢他的準主義，但均無效。這位皇帝以爲，最好是當於奧，普及其他德意志各國因長期內戰而精疲力竭之際，法國再提出具體意見。但普國的勝利來得太突然，並且非常浩大，同時又在法國邊界建立一個德意志聯邦，以致將這整個的局面全改變了。他現在着起急來。甚至當七星期戰爭剛完，在預備條約尚未簽字之前，他的公使貝內得提就出現於普魯士陣地之帳幕中提出了法國的要求。

然而俾斯麥却不像以先那樣焦急了。並且用一種言詞宕開他的要求。他說，與奧國和平條件未確定之前，什麼事情都不能做。此後不久，貝內得提又出現了，並且還帶來種種恫嚇——他簡直等於說：除

非普國對法國有大讓步，拿破崙一定宣戰。對於這個，俾斯麥很憤恨，憤恨的效果是：法政府將貝內得提的宣言使之緩和，說，這是把拿破崙的話曲解了。因此，法國不斷重新努力；貝內得提囑咐囉囉地說，除非德國割讓法國一些土地，則民衆的情緒將要不穩，要危及邦拿帕特皇朝（六四）。接着，他便提出各種具體的提議，以犧牲德國，比利時，及荷蘭，而去撫慰法國人民的感情。邦拿帕特皇朝的境況，是真陷入危機了。以下各種情形更使法國不得不找些好處以平靜法國民衆的怒氣。那些情形是：法國向墨西哥派遣的遠征軍之崩潰；拿破崙曾令馬克西米蘭（Maximilian）為墨西哥皇帝，但是，此時這位皇帝竟被處死刑；美國書記官西華德（Seward）根據孟祿主義向法國提出強硬的通知書，且美國統一已經恢復，全國均對此強硬態度作援援；法國急進份子之擴大要求；法皇曾以最大努力向自由主義讓步，但是他的新的寬容命令是顯然地失敗了。而且在拿破崙第三這方面，他有一種個人的感想：他漸漸明白他不如俾斯麥聰明——他曾斷定「沒什麼了不起」的這個人，已竟證明出是他的剋星了。

現在法國試着用新穎而有光彩的展覽會以欺騙及撫慰法國人民。一八六七年光輝燦爛的巴黎展覽會開幕。各國君王與政治家均前往觀覽。其中有國王威廉和俾斯麥。其時拿破崙正與奧國皇帝薩爾次堡

(Salzburg) 會見，並且與德國各小君主們也正要進行會見。拿氏雖用各種方法以安慰法國人民，然而議會仍然反對他。特別以鐵爾 (Thiers) 之反對爲構成傾覆法國之主方。這些人非難法國皇帝之短處，並且預言他的衰落。這些敵人仔細地指出：法國皇帝應該永遠不許在法國邊境有一個統一的意大利或德意志。他們又指出：以先是加富爾，現在是俾斯麥都欺騙了他。雖然戰爭已竟迫近，但他仍設法避免。當他努力想得到邁恩茲，盧森堡，巴燕與比利時的幾個區域而顯然失敗了時，他仍然鑽頭覓縫地想得一些便宜，藉以抵制巴黎民衆的輿論，及國家之不信任。他不希望戰爭，他未老先衰，他因痛苦的疾病與優柔寡斷而煩惱不安。他個人有一個野心想完成他的愷撒生涯 (六五)。他渴望和平。

但國內反對他的勢力是太強了。民衆希望戰爭的狂熱，將士們的野心，僧侶們的陰謀，都激勵他走向戰爭。去將基督教新教在德國所佔的地位降低，去用這場新戰爭以恢復意大利的舊秩序——這種念想已經變成爲一種熱望。連法迪坎 (Vatican) (六七) 及全歐洲擁護教皇的人，都是如此着想。不幸的是，這

(六五) 譯者註：所謂愷撒的生涯，蓋指愷撒出身於平民家，彭培義 (Pompeii) 死後自任終身元帥，親文武大權，勵精圖治，注意民生，獎勵學術，修正埃及之太陽所。拿氏亦曾宣稱與各階層人相親近，並勵精圖治，故作者如此云云。

(六七) 譯者註：教皇原居拉特藍 (Lateran) 宮，至一三〇五年有一法人爲教皇，乃遷教廷於亞威農。一三七七年教皇返羅馬，時拉特藍宮幾已荒廢，於是乃居法迪坎，因此宮與聖安博樂聖廟相鄰甚近，可資防守。此處所說之法迪坎系指羅馬教皇之皇廷言，並非專指地名。

種教會的努力，對於從事政治活動的人們，最生效力的是以先的代巴(Bar)的女伯爵。她是蘇格蘭酒商基克派崔克(Kirkpatrick)的孫女，現在是厄熱尼皇后。她的西班牙式的特性由於女尼們，懺悔者們，及耶穌會士們的影響更發達了。他成爲僧侶團的篤信的使徒。因此，她乃用苦勤，嘲笑，甚至用威嚇，驅使她的丈夫走向戰爭。她與其左右的人焦急地想找一個開戰的口實——真的，他們與俾斯麥是一樣地焦急。到最後，戰爭終於來了——並且是全套的。西班牙政府在不幸的王后伊薩伯拉(Isabella)被放逐之後，正想找一位國王。各式各樣的候補者均未成功。而到最後，俾斯麥背着國王威廉悄悄地努力，提議以霍亨索倫——西格馬倫(Sigmaringen)皇室中的一位親王去爲西班牙國王。他的名字很受西班牙歡迎。他是天主教徒。他與普魯士君王的關係很遠。在事實上他與拿破崙第三的血統關係比與普王近得多多。但因他是霍亨索倫族系故有此名望。同時，西班牙的領袖們正陷在絕望之中，渴望得到像他那樣值得稱許的統治者。於是乃請他去爲王。在多次遲疑，甚至謝絕之後，他終於接受了。(六六)

(六八)直到近世，普魯士學者們的一般論調，都認爲以在卡爾大帝之前的人爲卡爾大帝之候補者。卡爾大帝，在以其自傳時並未參預，甚至，像薩貝爾(Von Sybel)那樣偉大的歷史家，亦作如是說，但是由他史(Cohen)及羅尼尼的卡爾大帝史(Karl von Ranke)兩人的同類錄所披露的材料，可以補正。俾斯麥是卡爾大帝之候補人之一，並且在卡爾大帝的最初階段，國王威廉對於他的宰相對於這件事情的舉動，並不充分知悉。因爲卡爾大帝是卡爾大帝的一份子，又是普魯士的官吏，所以凡有人請他爲王之後，他請求卡爾大帝的同意。普魯士的強權應允了。不過對於卡爾大帝的一切陰謀，國王雖並未參預。特別見 Reminiscences of the King of Roumania, Tschunitz 著。Whitman 編纂。1900 頁及其下；關於 Lothar Bacher 赴西班牙的觀察使命，或 Bamber's Reminiscences 中有所隱露。

西班牙請他爲王的消息剛剛公佈，巴黎報紙即刻攻擊法皇，責他不應允許這事。並且立刻起了騷亂。法國人士認爲：俾斯麥剛剛在法國東邊建立一個統一的德國，現在又要在南邊造出一個霍亨索倫系的國王。法國外交部長格拉蒙 (Gramont) 公爵，一位華美而無用的人，很快地加入民衆之羣，且令駐普國的法國公使貝內得提去見國王威廉，要求從他得到能令法國滿意的保證。其時，威廉正在埃木斯 (Ems) 安靜地行海水浴。法國所要求的保證其最重要的是：要這位青年親王取消去爲西班牙國王之諾言。這位年老的普王雖精明但頗仁慈，他一方面表示這件事是家庭的而非國事，但同時又表示他自己十分願意使這位親王自己告退。真的，他願望這位親王自己告退之心是那樣的甚，竟致憎厭俾斯麥，並且暗示要俾斯麥辭職。去找這位霍亨索倫親王很費些工夫，因爲他的保樂座落在德國遠方，而他又未在家。這個給法國一個很大的煽動機會：替動聽聞的報紙，民衆演說家，議會中的各黨派，互相競爭着去責難這件對不起法國的事情。但最後從普魯士國王來的消息生了效力。同時法國當局不久即由西班牙政府得到通告，說，親王已取消爲西班牙國王之議。

國王威廉，皇帝拿破崙，青年親王，以及世界一般人都以爲這件事已經完結，俾斯麥似乎失敗。因爲在開首國王威廉及霍亨索倫親王們就不贊成這個計劃。他們全怕紛擾，而年老的國王的第一個

希望是和平。對於這件事，俾斯麥失敗不止一次。他曾屢次從外交部派他最信任的心腹人去到馬德里（Madrid），並召請西班牙最有能力的使臣到柏林。並且僅僅經過三次顯明的鬥爭之後，他終將國王與王子們的躊躇給克服了。他提出的主要理由是：給霍亨索倫族系增光；德國可以從住在馬德里的與德國有友誼的國王得到軍事上的威望與商業上的利益；希望使西班牙半島無人統治之狀態告一結束。但在這些理由之背後，有一個理由，除了他自己再沒向別人承認過，至少對於國王及各君王們。自從普魯士戰勝奧國以來，他就看出與法國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他認為惟一的問題是這場戰爭在什麼時候發動，是在對法國有利的時候或對德國有利時。他知道法國全國對於戰爭均缺準備，但是如果讓霍亨索倫系的王子去為西班牙王，則必激動法國不顧其無有準備而與普國相戰。最使他失望的是國王威廉把他的整個計劃給破壞了。他的失望竟使他到了不能睡眠的地步。於是他又以辭職相要脅。

然而誰能制止民衆所能作出的種種愚行爲呢？法國政府，議會之兩院，人民，都從最可靠方面得到報告，說他們的軍隊絲毫沒有準備。但他們不顧這種事實，依然堅持他們的要求。這些要求，別無他用，祇有立刻引他們走上戰爭。從法國煽動革命的政治領袖的要塞中，從報紙的驚人消息的製造者們，從民衆集會，及從立法的議院，發出尖銳呼聲，說，霍亨索倫王子的答覆，對於法國的侮辱是更利害

了。「爲什麼不由西班牙答覆呢？」「爲什麼不由普魯士國王答覆呢？」（六九）

被這種騷擾所推動，格拉蒙伯爵又用電報向貝內得提發出追加命令，令他必須從國王威廉得到：不僅要青年王子放棄王位，並且還要有個宣言，宣佈在任何情形下永遠不能有霍亨索倫系的人再爲西班牙王位候補人。連一瞬的工夫都不許貝內得提鬆弛了他的努力。從七月六日至十三日在這個致命的星期中，格拉蒙每天都發出電報訓令，頻頻催他去更進一步地壓迫國王，得到更明確的保證。其實他是想爲巴黎民衆得到保證，證明普國國王是被法國羞辱了。並且爲要使這個更要確切無疑起見，格拉蒙親手替普魯士駐巴黎公使寫出一個道歉及保證書，要普王將牠送給法國皇帝。（七〇）

（六九）關於法國議院中所發出的暴民式的辭令，其代表作品，見貝內得提（Benckert）的 *Ma Mission en Prusse* 附錄，四二八，四二九頁，及其他。

（七〇）關於 *De Gramont* 爲了羞辱威廉皇帝，而出的力量，其令人可注意的代表作品，見七月十二日上午二時，他給貝內得提的電報中，他親自在字下劃線的那一節，及在貝內得提的 *Ma Mission*（我的使命）等書中帶有 *très confidentiale*（十分機密）記載的部分，見該書三六九頁。還有些記述，因爲記述的人品格高尚，故頗有價值，並且他在埃木斯（Ems）曾長期的服侍德皇，這些記述見 *Heinrich Abeken* 的生平（他的夫人所寫），三七三—三七八頁。關於格拉蒙的其他缺點，特別關於他的偽善之點，見 *Koehnberg* 在 *Friedjung* 出版的 *Der Kampf um die Vorherrschaft in Deutschland*，附錄，第二卷，五二六頁。*Koehnberg* 是奧國人，這一點是可令人注意的。

國王威廉真是陷於困難之中，他從來不想以霍亨索倫系的王子爲國王後補人。他渴望和平。並且從他私人函件我們看出來，當他以爲這件事已經結束時他是很高興的。另一方面在這個星期中俾斯麥從爾津給國王電報，囑他堅守立場，假如有什麼困難，請將這事交給他的宰相去辦。俾斯麥又用各種方法暗示國王，應當召他到場。這位國王並不是那樣易於駕駛：他顯然懼怕俾斯麥的好鬥癖性。他願親身處置這件事情。但是不久，他覺得這事非他所能勝任，乃於十一日打電報給他的宰相。太遲了——在俾斯麥能夠來到之前，危機已至。因爲在十三日清晨，當國王作清晨散步時，正在埃木斯的散步場在他的臣民之羣中啜吸熱蘇打水時，貝內得提逼迫他明確地保證：他永遠不許霍亨索倫族人去接受西班牙的王冠。這位國王很有禮貌地，但很堅決地告貝氏說，他不能給這個保證，並且關於王子雷歐波德（Leopold）放來爲西班牙國王的事，除了以先得到的消息外，尙未再得續報。關於這件事，有位官吏將國王說的話告知俾斯麥，並且說國王陛下接到王子一封信，聲明他放棄王位，接到此信後國王決定再不接見貝內得提伯爵，並且僅僅令一傳令官告訴貝氏國王陛下再無別話可向他說了。這位官吏又告俾氏說國王讓俾氏自己決定可否將這件事告知普國公使及報紙。

這個電報使俾斯麥的憎惡達到極點。他不繼續由柏林向埃木斯的行程，而願回到發爾津。他是向國

王負責的大臣，這件事應與他商量，而國王竟讓步了，以致法國民衆因此而得意而吱吱歡笑，並且更作進一步的要求。爲了這位索索倫的後補人，俾斯麥是那樣地熱望而努力，並且也用了那樣長的工夫，而國王竟將他擯棄。並且這個公文似乎顯出甚至到了這個地步，國家尙未確定這件事已告結束，他還想再作進一步的交涉。這個與俾斯麥的意見正相反，他覺得在他的國家之前，在歐洲之前他是被侮辱了。他在柏林與毛奇羅恩會見，兩人立時對他表示贊助。他們也認爲：法國已經決定開戰，那麼，對於德國而言，沒有比目前的機會是更有利了。他們以爲如果國王將這個機會丟掉，則法國將來有充分準備之後一定要打普國。所以當這些事情在轉變時，這三個人都大不高興。俾斯麥用電報得到國王允許將這件事刊於報端。他將國王所告知他的，及那位官吏所附加的話，混在一起。他所取的材料不多不少，恰恰足以使這整個的經過看着像似：貝內得提曾要求國王給明確的保證，而國王拒絕並且直捷告訴他再不理他了。

俾斯麥將編好的辭句念給這兩位將軍聽，兩人都高興起來。俾氏後來述說這件事時，說，羅恩當時說道：「這個辭句比原來的好」；毛奇說道：「這個口氣是不同了——以先的口氣像似商量的，現在這個像挑戰的」。俾斯麥自己說道：「這就像拿一柄紅旗去惹蓋利克（七二）」。最有意義的是

（七二）譯者注：即法國的牡牛。

在送出這個文書之前，俾斯麥又問毛奇一遍，如果立刻開仗，勝利的機會到底有多少呢？這位偉大的戰略家答道，「保管勝利，一切機會均有利於德國。」（七二）

這個文書即送達報館，午夜之前到達巴黎。法國戰爭情緒熱到不可遏止地步；巴黎民衆因贊成戰爭而在狂亂；報紙要求戰爭；皇帝屈信的將領及廷臣們堅決要求戰爭。祇有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單獨地站在議會之中反對牠——鐵爾。雖然在他的整個的政治生命中，他慣於激怒法國反對德國，並且最近又堅決主張任何法國政府均不能允許德國統一，而他現在却努力阻止全國贊成戰爭。本着他對於政治與軍事的豐富知識，他看出法國並無充分準備，並且知道她是走向地獄去了。他善於判斷災難與革命，因為他曾被

（七二）最近許多著作家，因鑑於俾斯麥的回憶錄有自相矛盾之處，又鑑於有一封信，該信據說是藏於俾氏家中，不過現在是已經失掉了，似乎認為一般人所說的，關於俾斯麥及這兩位將軍修改國上的定報這件事，不僅僅是一種傳說而已；多數人的意見，似乎都認為以上所述的事實是可信的。高爾（Clouet Kohl）曾經詳細地說明俾斯麥在他的回憶錄中的記憶力之強度令人可驚，並且，甚仔細小心的楞茲（Lanz）也認為俾氏所述說的大致是真實無欺的。見 *Houbert Kohl, Wegwisor durch Bismarck's Gedankens und Erinnerungen*, 一七、一七八頁。及 *Reynolds* 及 *Lanz, Geschichte Bismarck's*, 三四九頁，及其以下諸頁；及 *Mittler, Bismarck et Son Temps*, 第三卷，第六十頁，註。

壞了以前的三個政府，學會了研究時代的徵候。他充滿了淚，想要議會制止戰爭，但都無效；法國上院全體贊成宣戰，下院是二百四十五票對十票。

關於這件事，普魯士，其實是德國，表示同一的決心，比法國冷靜沉着，同時也更真摯。七月十九日法國戰爭宣言到達柏林。俾斯麥在帝國議會之到，堅決地說：法國早已決定，只要有口實可藉，便即開戰，現在這個宣言就是由決心所生，並且自法國政府第一次給德國政府的正式照會及外交通告起都是本着這個決心來的。他特別指出法國因想羞辱普國及她的可敬重的國王所故意表現的那種匆忙的態度。俾氏所使的策略最生效的是由倫敦泰晤士報及其他機關很快地將以先法國的提議公佈於全歐洲。法國這些提議是在和平時期提出的，內容是她要將比利時，荷蘭，及南德意志的領土歸併於法國。這些提議之中，有些是從法國機關報摘下來，有的是具內得提自己親手寫的。他用複寫版使她們流到各地。由於這種作法使全世界都知道曲在法方。

德國以驚人的勇敢與準確的計劃，推進戰爭。開赴戰場的人數在五十萬以上。並且她的全兵力，如包括預備兵，可足有一百萬。在兩星期之內，德國有三大軍團到達萊茵，又過兩天，便接連地得到大規模勝仗。在外森堡，渥爾特，石庇協爾恩，馬斯·拉·圖爾，格拉維洛特，到處勝利。從來沒有人打得

再比法軍更勇敢了，但不久就顯出來，他們一切的英勇奮鬥到頭均必失敗，因為德國軍隊像機器一般準確；組織，管理，合作，指揮，分配，都十全十美。而法軍由始至終都毫無秩序。從後來公佈的前敵司令官與巴黎政府間往還的公文可以看出法軍完全沒有組織。整個的機器都脫環錯位。下階官與兵士各地亂撞去找他們的團隊；司令官們沒有他作戰地域的地圖；大礮沒有礮彈，礮彈沒有大礮；軍隊沒有武器，甚至沒有鞋。並且不久，馬克馬航 (Marmahon) 元帥在初期戰爭中便被打得慘敗。德軍很巧妙地阻止他的軍隊去與法國主力軍相聯合。他被迫跑入塞丹 (Sedan) 的馬斯河 (Mass) 畔的山中，並且被迫投降，以致造成歷史上最大的投降記錄。被俘虜的人，有皇帝，馬克馬航元帥，四十位將軍，八萬以上的兵士，及大量軍械裝備，及塞丹要塞。

在戰爭期間，由始至末，俾斯麥都立於次要地位。他曾同着軍隊一同進軍；向國王威廉建議；與世界各國內閣保持聯絡；及偶而照拂他兩個兒子。一個受了很重的傷，另一個在馬斯·拉·圖爾的一場兇猛的騎兵襲擊時跌下馬來。但現在他挺身而前成爲領導人物。那是他，第一個人去等候被俘的拿破崙，對拿破崙他表示很大的尊敬，但在投降的整個條件沒有確定之前，他很峻厲地阻止這位被俘的皇帝與易受感動的普王會見。九月四日巴黎執政者正式令皇帝退位，又成立第三法蘭西共和國。這種事實使俾斯麥

認為難解的問題更複雜了。因為截至目前為止，他都是與拿破崙政府相交涉，而現在這個政府不存在了，皇帝又在德國領土上成爲俘虜。想找出一個法國政府，或建立一個可以與德國辦交涉的政府真不容易，真是一個困難問題。

接着，德國又得不少勝利。無問題地從此走入了一個劃新的時代。在九月，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投降。俾斯麥親眼看見他恢復埃爾薩斯 (Elsass) 及其在歷史上享盛名的首都。俾氏的偉大夢想現在實現了。埃爾薩斯是在二百年前被露易十四(七三)從德國搶去的。幾天之後，俾斯麥住在凡爾塞。在此地，從他所居住的哲瑟 (Cesars) 夫人的質樸的住所指揮事情。他的工作真是龐大無比。他所肩負的工作有王家會議，有與國王們，將軍們，僧正們，從各省來的政治家，從各國來的公使們的各種交涉，而其中最重要的是與鐵爾，法夫爾 (Julius Favre) 及其他等人間之交涉。這些人想成立一個休戰協定，並且，假如可能，想成立一個和平條約。俾斯麥首先努力要作的事，是想在法國建立一個負責政府。與這個政府可以簽訂一個規定權利與義務的條約。然而事實上證明這個工作特別困難。因爲法國雖然有一

(七三)譯者註：於一六四八年參加三十年戰爭(一六一八——一六四八)各國訂立維斯特法倫和約，德國割讓埃爾薩斯與法，因而惹起以後多次之國際戰爭。

個政府，但軟弱無能。凡與布爾邦 (Bourbon) 皇室，與俄賴安 (Orléans) 皇室，博拿帕特皇室有關係的人們都自行已是，計劃要恢復自己的皇朝。無政府主義的羣衆，設法在法國主要城市實行他們的荒誕的計劃。甘背塔 (Gambetta) 也乘着汽球逃出了巴黎。他企圖將法國西南部拉攏在一起，成立一個議會。在這個議會中除了他的同黨而外餘均排斥。在此際德國仍繼續得勝仗。在塞丹投降之後，尚不足兩月在美次 (Metz) 又得大的勝利，比在塞丹得的勝利更成爲壓倒之勢。美次是法國東部的主要防禦地，爲羅丁根 (Lothringen) 的大要塞，是歐洲西部最重要的要塞，其重要性僅次於直布羅陀 (Gibraltar)。在這個要塞投降的人有法國三個元帥，六千官員，十七萬以上的兵士，三十萬組武器，及非常多的軍用品。此時又出現一個特別令人煩惱的紛擾。因爲克里密戰爭強迫俄國放棄牠在黑海統治自己的海口及沿着自己海岸之優越地位權利之後，俄國使自忍侮辱對外事從不置喙。然而現在俄國人再不保持他們的鹹默態度。在這個混亂之際，他們強要取消那個條約。對德國而言這是一件煩惱事。因爲這種要求一定很嚴重地觸犯英國。俾斯麥在與法國開戰之前，曾秘密贊助這個要求，而現在必須公開了。他努力與這件煩惱事相奮鬥。英國勉強屈服，全歐洲均認爲對此事以持默許態度爲最上策。

在集乘俾斯麥身上這一大堆事情之外，現在又加上一個問題。許多方面都比其他問題更複雜，範圍

更廣。這就是許多德國人又要求德國統一及成立一個能表現這種統一的政府。這是一個老希望，也是一個大而不可不祥的希望。事實上的困難太大。老權利，特權，前例，嫉妬，不信任，恨怨，個人的，種族的，宗教的，——理論，風俗，法律，政治哲學，過去的歷史，將來的希望，都不相同——這些困難集在一起，使這個問題簡直無法解決。整個問題中最大的困難是如何處理南部各邦。巴登與黑森比較容易處理。但是處理巴燕與魏登倍則較困難，因與此二國鬥爭的歷史很長並且也很嚴重。俾斯麥用他的全副技巧與力量去應付各國的君王與政治家。並且也需要他的全副忍耐力，因為有些時候他以為將他們說服了，或者征服了，而他們竟突然改變，又得從頭再努力。經過無數次討論之後，他將魏登倍說服。但在全德意志王國之中其重要性僅次於普魯士的巴燕像是毫無望地失掉了。

雖然如此，統一的傾向仍繼續進展。在十二月從北德意志議會來一批代表團到達凡爾塞。其領袖為西木孫 (Ziesen)。在一八四九年向非得利·威廉第四奉獻皇冠而被謝絕的就是此人。他現在又來向國王威廉奉獻皇冠。以先威廉拒絕接受皇冠時，俾斯麥從心贊成。但現在一切都變了。以先那位普魯士國王拒受皇冠是因為牠不是德意志各兄弟之邦的國王奉獻給他的。那時他們都十分反對此舉。其中持反對態度最甚的是巴燕國十維特路斯巴和 (Wittelsbach)。他曾很動感情地說過：“Ich unterwerfe mich

keinem Hohenzollern" (我永遠不能向霍亨索倫人屈服)。現在俾斯麥安安靜靜地努力了四年，用超人的技巧與忍耐去應付這種反對。但在巴燕的議會中仍充滿了反對他的政策的情緒。教會痛恨他的政策，農民都被訓練的只要提起普魯士這個名字便要憤恨。有許多顧問在此際慫恿德國將巴燕國逐出十位，並瓜分牠的領土。但俾斯麥和薩巴燕反對這些提議。就如同他以先反對普王，軍隊及整個國家而和奧國一樣。巴燕的國土一半是天才一半是狂人。俾斯麥對於他用了無窮的自衛方同他有長期的友誼通詢，並設法投合他的怪癖，引導他，要他顧念向整個德意志族國應盡的義務。他用一種理由催促他道：巴燕國王既不肯承認普魯士國土為其上策，但應當承認德意志的皇帝。現在果然得到他所希望的輿報。雖然巴燕國會仍然反對加入統一的帝國，但是從巴燕國土來了一封信，實際上就是俾斯麥自己的言詞，催促重建德意志帝國，並以普國國土為德國皇帝。因為早已得到其他國土之贊助，所以先曾反對普國非得利·威廉第四的國家們現在不再反對普國了。最後，果然由各國土奉獻了皇冠。

用不着再等巴燕的議會批准。在一八七一年一月十八日向全世界發表帝國成立的德市宣言。儀式很簡單，但是沒有比牠再合於傳統的習慣，也沒有比牠再富於戲劇意味了。這儀式是在凡爾賽宮中最華美的路易十四大廳中舉行的。在普法戰爭期間蘭克 (Ranke) 有一次向鐵爾說「德國是為反對路易十四

而戰」。現在德國果將這個老敵人戰敗了，在鏡廳之中，正在刻着讚美那位「大皇帝」侵略與侮辱德國的銘文之下，德皇站在一個簡樸的臺上，由德意志士子們的代表團圍繞着他；在他身旁的是他的兒子，後來繼他為帝，即皇帝弗利第三，及其婿巴登的大公，此人多年來就為德國統一而努力，在他之前是大將軍們以毛奇與羅恩為首，及各大臣以俾斯麥為首。由俾氏宣讀帝國成立宣言。如雷一般的歡呼爆發於包圍巴黎的兵士，在全法國的德國營均為之響應。當此事一經宣佈，全德國亦均歡呼，但不止此，當此新國家誕生之際，新的驚人勝利接踵而來：十二日攻下雷蒙（Le Mans）；十七日貝爾佛（Belfort）降服；十九日攻下聖·康廷（St. Quentin）以蒙特·瓦雷安（Mont-Valerien）；二十八日巴黎降服；法國最後的人數最多的軍隊是步爾巴其（Bourbaki）所統率的，但這支軍隊在兩星期之內使被解除武裝被逐入瑞士國境之內。

接踵而來的便是締結條約的大問題。在一場混亂之後，立刻組成一個具有一些代表國家發言權的立法機關。這點又顯出俾斯麥的手腕與果斷。甘苦塔極端希望戰爭繼續下去。他努力排斥那些曾經贊助帝國的人，不讓他們在新共和政體之中得到任何位置。並且也不讓他們去選舉國家的代表人。對於這個，俾斯麥伸出他的胳膊，使這一切惡行化為泡影。他宣言反對一切剝奪人權之行爲，並堅決主張由全

體人民自由選舉。根據自由選舉之原則，法國議會在一八七一年二月十二日組成，並在柏爾多 (Bor-doux) 開會。選鐵爾 爲行政部長，他與各部長法夫爾 及其他人立刻與普國交涉和平條約。在這場長而討厭的外交鬥爭中，俾斯麥 又將他在以往的事業中，特殊表現的巧妙性格又顯出了。在起初他要價很高，比他所希望得到的爲多。他要埃爾倫斯 與說德國 言語的羅丁根 及美次 與貝爾佛 (Bellort) 邊界上的要塞，及六十萬佛郎 的賠款。法國各方面的交涉代表中之鐵爾 成爲法國內閣總理，並且成爲有名的歷史家，雄辯家，理財家；法夫爾 以先是人民所認爲的護民官，以在法廳上之辯論演說而出名。現在是一種悲劇與喜劇的混合情形，法國代表們很動感情地，甚至流着眼淚，堅決地說德國 所提出的賠款數目太大，萬難辦到，就是任何與此相近的數目也不能交付；這個數目太大了，就是從基督降生 時起就去數量牠也數量不完。對於這個，俾斯麥 回答道：「對於這個困難，我已經準備好了，——我曾從柏林 帶來一位小人，他在基督降生 很久以前就起始計算這個數目了」。他介紹一位猶太銀行家，布來喜 譯得 (Blach-polder)。布氏毫不費力就證明法國是太富了，所要的這一點賠款真是太小了。當法國代表們用極端流利的言詞，抗議，大聲急呼的演說，及爲法國所得的羞辱而辯論，及法國寧願死而不屈服時，俾斯麥 又應用老法，像他以後所說的，我不採「在公共集會之前演說」的方式去反駁，却祇用德文 去答覆他們，

鐵爾與法夫爾是一字不懂，所以當他們向俾斯麥說他們不明白他所說的話時，俾氏答道：「我也是聽不懂你們所說的話呵。」鐵爾與法夫爾是代表共和黨的。該黨黨人怕博拿特主戰比怕什麼都甚。故當這場外交鬥爭中如果鐵法二氏停止或拖延交涉不進行時，俾斯麥便又使出舊手段，恫嚇說再將被俘的拿破崙皇帝召回並令亨氏的無敵軍由德國發給中放出讓他們將亨氏再捧上皇位，共和黨便害怕了。尚不止此，法國企圖得到歐洲公論的幫助，向全世界散佈令人感動的呼籲。他們特別着重一點：普魯士沒有權利再繼續反對法國的戰爭，因為法國主戰的主權人，皇帝，已經失敗。對這點，俾斯麥用一種通告令歐洲的傳單答覆法國。他提醒全世界說：這場戰爭是法國上議院全體一致要求的，其實也是全體人民代表及法國報紙所一致要求的。

法國仍然努力請歐洲國家出來干涉，俾斯麥又發出一個通告，嚴重地警告歐洲列強，說，如他國出而干涉，無論取何種方式，別無他用，祇是挑起法國人民生出不正當的希望，因此而使戰爭的恐怖更延長了。法國又向歐洲發出呼籲，聲言：德國已經決定，使法國降為第二等國家，因為德國要想從法國割佔大塊土地。俾斯麥又用通告答覆，指出法國有三千八百萬人民，如將其殖民地包括在內則有四千二百萬，而德國所要的土地僅大約包含一百五十萬人口。

在俾斯麥所有的通告之中，微露出一些反抗的語氣。各國竊想，對於俾氏的反抗態度最好要加以注意，不要冒然干涉。關於攫取斯特拉斯堡與美次俾斯麥所持的理由特殊有力，他說：法國曾侵略德國有二十三次，並且每次都沒有受到德國的絲毫挑播，而在過去時期德國一次都未侵入法國，故德國所報復的僅是決心將她的西部之門戶握在自己的手中而已。接着便締結了佛蘭克府條約。該約由俾斯麥簽字。不僅將埃爾薩斯及羅丁根大部，包括斯特拉斯堡及美次，劃歸德國，並且還索五十萬萬佛郎賠款。貝爾是個重要地方，此時德國由該地退出並且照原來所要的賠款數目，又減少一萬萬。

德意志帝國的憲法，現在也被採用了。實質上就同俾斯麥曾經起草的是一個樣子。帝國議會代表二十五邦，埃爾薩斯，羅丁根除外。該議會分聯邦議政院及眾議院兩部分。聯邦議政院大約以各邦人口多寡為選派代表人數之根據。普魯士有十七票，巴燕六票，薩克森，魏登堡各有四票。尚有其他數邦各有三票或兩票其餘的各有一票。

這個憲法雖然與美利堅合衆國頗有相似之點，但其不同處却非常之大。美國的各邦平等觀念並未被採取。爲了得到國家的統一，俾斯麥不承認各邦一律平等，因爲完全平等乃是幻想，所以凡對於憲法之一切變更，普魯士均有否認權。其實，凡關於陸軍海軍及徵稅等事之一切根本立法，牠均有否認權。

關於軍事外交及財政有三四小邦也得到些特權，特別是巴燕其次是魏登倍。比這三四小邦再小的便沒有這種特權了。中央立法權，其範圍比我們的廣闊，但以美國觀點看來，其中央行政權，因由邦之官吏去執行，所以非常受阻礙。

至於關於軍事權，俾斯麥早已認清當前的事實，並且最重要的是在德國各方面都有宿敵，而在任何方面都沒有天然的邊界，因此，全德國的聯合軍隊都按照普魯士的原則訓練，都受普魯士的統制。

自然，當他起草憲法時，俾斯麥石出政策，應當有繼續性。所以他採取的憲法觀念很偏於美國不偏於歐洲。因為他避免英國式的內閣負責制。那種制度使許多大陸國家出了很高的代價。在憲法之中他保留解散議會權。但是不須一同解散內閣。結果，他穩穩靜靜地居首腦地位處理國事，眼看着法國共和國有四十個不同的內閣，勝利者上台，失敗者下台，空空浪費精力。

關於行政方面，國王威廉被舉為皇帝，然而奇怪的是對於皇帝這個名稱竟起了嚴重的爭執。國王威廉認為他的普魯士王位是很光榮的，因為這個王位是由普魯利大王而榮耀起來。所以威廉很坦然地不很注意這個皇帝頭銜，並且堅決主張，如果他非要這個頭銜不可，則他必須被人稱為「德意志的皇帝」。對於這個稱號各小邦均表反對。其實，一般有思想的德國政治家們也不贊成。因為這個頭銜所指示的是

除了保持德國統一之外，還要有更多的土地須直接而完全地受他的統制，因此，乃決定援中世紀的先例，其頭銜應為：「德國皇帝」。對於三個斯麥堅決擁護。但國土威風不願讓步，不得已乃祇稱他為「皇帝」。但「德國皇帝」這個字樣，後來漸漸地在公文上都使用了。

在皇帝統率之下，俾斯麥被任命為宰相。至如關於他的職務，他將他的理論與實施都深深載於憲法之中。他從來不能與他地位同等的人好好工作。甚至當他年紀青時，他不能與他的兄弟共同管理家中的地產。在他所屬的各種立法機關中，他永遠聳立在他的同僚之上。在佛蘭克府，在綠桌之旁與他處同等地位的祇有奧國公使，所以他的最大的努力之一便是驅逐奧使。他每次當公使，看他周圍的祇是他的屬員。當他為普國大臣時，他必要當首相，因此，他當了宰相之後，皇帝國除了他一人而外再沒有國務員了。他不要內閣，他召集一些有力量的人物，在他的左右，但他們的名義不是「國務員」而是「秘書」。他要「屬員」，不要「同僚」。曾有一個時期，在普魯士內閣有位副總理，他的職位類似副宰相，但在職不久，就退休了，並且再無人繼任。此時又給宰相加上親王的頭銜。皇帝有以先賜給他的地產而外，又給他一塊大約值一百萬普幣的地域。同時又將宏大華美的拉濟威爾 (Radziwiłł) 皇宮及在柏林的公園劃為他的官邸。君王與人民互相競爭向他表示尊敬。在壯年時期他所達到的地位，除拿破崙第

一在他的十年皇帝期中所得的榮譽而外，在十九世紀無人能與他比擬。(七四)

四

這三場戰爭——對丹麥，對奧國，對法國——已經結束。德意志帝國已經成立。柏林成了歐洲政治活動的中心。俾斯麥成爲歐洲政治的領袖人物。鑑於戰事現已懸於俄國，奧國及土耳其乃努力求普遍的和平。爲求達到這個目標，君王們，政治家們，均長途跋涉來參詣德國首都。實際上在俾氏主宰之下，首先成立奧國，俄國，及德國皇帝會議。最後他們都承認了他的意見：奧，俄，德之共同利益乃是去抵制無政府派的擾亂，這個比任何一國去煽動嫉妬或擴張領土的私慾要利害得多。他們接受了這個意見乃成立諒解以求和平與友好。

(七四)關於俾斯麥努力制定憲法時所取的态度，見他的回憶錄，特別是Lothar Bucher所記的(譯者案：Bucher之歷史家與外交家，在俾斯麥退職二後，追隨於俾氏身旁，俾氏自述此一經歷，由Bucher以日記記錄之)；及Büch與Kendall關於帝國的，普魯士的，及其他德意志的憲法，見 A. Lawrence Lowell, Governments and Parties in Continental Europe, 第一卷，第五與第六章，其中有優美而詳盡之敘述。

以後又有意大利，瑞典，尼德蘭（七五），西班牙等國的國王，大大小小的德國君主，及一大批較小的王子均皆加入。全都帶着最傑出的顧問。爲各禮起見，德皇，宰相，太子也由柏林出發向各國拜訪。因而使德，俄，奧，意及西班牙間實質上的同盟更加鞏固。這個同盟的目的在反對由巴黎公社的秘密團體所啓示的「國際」禍害。在這些個旅行之中，皇帝威廉所得到的最高的尊敬。俾斯麥所得的是人民的爆發的贊美他的情緒。在他所拜訪的各國都中，得到的最大歡迎是在維也納——他最近所征服的帝國的中心地。

年復一年這樣的政治旅行繼續不斷。在宰相府內常舉行國際會議。該處漸漸成爲歐洲政治思想的策源地了。

由此時起，他在本國內所作的改造與鞏固這個新帝國，得到不少絕大的成績。同時他也揚威國外，其聲容之盛，白克俞威爾（Comwell）時期以來，爲歐洲所未見（七六）。

（七五）譯者註：即比利時，原屬奧國，自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後與荷蘭合併爲尼德蘭王國。

（七六）譯者註：一六四九英王卡爾第一被處死，克俞威爾是國會中之反對派，自爲終身執政，內閣小黨荷蘭，愛爾蘭土黨之叛亂，外敵荷蘭海軍，突威黨個歐。

當德國之得勝軍由法國戰場反回柏林之際，俾斯麥得到信息謂法國前哨又前進到德國在法國所保留的地方。彼時他騎着馬立在皇帝身邊止居於瘋狂般的民衆歡呼欣喜之中，他安閑地要一張紙與鉛筆向巴黎用電報發出命令：除非法國軍隊撤退，德軍要立刻攻擊。對此，法國屈服了。

在另一方面，他又覺得頗費心思。奧國宰相標斯特（Beust）在佛蘭克府，德雷斯登，及維也納用多年時間，以最大努力，對普國各種工作均加阻撓。在一八六六年戰爭之後，用卑賤的服從態度，及令人討厭的對於新秩序之贊美，想保留他的官位。但德國已與法國締結和平條約，俾斯麥決定此後再不自險去使用以往的不忠實的方法與欺騙的手段。因此奧國宰相被免職。代替他的人是與他迥不相同的匈牙利政治家安德拉喜（Andrassy）。俾斯麥批評他道：「就奧國政治家一般言，他們說的話，我石着就像從煙囪吹下來的風；惟安德拉喜的話我認爲是真的」。還有一個原因使他喜歡安氏——即以先奧國內閣中的領袖們，差不多都是德國南部人，他們的目光一直注射在北部與西部——即注射到德國。而安德拉喜是一個匈牙利人，所以他的抱負，自然地，是將奧國勢力向南部與東部擴張。這都是俾斯麥有遠見的表示。

當處置西班牙的卡爾羅斯（Carlota）及其黨徒時，俾斯麥所採取的方式很像克倫威爾所採取的。西班

牙正統派黨人捕獲一小隊西班牙兵，他們高興至極，因為在這隊兵裏，他們發現有施米特 (Schmidt) 隊長在內。他原先是德軍一兵士，現在是德國報紙通信員。這些人爲發洩他們很怒德國及異教徒的情緒，乃以間諜罪將施米特處死。如果在早先年對於這件事不能要求賠償。但是時代變了，統一的德國成立了，每個德國公民都以身屬德國爲榮，就如同古羅馬的公民一樣。俾斯麥立即爲這件事所震動。即派艦隊封鎖西班牙正統派由海外獲得供濟品的港口。並通知法國立即停止對該派之援助，因爲法國會秘密接濟該派。他請求歐洲列強承認馬德里的西班牙政府，而反對卡爾羅斯。除俄國外，各國均順從了俾氏的要求。那個狂妄的殺人犯，使這位覬覦西班牙王位的人（指卡氏譯者）出了極高的代價：直到那時前，他尚有些機會繼承王位，但由那時止，他沒有機會了。

俾氏又作出一件成功的事，與上述者頗有關係。在一八七四年，有各式各樣的法國僧正很惱怒德國。因爲新德國戰勝了法國的阻撓，克服了法迪坎的陰謀。他們立即用有煽力的佈道講演來反對德國。並且明目張膽地激勵法國人民興起宗教戰爭。法國政府雖然表示道歉，但俾斯麥對之毫不在意。對俾氏而言，他認爲法國人民本來就恨怨德國，現在這些宣傳德國的宣傳一定如火上澆油，激動法國人向德國復仇。所以他向德國及世界宣言道：不等法國對戰爭有充份準備，便先動手，乃是他對於國家的責任。

法國政府其實是法國人民立刻就明白這一點了，於是這羣狂熱的教士們乃又恢復了理性。

在給這種基督教的狂熱以打擊之後，又同樣地將回教徒的狂熱也打了一下。土耳其的民衆見土俄戰爭迫在眉睫，因而受了激動，乃在薩羅尼卡 (Salonica) 將德國領事殺害。自然，土國政府十二分表示歉意，可是俾斯麥不管這個，即派軍艦去薩羅尼卡。直等吊死了六個最壞的暴徒，並將幾個疏忽的官吏送進監獄，及蘇丹 (Sultan) 土耳其皇帝——譯者——向領事的未亡人付出豐富的賠款，事情方算解決。

又有一件與以上差不多同樣令人注意的事。對這件事俾氏之所以肯不吝一擊之理由是：凡新帝國的官員均應秩然有序，各有所屬不能僭越。阿內姆·哈利 (Harry von Arnim) 公爵，出身於普魯士王族，天才縱橫，具吸人力，談吐動人，華美出衆，作事敏捷；並且在重要外交地位上受有多次訓練。他爲德國駐巴黎大使。在他的心目中，德國對於法國的外交在原則上是錯了。他是一個君主主義者，他覺得爲普國的安全着想，應當打倒在法國的共和主義，並設法恢復法國皇帝。俾斯麥的原則與這個十分相反。他信仰君主政體，由信仰而生力量，由此力量他乃鼓勵法國實行共和主義。他坦白承認，他之所以這樣作，目的在使法國變弱，分黨分派不適宜作戰。阿內姆以爲德國皇帝可以傾向他所信的觀念。同時他又秘藏一種信念：他可以代替俾斯麥並且改變帝國政策。結果是一場鬥爭。俾斯麥先用巧妙的佈置，

次用敏捷的重擊，將他的對方完全打倒——囚禁他，侮辱他，並驅出帝國之外。

但在這些勝利之中，俾斯麥竟遇到一個阻礙——他所遇見的最大的一個，即法國從她的逆境中恢復的出奇迅速。因為恢復得快而又容易，她乃能清償那筆大賠款。她重新改造及擴大她的軍隊之技巧以及法國報紙對於復仇的呼聲很顯然地在俾斯麥心中惹起一種思想，即他欲使法國不能對新德國再有破壞力量的企圖是失敗了。這種感覺漸漸變成煩惱。不久，全歐洲都相信他正計劃一個新戰爭。因為他的目的想使法國失掉戰鬥力幾輩幾代都恢復不過來。然而現在全世界顯出一種偉大而有力的道德力量，反對強暴，反對不公。每個大強國均鎮靜地表示反對他再侵略法國。而各國元首中其反對侵略法國最甚者為威廉皇帝。在皇帝之旁，其甥，皇帝亞力山大第二 (Alexander II)，完全與威廉的觀點相同。這兩位皇帝在一起會商，結果使任何對法國的戰爭均不能再起。俾斯麥遲遲不願，嘖嘖憤怒，但終屈服。

這件事不久使被人遺忘，因為，更迫切更有意義的事件發生了。在歐洲北部與中部，俾斯麥很有把握保其平安無事。可是在歐洲東南早就密雲不雨地醞釀着戰爭風暴。這風暴終於突然爆發。俄國與土耳其起了可怕的爭鬥，延長幾達一年。以締結聖·斯泰法諾條約 (San Stefano Treaty) (七七) 而告結束。

(七七) 譯者註：土耳其因壓迫基督教徒，致激起一八七五之叛亂，後保加利亞、門底內哥等、塞爾維亞起而助之，以致不能擴大。俄國趁機干涉，乃起俄土戰爭 (一八七五—七八)，羅馬尼亞亦起而助俄，一軍敗，一軍勝，訂聖·斯泰法諾條約，土耳其棄，門，保獨立，保加利亞自治。這兩國均接近俄國，俄乃在近東取得特殊地位，大遭英、奧兩國之忌。

土耳其在歐洲的領土差不多都失掉了。因此引起俄國與英國的衝突。並迫使其他列強不能不在此兩國之中選擇一個或為敵或為友。此際俾斯麥出來干涉，並在他的命令之下於一八七八年六月與七月在柏林召開會議。自從結束拿破崙戰爭的維也納會議以來，此為最重要的歐洲會議。出席這個會議的人均為當代傑出的政治家，其議長則為德國宰相。從俄土手中取出這場戰爭所生出的紛亂纏葛的葉實，使不平的方面作可能的讓步，因而和平乃得恢復（七八）。在整個的歷程之中，俾斯麥不僅是一個名義上的領袖同時也是其主動力量。有一時期，俄國與英國勢將絕裂開戰，他用很少人想到他能作得到的圓滑而溫和的手腕，使兩國又復平靜。並且，當土耳其其似乎使一切均陷入混亂時，他又使她恢復理智，不過他所用

（七八）譯者註：由柏林會議締結柏林條約，該約規定：（一）俄國保有在聖·斯泰法諾條約中所得的阿達罕（Arslanhan），喀斯（Kars）及巴統（Batumi），並收回克里密亞戰役所失去之比薩拉比亞（Bessarabia）。（二）黑澤高文納（Herzogovina）及波斯尼亞（Bosnien）仍屬土，但由奧國統治。（三）保加利亞分裂為三：——保加利亞得保持北部領土，但須向土進貢，南部之東·魯米尼亞（Eastern Rumenia）自治，仍屬土領，馬其頓部分完全屬土。（四）承認門、塞、羅三國完全獨立，領土略如原約。（五）希臘合併帖撒利。英國由另一英土條約得到塞浦路斯島。德國無所獲，但她使奧有所得而消滅普魯士戰後的敵視，上因而親德，以致後來大戰時德奧三國站在一面。德水租戰，二國感情漸劣。奧塞本相友好，但奧得波馬二州，有害於塞之出海，兩國乃變為敵國，後乃成爲大戰之導火線。

方法近乎殘忍。

他的機智與力量增長不已。柏林會議閉會，俄國敗興而返，因他在聖·斯泰法諾向土國強索的大片利益現在失掉了。因此德俄的參事官們的惡感乃深刻起來。一方面俄國阻撓俾斯麥與法國再起戰爭，特別是哥查科夫（Gortschakoff）對這件事特別顯出努力使俾斯麥的惡感愈深。另一方面，哥查科夫也因俾氏事事佔上風，乃憂怨叢集，待機發洩。雖然俾斯麥在柏林會議在不與歐洲全體之利益相衝突限度內，極爲俄國利益出力，但他仍不能使俄國政府滿意。他甚至因爲替俄國出力過多，而說道：在那個期間他的作爲好像是俄國的全權大使。但是沙皇與其宰相一想起在德，奧，法的戰爭期間俄國因不加干涉而對德國所作的好處，便認爲俾氏爲俄國所出的力量太少。此際，俾斯麥成爲衆矢之的。俄國報紙聯合起來，大聲急呼，罵他是一個出賣朋友的人；沙皇向德國皇帝抱怨，說他是一個忘恩負義的人；哥查科夫由柏林經過故意躲避着他；大公們特意不理他，並且當他們聯袂前赴巴黎時公開宣示他們對於法國的同情；在全歐洲的德國秘使對他大聲攻擊；俄國對德國貨物所加的稅特別煩重；俄軍集聚在德國邊境，並已顯出徵候俄法兩國要接近成立反德聯盟。

一個平凡的政治家遇見這種情形，一定要抗議，解釋，勸解，道歉；而俾斯麥則不如是。他立刻就

認出這情勢的真像——他看明白了俄國不合理的寬度及官僚的偏見之深度，他看明白在某一定期內糾正他們是不可能的，他又看出在該期所引起的危險是些什麼。他不道歉，也不解釋。他接受這個情勢，並且嚴駁牠。他立刻去維也納，很快地訂一個條約，將現存的歐洲聯盟的整個系統給改變了。在這個條約之下，普奧攜手以抵抗由俄，法來的任何攻擊。這裏有一個困難，幾乎無法克服。老皇威廉與他的外甥沙皇亞歷山大關係很深，凡是使他們永久不變的關係有所改變的思想，他均不能接受。大概他所寫的信中最熱誠的是他給俾斯麥不令他與俄國決裂的信。但這位皇帝被迫而屈服了。在宰相的辭職要脅下，皇帝訂德奧同盟——對歐洲又有了新保障，比舊的穩定得多多。（七九）

俾斯麥又用一個特別方法，使和平保障更加倍穩固。在柏林會議時，他與法國代表閒談，他安安靜靜地承認：法國的半幽默，半憂鬱的抱怨說全體列強之中惟有法國未得到使宜的話，是公正的。他以動人的理性問道：「爲何法國不取突尼斯（Tunis）呢？牠是她的地中海中的近鄰；牠現在由土人統治，

（七九）有兩封信可以參看，一封是威廉第一從安德拉喜（Andraeszy）給俾斯麥的，一封是俾氏的回信。由這兩封信中可見出這個條約締結之原因，及其目的。信見 Ford 編的 Correspondence of William I and Bismarck，第二卷，二〇〇—二〇二頁。

是她的一個威脅；爲何不去吞併牠呢？如果吞併牠是無人肯反對的。」這種帶翅的話，立刻就飛到法國政府了，並且不久便進行去取突尼斯。意大利早就想得到牠，但尙不敢動手。故法國現在這種舉動惹起意大利極大惡感，幾輩代都除不去。所得的結果是：法國忙於處理這塊新得的領土，無暇再向德國搗亂。同時意大利爲了報復乃加入德，奧同盟共同反對法國與俄國，於是乃成了三國同盟。（八〇）

俾斯麥的政策現在又有一個奇特的改變。在此以前他對於俄國有很好的感情；可是現在他像似完全兩個人。當俄爾木次事件發生時，俄國政府認爲德國是一羣小王及幼君組成的國家，只要認爲有大利可圖，便可隨時利用。俾斯麥現在決心要教訓俄國，告訴牠俄爾木次時代是永遠地過去了。他現在所說的話，是挑戰的，他的政策也趨於激烈。如果有墨斯科的大公或政治家停在柏林過夜，各政府機關便發出炸藥式的言論，這些言論都本着一個論調。（八一）

（八〇）關於突尼斯這段故事，是在柏林會議之後，由柏林外交部傳出的一些傳說。俾斯麥曾說過一句很有諷刺的話：「當他們（法國人——譯者）忙於處理突尼斯時，他們便不想萊茵邊疆了」，見 Bismarck's Diary 二卷，四七五頁。

（八一）本書著者，當時止在柏林，在他的自傳之中，關於這類炸藥式的言辭，曾舉出不少例子。這類言辭，便歐洲爲之稱快不已。

不久俄國人明白了，俾斯麥與普通的政治家不同，不能用威嚇的方法使他屈服，於是乃令老俄國宰相哥查可夫辭職，因為他是挑播這種惡感的主要人物。他的許多年來的野心顯然是要在世界之前裝模作樣，以其具有賴因（Liane）王子與梅特涅兩人之性格而自誇示。有位批評家批評他道：「他像水仙花神喜歡贊嘆從墨水瓶上映出的自己的形像」（八二）。現在在俄國外交部的是一位與他不相同的人蓋爾斯（Giers）。他是一位事務家。他愛和平，不是純精神的而是真具熱心。他特別希望使俄德間的關係走入正規。當他比較俄國在和平時期所得的與在戰爭中所得的，孰多孰少時，他口齒之流利出乎尋常。在十九世紀的末葉，沒有事件再比這位老政治家為和平而奮鬥的景像更動人了。這位老大臣已顯然年將就暮，但他用賡餘的精力主張俄國要改變那個舊的旁若無人的主戰政策。（八三）

(八二) "C'est un Narcisse qui se miro dans son onrier" 譯者註：希臘神話——有一半人半神為空氣與地球所生之少女，名叫回聲 Echo 者，因愛一美少年，思慕成疾，日漸消羸，以致身逝而僅存其聲。復替女神 (Zeus) 欲懲罰此少年，乃使其與顯映於泉水中之自身影像發生戀愛，彼因想思而病，憔悴消瘦，終變成爲水仙。

(八三) 關於這位瀕死的大臣與去官謁他的人們，所說的話，在 A. D. White, Autobiography, 第二卷，三十二頁曾有所敘述。

三國同盟條約，曾將德，奧，意，縛在一起，以對抗從法來的任何攻擊。現在此條約雖然仍然有效，但這位偉大的宰相用巧妙的手腕，又將德，奧，俄三國皇帝拉在一起，並且秘密地又計劃出一個圈套的補充辦法。就是，假如法國攻擊德國，則俄國護德，奧，意反抗而自己不動法國。假如德國單獨受到挑惹而與法國戰爭則法國不能從俄國得到幫助。假如俄國打奧國則奧國可從德，意得到助力。但是，假如俄國並未侵犯奧國，而對東方問題起了爭執，則德國不能干涉，並由奧國自己與俄國商議條件。

這位偉大的宰相的手也伸出了歐洲。埃及總督伊斯麻爾（Ismail）在非洲北部所作的事業，是很顯赫的。他鑑於蘇彝士運河之掘通及他的領土在商業上的希望，他大膽借款，只要有人肯借給他錢，拿任何東西或每件東西作抵押品都願意。他覺得以先很少有土耳其的或埃及的政治家使非洲的商業能有現在這樣有希望。他設法解脫了土耳其對他的約束，他的作法使全世界均為之震驚。他的野心最後竟甚至突破了商業道德之拘束或國際法的範圍。俾斯麥是第一個對他作有效的攻擊的人。俾氏的抗議終於在一八七九年使伊斯麻爾衰敗，而成立一個受英國統治的新政府。直到現在牠還是數千年來埃及所有的政府中的最佳者。

很有意義的是由埃及政變所生出的紛擾中有一位與格蘭斯頓（八四）齊名的政治家曾徵求俾斯麥的建議。假如他能接受這個建議則他一生中所受的兩次大辱可以免去一次。

這位宰相又向非洲的另一部分及向歐洲的某一部分伸張勢力。在當時都認為他這種行動遠超於他的範圍了——就是英國也作是想。

歐洲列強瓜分非洲已經進到一個新而激烈的階段。葡萄牙與英國成立條約統轄西非洲廣大的土地——特別是尼吉爾河（Niger）與剛果河（Congo）所經過的區域。直到彼時為止，沒有人夢想到，這種佔領土地之方式必須經過歐洲列強的允許，方可行得通。然而新時代來了，俾斯麥便是這個新時代的先知。他不顧剛果條約之規定而宣言道：這個世界不允許再那樣地佔據與瓜分。英國對這個宣言與俾斯麥的作爲表示同意。其他列強以及法國也均熱烈贊成。英國駐柏林大使羅素·奧斗（Odo Russell）爵士是顧問官中最溫和和最可信賴的一位。關於俾斯麥，他向英國外交部長格蘭維爾（Granville）爵士寫道：「在

（八四）譯者註：格蘭斯頓（Grantston）於一八六九年組閣，爲英首相。努力行其愛爾蘭政策，實行廢止新教在愛爾蘭所享之特權，而回復愛爾蘭人之信教自由。格氏領導自由黨前後組閣四次。第四次（一八九二）彼已八十三歲，所提之愛爾蘭自治法案雖爲下院所通過，究爲上院所否決。後二年格氏卒，爲英國最有名之政治家。

聖·彼得堡他的話有如福音，在巴黎與羅馬亦是如此。在這些地方，他的言語令人尊敬，他的緘默令人憂懼」。德國大使哈茲費特 (Hatzfeldt) 吹牛皮道：俾斯麥在他的衣袋中帶着蘇丹。法國領事庫賽爾 (M. de Courcel) 剛到德國宰相的鄉間邸宅去拜望了一次便聲言道：德法兩國的「觀點完全一致」。

(八五)

由這種情勢所生的結果是：在一八八五年初葉在柏林開一會議討論非洲事件，歐洲列強及美國均派代表參加。在宰相府邸用了三個月的工夫討論與非洲有關係的問題。最後將非洲瓜分並劃出許多勢力範圍——現在，德國勢力達到非洲並佔了廣大領土與利益。

就在這件事件上，俾斯麥顯出來他極端清楚地能把握世界政治。他曾說過，他反對德國對殖民所具的熱望，他甚至曾加以諷笑。但在建立帝國之後，在成立艦隊之後，他的感覺變了。他常常發愁：德國大量的過剩人口一年比一年增加。因此他希望得到殖民地，以容納德國旗幟下的一部分人口。

他向這方面所作的努力，在起首遇見很強的反對。他提議在薩摩阿 (Samoa) 及其他地方擴張殖民

(八五)關於俾斯麥設法使英國改變處理非洲問題的態度，見 Lord E. Fitzmaurice, *Life of the Second Earl Granville*, 第二卷，第十章，及其他。其中有詳細的敘述，並且敘述的很有趣。

地，及向遠東的航行發給津貼費，可是在德國議會均受到阻撓。但反對更能增加他的力量。在一八八五年得到一個折衷辦法即以十五年為期對於去亞洲，非洲及澳洲的輪船津貼四百萬馬克。由此乃立下了德國商業向外擴張的基礎。

又有一種反對更激刺他的感情，而使他又玩弄手段。「奪取非洲」的第二步是他想在太平洋島嶼上奪取新領土。當他努力去保護德國的殖民地及在菲亞兩洲對其殖民地要加以適當的統治時，他又遇到了反對。這種反對有時是野蠻的有時是狡猾的。不久他發現這種反對都發源於英國內閣。於是他乃採取一種有趣味的應付方法。沿着非洲海岸及在太平洋各島他派遣密使將德國國旗插於彼此距離很遠的地域——其中有些地方是德國想要得到的。英國政府顯然要阻撓他的計劃，去牽統，去豎立阻礙以反對這種計劃之實現。一切都沒有用處：他斬破牽纜，衝破阻礙。他向德國議會揭示外國對他的政策反對的情形，他得到全國大部人的擁護，在國會中得到多數議員的贊助。因此使他能夠將他所放置國旗的地方得以保存。格郎維爾爵士在英國上院，格蘭斯頓先生在下院，以令人可高興的理性接受這種情狀，並承認德國是英國的夥伴，一同向野蠻的地方宣示上帝的善意。

但格蘭斯頓的言辭並未能贏得他的同情。他對英國首相的反感不但未化除反因此而增加了，這真是

他與衆不同的地方。哥查可夫在聖·彼得堡的官邸將格蘭斯頓的像放在一個受人重視的地方，但在柏林的宰相府中所受主人喜歡的英國人像乃是狄斯累利（見註九五——譯者）。俾斯麥常指點狄氏的像說：「這個老猶太人就是他」。大概對於格蘭斯頓最刻薄的批評，散佈最遠，打擊最深的是某次俾斯麥演說，說這位英國首相的外交政策正足以損害英國的利益，正足以污辱英國的名譽。

有一點必須直言不諱，就是在這場以及其他的鬥爭中俾斯麥顯了他的性格上的缺點。他給駐倫敦的德國大使敏斯德（Minster）公爵一封公文，述說德國對於殖民地的抱負，及奪取殖民地所要用的方法。該大使見這公文譏諷罵過火，乃壓下未送與英政府。結果竟因此而生出一幕誤會的喜劇。一方面德國宰相以為英國政府已看見這個公文乃開始動手去實行，而另一方面英國首相所採取的行動是一點不知有這麼一回事。

甚至他也不喜歡美國。從他事業的開端他對美國人特殊親善。在大學時與摩特利的關係，當他建立德意志聯邦與帝國時與班可羅夫特的關係，以及在圍攻巴黎時他在凡爾塞遇到射利丹（Sheridan），伯恩賽德（Burnside）及其他美國官吏的關係，和在柏林王廷中不斷往還的美國使臣的關係，在在均有充分證據，證明他對美國人的好感。然而突然間一切全變了。有一位美國公使，他以先是美國上議院議員，

不湊巧地向他的政府的高級官員寫了一封機密信，說這位宰相已經變成了大地主，所以自然與德國有產階級表同情，所以當他在職期間要想使德國對於外國農產物稅率減低那是沒有希望的。因為不小心這封信被公佈了。結果使俾斯麥對於這位衝犯他的外交官反感更深了。

與這事密切相關的又有一事頗足表現他的堅決信念：凡是他的政策不許別人過問。在德意志建國期間，有一位最顯赫的議員名叫拉斯克·愛德華 (Edward Lasker) 者，是國家自由黨的領袖。由於他對於自由主義純潔不自私的篤信，由於他的善於支配有思想人的能力，由於他對全歐洲具自由思想人的影響，他在當時真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當帝國議會第一次選舉，舉他的有六區，並在普魯士議會中他所代表的是重要選區邁恩河上的佛蘭克府。以法學家論，以政治家論，以辯論家論，他都列於傑出者之內。他的完美直是無可指摘。關於一件大規模的財政犯罪行為他曾得過勝利而將財政部長逐出官位。他敢攻擊帝國中一位最驕傲的王子之商業企業行為。在許多困難時期他曾為俾斯麥的最重要的擁護者。其最顯著的是他幫助俾氏改革德國法制。然而有許多其他事情都是俾氏所心喜的而他却反對。因此，俾斯麥不但不願再藉重他的幫助，且對他有熱切的反感。

在舉行北太平洋鐵路通過美國開車禮時，從德國來了許多貴客，其中便有拉氏。但從去太平洋的旅

程中——他因疲乏而衰弱，又因他周圍的奇異景象而受刺激——突然在紐約街上死了。

在大西洋兩岸各國立刻表示深深的哀悼。美國下議院完全本諸善意，議決向德國表示同情，由官方通知德國政府。以爲這種舉動必能引起兩國間的好感，然而使與此事有關係的人均爲之驚訝的是，這位宰相將美國的決議私自藏起，以嘲笑的态度由議會扣留下，用極快的方法退回美國，同時還帶一個極不文雅而簡略的口頭信——其意義是：「去管你自己的事罷！」

尚不止此。俾斯麥很不合邏輯地將怒氣放在美國全權公使上，並迫他辭職。這個可以作爲我國歷史上一件光榮事件，因爲美國總統立刻將該公使提降，同時下議院認爲俾斯麥的這種行爲祇是一個強有力的人的一個弱點，讓這件事慢慢忘掉。

在與帝國遼遠地方之新關係中，俾氏不斷表現他的敏捷與銳氣。他曾不顧一切地擴張他的艦隊，他現在用着牠了——派遣武裝船隻去南美洲徵收債款，徵收因中國海盜所受的損失的賠款，到敘利亞（Syria）保護基督徒，去殺靜希臘海面，因在中美之德國領事受侮而去要求道歉，去幫忙摧毀歐洲的奴隸制度。並且如我們所知的因在土耳其與西班牙有德國人被殺而去報復。

他先鋪下道路以備擴張德國商業之用，他立下決心時時注意殖民地的需要與要求，對這些事他的眼

光極遠，最惹人注意的是在他提倡之下，德國議會現在每年撥出五萬元，以為在大學教授六種亞洲重要的現在的文字之用。

似乎他將全世界都列在他的努力範圍之內，似乎要將他的全副精神都施展出來。其實並非如此，比這個更下決心處理的是他努力要將他的政策在帝國之內實行出來。這個政策主要的有兩方面——他認為這兩方面都是為國家之生存所必需的：一方面與教會有關，一方面是一些民政的與經濟的問題。

關於第一個問題，就為當他實行那樣廣闊那樣大膽的外交政策時，及他用德國以前所從未見過的手腕與勇氣去實行國內政策時，他也從事國內的鬥爭。這種內戰在近代史中是最惹人注意了。當他建立帝國時，他曾看出來，集中在法迪坎的權威者才是德國的最狡猾的仇敵。在一八六四年，十二月，皮由斯第九 (Pius IX) 公佈「異教謬論八十條文」。從這個條文中他看出凡是德國在她的文化進步期間所得到的好思想均被牠非難了。最令人注意的是牠反對追尋真理的自由。而自由尋求真理乃是德國思想中一件最驕傲的收穫。此時有南德意志的天主教徒霍恩羅侯爵·克老為 (Fürst Chlodwig Hohenlohe) 王子首先提醒俾氏使他注意到教皇所頒的條文對德國的危險性。霍氏是愛國志士也是政治家。他預先知道不久在法迪坎要開的會議一定要主張「教皇無謬」那一套理論，並且還要限制文官的權力，因而他警告全

歐洲要對此點注意。俾斯麥很重視這個警告，因為在與奧法戰爭期間，他看出法迪坎反對德國的情緒是多麼利害，多麼深重。他又覺得教皇無認教條的莊嚴宣言僅在法國對德宣戰之次日公佈，其中確有可令人尋味之處。這真是一件嚴重的事，因為在新德意志帝國的人口中有三分之一屬於基督教會的羅馬支派。俾斯麥心中的問題是：「這一大羣人——德國全人口的三分之一——在民事方面是應當服從德國議會所立的法律呢？還是服從意大利僧人所發出教旨呢？」

應當服從意大利僧侶的教旨的論調，很快地便從法迪坎散佈到各僧正，由僧正又傳到他們下級的牧師與俗人。當他們說教的時候，他們對俾斯麥發出非難之聲，就如同在宣傳政綱時的政治演說所常聽到的一樣。在議會中又出現一個中央黨以維護法迪坎的利益為主。其領袖都是強有力的令人可敬畏的政治家。文德和斯特（Windthorst）便是這些人們中的首要人物。他是俾斯麥在格廷恩時的同學，但是與俾氏不同，他安安靜靜地一直不絕地注意大學的功課，孜孜向前，永不厭倦。沒有權貴的親戚與在社會上有地位的人去援引他，祇憑天賦的能力與勤苦的努力而飛黃騰達成為漢諾威王國的領袖。當一八六六年戰爭時，漢諾威併入普魯士，他使失掉在漢諾威內閣的指導地位。並且，現在他僅以省議員的資格加入帝國議會。他的野心，他對新秩序的憤恨，及因為他是議會的領袖所具的大權，三者合一使他令人生

畏，次手可熱。那位偉大的領袖，身軀魁梧，動作生威，坐於德國議會講壇之旁——在他身邊，在講壇之中便是他的身軀矮小，面貌緊張，聲音急促頑強不化的硬敵。二人相比頗生奇趣。大概在十九世紀之中，議會中所呈的形象沒有比這個對比再奇異的了。文德和斯特看着似乎沒有什麼出色，但他却是新帝國所從來未遇見過的最利害的敵人。

此後隨着發生了多次鬥爭。俾斯麥在起初尚能矜持自己不越範圍。並且雖然他常常給對方重大打擊，但他時時表示他願採用溫和手段。知道他的以往事業的人，對於此點均覺驚奇。有許多教士與教授，因為不接受「教皇無謬」的教條，而被那些比較守舊的教會解職，因而使這場鬥爭更嚴重了。同時凡是那些因此事而被排斥的人們都由國家發給薪金。官吏也沒法抵制教士，於是存傳道之時常起紛爭。結果乃頒佈「說教法律」。

在此際兩方面均作出極大的錯誤。俾斯麥慣於引用德國諺語，但在這個緊急時期，他竟忘了一個最合適的一句話——「當烹調之際，食物太熱，不能即吃」。因為他忘了這個諺語，乃軒然生波，興起無數紛擾，使雙方愈陷於深，許久未決，且流入邪惡。兩方都盲目地以為無謬教條在短時期間就能得到牠所應得的結果。豈知竟流為長期鬥爭，許多高級教士均被牽入，其令人注意者為：愛爾姆蘭 (Ermann)

及巴德榜 (Paderborn) 的僧正和可崙 (Köln) 及波森 (Posen) 的大僧正。不久在這場混水之中又牽入了耶穌會士：當德國與奧國、法國戰爭時，他們都積極地反對德國。他們所鼓動的不僅是宗教的差異，並且是種族的與省的仇恨。最顯然地是在波蘭與埃爾薩斯——羅丁根。現在他們更加倍努力。爲應付這種危急，俾斯麥在起首試着半用強力半用溫和：一方面任用最有力的法爾克 (Falk) 管理公共信仰，從來未曾任用過這樣利害的人去擔任這個職務；一方面又向教皇表示恭維，派遣一位不亞於紅衣主教霍恩羅那的人物駐在羅馬。他是一個日族的一個年歲較小的子孫，該族曾有一次自爲君主自立朝代，直到現在仍是德國巨族之一。但是這種感謝的表示被法迪坎拒絕了。事態更變惡劣。並在一八七二年將全體耶穌會士均逐出國外。這件事意義很大，因爲自從非得利大王時代以來，甚至當全歐洲所有的天主教國家及羅馬教皇都排斥耶穌會教團時，而在普魯士統治之區域下却保護牠。因此，教會對俾斯麥立刻發出許多非難與指責，並且，甚至教皇皮由士竟鄭重預言說：上帝爲了報復，即將捉捕他。俾氏爲報復起見，將德國駐法迪坎外交代表撤回，並通過吾人所知的「法爾克法」，或「五月法」，這個法律連同許多補充法令，其目的均在使全普魯士，其實間接地也是在全帝國，阻止教會的侵略。這些法律之主要目的有四：第一，不許教會行使權力干涉民政與社會公共事務；這些法律所規定的原則包含各種手續以制

止誹謗與毀壞名譽等惡行。第二，改良僧侶教育，使牠範圍更廣，更愛國。因為他們由國家支薪所以他們的教育不應由小學，初中，高中，最後到神學大學完全受僧侶管理，並與世事完全隔絕。在這一串的教會學校教育系統中最低限度有一部分須向世人開放，並應改在某一非教會的高等學校或大學受教育。第三，每人均有權利在法官之前宣佈他自己與任何教會，無論是天主教的，基督新教的，猶太教的，或其他教會，相分開，並為他自己及他的家庭得到保障，不能因與教會分離而得到任何貶謫或侮辱傷害。第四，國家必須保護牠自己以免狂熱之輩投射搗亂之火把與箭矢——為達此目的，無論何時，凡教會掌權者如任命職員時他們須向官吏送交候補者的姓名，並且須得到官吏之認可，其任命方為有效。最後，因為已經允許並且鼓勵人民結婚須用宗教儀式，所以也必須有一種由國家官吏舉辦的結婚儀式，這種儀式須按國家法律行之，並受國家的允許。這些原則中有一大部由法迪坎允許可存其他各國實行，但在此際，在德國因為這種主張而使這場鬥爭更嚴重了。這場鬥爭陷於最惡劣狀態超過五年之久，並且在每一階段均表現一些不合理的新姿態。

在僧侶這方面又生出了新詛咒，用以反對那些拒絕接受無謬教條的人們。在波蘭，在埃爾薩斯——羅丁根種族間的仇恨愈深，在巴燕與萊茵各省互相嫉妬，並且各處挑撥宗派的熱狂。在政府這方面受排斥的愈來愈多，牧師被排出教職，教授被排出講席，高級僧侶被排出所管之教區，很多人受到罰款與監

禁；並且，凡一切僧職之不專作慈善事業者，均被排出於王國之外。當鬥爭更深刻化時，凡僧正與大僧正們如違背法律，便被下獄——波森的大僧正雷多科夫斯基（Radolowski）被監禁二年多。現在狂熱的程度已達於沸點，並且最具體的表現是：不僅在德國並且在周圍各國都生出暗殺宰相的恫嚇與計劃——有一次幾乎成功。一個名叫庫爾曼（Kulmann）的青年人，他有一個時期曾在教會學校，他在基興恩（Kissingen）的散步場向俾斯麥放鎗，他幾乎成功，因為鎗彈差一點沒射中動脈——恰巧一個人向俾斯麥行禮，他舉手到額頭回禮之際，那鎗彈祇擦傷了他的手。這次暗殺行為更引起官吏們發出新的嚴厲處置，在議會中各式各樣的天主教徒被捕，並由官吏舉辦結婚的法律擴張到全帝國。

在一八七五年二月，教皇皮由斯又頒佈一教諭，官稱這些極可憎恨的法律無效，那些制定牠們的人是不敬上帝的。這場鬥爭更加狠毒起來。從這種情勢生出許多奇怪事情，其中之一是：德國人向盧爾德（Lourdes）朝拜人數之增加。盧爾德（Lourdes）者是法國仇恨德國的大本營。而德國在薩平恩（Marjina）亞生出不少奇蹟——人們都認為那是上帝不贊成俾斯麥的顯示。在這整個期間，中央黨在議會中佔四分之一議席，在文德和斯特領導之下，不分青黃皂白凡是俾斯麥的設施不管與宗教有無關係均一律反對。

但在一八七八年皮由斯第九死了。繼位的人假如認為他不如皮氏那樣動人，然而在政治能力方面却

比皮氏寬大，也比他具有天才，並且在政治眼光方面也比他看得清楚。他是雷歐（Leo）第十三——自貝內的克特（Mendel）十四以來最偉大的教皇。俾斯麥與這位新教皇，都看出這是一個機會，乃立即表示向妥協方面努力。每一方面仍然有時表現一些偶而發作的仇恨。當這種仇恨發作之時，都發高調的宣言，顯然想在歐洲獲得一點面子。但最後，俾斯麥在柏林與文德和斯特會商之後，與教皇代表雅克比尼（Jacobini）在曼斯太因（Mansueti）會商之後，便起始作一些更有利益的工作——這位宰相所立下的基礎，是一個諒解：德國對教會的原則一定不變，但在施行時可以取較溫和的態度並可允許特赦。在另一方面，於一八八〇年雷歐教皇給可崙（König）地方大僧正一封信，暗示：他願在任命教會職員時可以事先通知普魯士的官吏。這對俾斯麥是一特別重要點，並且從這個種子乃漸漸發展出一個協定，兩方面都覺得這是結束這場鬥爭的最好的時機。對於一般人的宗教利益兩方面似乎都忘掉了。普魯士的十二個主教管轄的教區之中有八區沒有僧正。並且有四百多個牧師管轄的教區沒有牧師。布累斯勞（Breslau）的親王僧正逃到奧國，紅衣主教雷多科夫斯基避難於羅馬，考朗的大僧正在德國化裝流浪，或在荷蘭隱藏。這場鬥爭之主要問題在一方面是關於法迪坎的威信，在另一方面是關於宰相職權的威信。因為威信問題而使那樣一大羣謙中的，信任基督教的羣衆徬徨無人指導。因此，對這場衝突全世界都起始憤慨了。有些證據可以證明妥協精神之增加：一位新使臣施雷則（Schuler）是俾斯麥的親信，以先曾在華

盛顯顯出機智與手腕，現在任命他去法迪坎。政府在施行法爾克法律時更加慎重，法爾克他自己已經滿載榮譽，便讓位給一個不像他那樣討厭的人。與這些法律相關聯的是國王的特赦權之擴大。並且最後，皇太子由西班牙回來拜訪教皇，雷歐很受歡迎。並且最令人驚訝的是教皇竟要俾斯麥的像片。這個要求很快地便答應了，並且宰相自己並未受法迪坎的指使而自動地向教皇雷歐表獻殷懃。教皇對這種殷懃比任何人都要加以贊許——原來俾氏請他去作德國與西班牙的公正人以解決關於卡羅林羣島的紛爭。在此際一方面由法迪坎，另一方面由宰相發出許多辦法，以使兩方面所發出的嚴厲的法律與命令都減為溫和，後來俾斯麥的新財政及經濟政策竟要依賴德國天主教派的贊助方能推行真是一件奇觀。這場可怕的鬥爭現在是過去了。Modus vivendi（暫時和解）成立了。教皇與宰相均甚偉大足以互相瞭解，互相贊許。不僅俾斯麥的像片被送到法迪坎而教皇的像片也送到了發爾津。非難與恫嚇停止了，俾斯麥可以聚精會神將以先送到德國議會的內政計劃加以處理了。

攙雜在俾氏外交政策之中，及攙雜在與法迪坎的鬥爭中，有一個內政政策，很快地便引動了全世界的注意。自從帝國議會剛開始，他就英勇地努力鞏固他所建立的國家。這個工作太繁巨了，因為舊的離心力——地方偏見，邦極的理論，種族的仇恨——仍然存在着，並且必須用力量與手段去處理他們。除

此之外，在新歸併的疆域埃爾薩斯——羅丁根，其中有一百五十萬居民大部是德意志的後裔，但均同情法國，他們的趨向與實際工作不斷地使俾氏煩惱，並且有時竟發展到了危險地步。爲抵抗這種新危機，如果是一位度量欠寬，見識欠深的政治家，也許要用威嚇與諂媚的手段與態度去處理，而俾氏則發出與此不同的論調。因爲他見到一個真理：即，所謂圓滑並非是永遠說令人不可捉摸的話。所以他說：將埃爾薩斯——羅丁根歸併於德國，其目的並非求這兩塊地方人民之舒適與快樂，而是求帝國的安全。稍加反省，這兩地人民使看清這個大膽無稽的宣言的意義了。他們從此才真正瞭解德國要歸併他們的決心是不可抗拒的。不過他很有遠見，乃用一溫和方法使他所說的凶莽的話給緩和了。在斯特拉斯堡的老大學自從歌德在那讀書時起已經腐化。而現在在俾斯麥管理之下，又以宏大的規模重新另建，於是無可避免地乃成德國思想的中心了。而在教士管理下的低級學校，規模貧陋漫無系統。現在的這個新學校系統對普魯士很有益處。宰相爲這塊新領土又任命一位極好的總督，這種選擇又顯出他的偉大的智慧。第一位總督是滿特費（Manthey）。在戰爭期間會得到將軍的顯職，現在他又儼然以政治家的身份而顯露頭角——他用溫和的辦法以緩和普魯士的嚴峻。後來，俾斯麥又選擇霍恩紹親王爲滿氏的後繼者，此種選擇其令人高興之點也不亞於選擇滿氏時。霍氏曾爲巴燕首相。曾爲駐法公使，因此會名被全歐。但全體

德國有思想的人們之所以敬重他，乃是因為雖然他的祖先與奧國及南德各邦及法迪坎有關係，但他仍忠於他的早年愛國思想：在普魯士領導下之統一的德國。這就如同在我國內戰期間南部某邦中有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在一起首就認明：美國共和的統一乃是希求美洲自由的根本。他與林肯站在一起，與查克松（Andrew Jackson）堅決主張：「現在及將來必須確保聯邦制度」。他戰勝家族的傳統，個人的牽掛，各邦的偏見，教會的要求，並且不顧一切反對與罵詈，由始至終為統一而努力。

霍恩羅的政策比滿特費的稍較嚴峻。他的政策是使那些為德國所兼併的省份不再受法國統治的任何希望。後來他果然變成了帝國的宰相。著者因為曾與這位政治家在公私方面均曾接近，故對他的愛國心，他的寬大，他的溫和，他的永遠存在的公正感，很為敬重。這位親王對他前任的政策永遠忠實施行。本著者所曾提到的那個時期的一切人物之中，能將俾斯麥對德國及人類所作的貢獻發大光揚者以霍氏為最。

當這位偉大的宰相，就這樣地在帝國的這樣環境之下工作之際，他的權力顯然地成為這個帝國的中心了。由法國賠償的五十億佛郎現在竟成了一件令人煩擾的東西。投機之風因而興起，並且不久即行財政破產，幾乎動搖帝國的根柢。最壞的是：在柏林有許多高級官吏均受了引誘而失掉了人民的信任。維

護權力之有力份子均攻擊他們。俾斯麥又表現他的智慧，他不願黨派，就是他身邊的人如果犯法也讓他受法律的制裁。

他的偉大勞績之另一件事是他維護德國的軍隊。並且對於此點，他堅決地與熱心而有權勢的反對者相對抗。他看出法國與俄國均積極擴張軍備。他記得在非得利大的諸多勝利之後竟因怠惰的樂觀而使國家受到拿破崙的蹂躪。他知道德國沒有天然國界必須仰仗其子孫的技巧與勇力以抵抗各方面的強敵。因此他的座右銘不是「休息與心滿意足」。他看到在過去的勝利中已蘊伏下必須再作一些新努力的種子。在此際當他與大家相辯論時他與毛奇站在同一方面。毛奇是自拿破崙以來的最偉大的戰略家。他用簡潔有力的言詞說道：用半年時間得來的省份，必須用半世紀的軍事努力方能保住。對於小事，俾斯麥準備妥協，但關於這個主要問題，他決不讓步。到最後他果然將一切反對均克服了。（八六）

在這個時期，在這位宰相指導之下，接連不斷地做了許多改革。其中有新法典之頒佈，及帝國最高法院之設立。在新德國之中因法制之混淆，頗令人煩惱。各小邦，其實是在各小城，各有自己的法典與

（八六）在一八八〇年，本書著者，聽見毛奇的確重述他以前所發表的關於軍中補助金的意見。他的演說是在聽衆擁擠的議會中發表的，當時俾斯麥也出席了。在戰爭期間這兩位偉人的觀念之相同，是極其顯然易見的。

習慣法。不僅表面互不相同，就是基本原則也不一致。有些法律發源於封建制度，有些是來自羅馬法，有些是由二者混和而成。此時，由一些第一流法學家起始編纂法典，一八七七年為全帝國制定刑法，一八九七制定商法，一九〇〇制定民法。

最可注意的是在這次立法時，俾斯麥的一個小主張被駁斥了：他希望最高法院設在首都，但議會怕權力過於中央化乃決定設在來比錫。

現在他又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計劃出來財政改良方案。從帝國成立那天起，到他在職的末日止，他的主要原則是帝國財政獨立。這個原則後來揉和於全德國法律中。從關稅與間接稅所來的收入不夠國家之用，其不足之數祇由幾個邦的補助費以為彌補。對這個制度他正確地看出危險，因為這種制度很可能使地方政府用拒絕輸款的方法取消帝國頒佈的法律。這種情形正是與美國統一之前的可憐的聯邦情形一樣。因此，他計劃一套新方法，為全世界的經濟的與社會的歷史上開一個新時代。

五

俾斯麥為使新帝國財政獨立，首先想將國內全部鐵路之所有權收為國有。但大多數議員均看出這種

辦法之危險性。他們自然要問：政府每年如能得到千百萬的定額入款，又能任命及管轄無數的鐵路僱員，而這些僱員又散居於全國各地，則立法機關又怎能去操縱行政官吏呢？尤其許多大邦——最顯著的爲薩克森，魏登倍，巴燕，巴登——早就具有鐵路所有權，並且從經營鐵路得利益故不願將這權利出讓。爲了將鐵路所有權讓渡給帝國政府，俾斯麥用大熱心及長期奮鬥以促其實現。但他失敗了，不得不另尋新的財源。最後經過各種小妥協與修正，他從間接稅得到帝國入款的大半財源。

祇埃爾薩斯及羅丁根的鐵路收歸帝國所有，其餘仍爲各邦政府所有。因此地方官僚乃得到大權。有些歐洲國家盛行鐵路國有制度，但大幹路有時爲私人所有。此點頗與德國相似。德國有幾條大幹路因特殊契約均由私人公司裝備與管理，其效率頗足與英美鐵路相比——這是私人企業表現特殊優點之處。另有一點也值人注意的，是平常的旅客與運費在德國比在美國同級的車費貴得多。

雖然俾斯麥未能達到他的主要目的，但在全德國整個系統上，他得到了以先所從未見過的更圓滿的合作。當他：能爲帝國獲得所有權時，他却將管理權得到了，這是有很大益處的。

俾氏想對內外交通作極大的改良，以促進國家的統一。本此目標他改進並增加內地的水道與港口，

爲了制定這種法律，他用了一番仔細研究與堅決的勸誘方得到成功。(八七)

又施行新帝國貨幣制度。著者及那些明瞭德國十九世紀中葉情形的人，曾對彼時的德國貨幣有着鮮明的記憶：施爾森 (Friedrich Paulsen) 告訴我們，直到一八六〇年當他在愛蘭根 (Erlangen) 大學當學生時，雖然僅是從漢堡起身，但他的衣袋中竟有五種不同的錢幣。他又說：這五種錢幣便是「使德國窮困的因素」(八八)。在彼時，凡是外國旅客，如果經過六個德邦，便一定發現不僅是六種不同的錢幣，並且在每一邦內也常常發現新的舊的兩三種錢幣。每種各有自己的折扣，假如將他們互相折換，那可太有意思了。大概除去美國內戰之前紙幣制度盛行的時候而外沒有比這種情形更浪費更令人煩惱了。

關於帝國的錢幣俾斯麥雖然同意祇用金本位，但他仍強烈地傾向複本位。著者有兩次聽見他討論這個問題——一次是公開的，一次是私人的——，他不滿意用金本位，並且如果複本位在英國能得實行，則他便要將原來的決定改變(八九)。關於新貨幣的形狀，主張不一。因爲帝國與各邦各有自己的紋章與

(八七)見前註中 Mator 的書，第三卷，四七五——四七七頁。

(八八)見 Paulsen, Amn Meinen Leben 一三八頁。

(八九)當時，本書著者止爲美國駐柏林公使，曾將此問題於一八七九年提出於德國政府之前，乃將此點弄清楚了。

標記（九〇）。帝國與各邦誰有權去將自己的紋章標記印在錢幣上呢？這又表現俾斯麥的特色，他找出一個妥協辦法立刻將這場辯論結束。即一面印帝國紋章，一面印那國的君王頭像——這就如同哥倫布與鷄卵的故事一樣（九一）。

俾斯麥向議會陸續地提出許多議案，時時得到嚴重的失敗，這些失敗頗能激刺他的衰弱有病而疼痛的身體。特別當他應付社會主義時更是如此。社會主義在起始時甚不足道，但發展極快。使牠生長的主要分子是，冒險的實業振興家，騙人的股票經濟人，及持享樂主義的百萬富翁，這些人過於奢侈放蕩，以致造成一八七三年的大財政破產。在一八七一年第一次選舉德國議會之議員時，社會主義者所投的票數大約有十萬票。在一八九三年幾達一百八十萬票，社會主義的議員由二名增加到四十二名。為應付這個趨勢，俾斯麥提議採用壓制手段。但議會認為他所提議的辦法防害言論自由與思想自由權，故不通過。但他從無政府主義這方面得到幫助，在一八七八年春發生兩次暗殺皇帝的兇暴事件。一次是一個粗鄙無

（九〇）譯者註：即刻於盾上或旗上之紋章或標記。

（九一）譯者註：哥倫布發現新地回來，人均美其易，彼於某日召集多人，出一鷄卵令在場者立於其上，衆皆不能，哥氏乃以卵擊碎，毀鷄卵立，因顧衆曰：「當某人告以如何作法之後，每人均覺其易也」。

學問的思想家作的，一次是學識比那個人高得多的人作的，後者這次幾乎成功了。這事惹動了俾斯麥的逐漸衰弱的力量。這種暴行引起了全國的憤怒，特別以第二次爲更甚。俾氏看出這是他的機會乃解散國會，向全國呼籲，並在立法時得到多數人贊助禁止社會主義者集會，出版。許多人被驅逐，並下令宣佈柏林及其他大城入於包圍狀態。

但因壓制暴亂竟生出憤怒之聲——俾斯麥在當時所提出的辦法直到現在尙令全世界爲之驚訝。在他從事政治活動的初期，雖然他曾接受了當時正佔優勢的 *Laissez Faire*（放任，不干涉）的理論，雖然他曾偶而建議對那些因作苦工而將身體損壞的人們由國家保護，但人們認他的建議荒誕離奇故僅引起很小的注意。後來他被一個乖僻的學者及享樂主義的煽動者拉賽爾（*Tassell*）所引動。他的關於社會問題的討論很惹起俾氏的興趣。假如拉氏的理論尙未能影響俾氏的理性，但無疑地牠們却引起這位宰相的好奇心了。栽植這些理論的土壤早已預備好；因爲在他的整個事業之中他有一個希望就是使帝國富強。這個帝國是他所創立的，這個希望也與日俱增，以致那個老的 *Laissez Faire* 理論愈來愈使他討厭。並且各式各樣的社會主義的議論，凡主張將大權授於中央政府者，愈更似乎合理了。拉賽爾及其門徒認爲一切權利均應集中國家，政府高於一切，個人分文不值。俾斯麥因爲有與此相似的思想，又加上他想將帝國

入款擴大的慾望，乃將他自己改變了。他原來是一位主張放任的自由貿易者，現在變成爲保護貿易者了。並且他又提議制定保護貿易的法律。結果，以先擁護他的人都不擁護他了，並且德國也成了一個關稅甚高的國家。（九二）

這一套思想最後引導他採取最大膽的社會主義的辦法——國家強迫工人保險，這種辦法曾爲一些現代國家所採用。這種制度有三主要部分：第一，強迫疾病保險，保險費由僱主納三分之一，由工人納三分之二——在一八八三年施行；第二，強迫意外保險，後來從礦場與工廠擴張到各種商業，全部保險費都由僱主繳納——一八八四年施行；第三，老年保險，由七十歲起，保險費一部由國家繳納，一部由工人繳納，政府並發與貯蓄金——一八八九年施行。在制定這個法律的整個的歷程之中，他曾遇到極大困難。反對他最利害的，是那些直到此時還擁護他的人。他們將他的第一次議案給毀壞了，但他爲了回答這種攻擊，及應付新的需要，他又作出驚人的改變，這個大概是在政黨中最惹人注意的改變了。在聯邦時期，及在帝國的最初幾年，擁護他的是國家自由黨，這黨所包含的人物大部分都胸襟寬闊，並且佔議會中最傑出的思想家之多數。而反對他的則是老的保守黨及中央黨，或伴侶黨，這個黨完全受法迪坎

（九二）關於傅斯麥對於拉賓爾的意見，在Myrdal的書，見前註，一六一——一六三頁中有簡潔而清楚的敘述。

的指揮。

他現在離開了那些曾經幫助他的人，而與反對他的人們相攜手了。他看出了在他的鬥爭中所能發生的新可能性。在保守黨人與中央黨人中都是代表地主利益與工廠利益的領袖們。爲了贏得他們他決定出一筆代價。他用嚴厲手段反對社會主義的行爲以博保守黨的歡心，他用溫和手段對待教皇，以贏得僧侶，他向這兩黨及他們所代表的大部分以工作爲生的人民所貢獻的是一個保護關稅的政權。這個貢獻頗受歡迎，並且結果生出極大的轉變，以先曾與他爲敵者，而今攜手了；以先曾與他爲友者，現在反對他了。

當他在議會，在全國，作了這一串複雜的鬥爭時，有時他覺得悲傷，受挫折，嫌惡，並且受了身體不健康的痛苦，這個使他煩惱。他被脅迫而將離職，並且，在一八七七年四月向皇帝上申請書，請求辭職。皇帝在他的申請書上寫「決不」兩個字。對皇帝之決定全國均衷心贊同。當時實行一種妥協辦法，允許這位衰弱的宰相在他的鄉村住所度一種有名無實的休養。然而就是在鄉間他的工作依然照常。在一八七八年他又回復了積極工作，這個，大概是他在內政的活動方面一個最重要的時期。此時他似乎戰勝了他的失意，忘掉了他的病痛。他與自由貿易主張相鬥爭。這是一件非常巨大的工作。在此時，在他的

演說中所表現的淵博知識，準確的思想，無論爲敵爲友，均認爲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而以那些傑出的，終身研究政治經濟的學者們對之更感到驚奇。（九三）

此時應當注意到他的活動的另一種發展。他賄買一大羣最巧於用報紙指導民衆輿論的人。無晝無夜他時時召集他們到宰相府，在威廉路或發爾津，或到利得利士魯，他將他爲報紙，爲雜誌，爲評論刊物所寫的文章大綱交與他們。不僅在首都，即在其他德國思想中心地及外國大城市的報紙都可見到這些文章。有時是他口述令人筆錄一些完整的文章，這些都是他費力思索出來的，並且以完美的技巧表現出來。有時是受到他的暗示寫出的文章，由他改正，把這些改正之點再加擴充，然後發表。他在那些文章上所加的註釋都很精細。在科內耳大學的圖書館所藏的手稿中，有三篇是屬於這一類的。文章是別人寫的，但經他親手加上許多改換，塗抹與修正。在這些註釋之中，有許多事情值得注意，但是最特別的是他仔仔細細地禁止一切對他的恭維的話，無論公開的或暗示的都禁止。用任何這一類的方法，去增加他的令名，似乎他都認爲是一種蔑視。（九四）

（九三）關於俾斯麥在這一方面的活動，及他從其中所顯露的個人的特色，傑出的經濟學家 Gustav Schmoller 教授在他的 Vier Bzelle 一書中，對之非常讚揚。

（九四）關於俾斯麥爲「卑劣的新聞紙」的文章所擬的概略及草稿，見 Bismarck's Diary，英文譯本，第一卷，三十六頁及其下。

然而，當這些最後的重大工作在進行時，當他似乎在開創一個新的時代並且比以先更努力地去抓權力時，有思想的人起始感到疑懼。這位老皇威廉很久以來就很剛勇地贊助他的宰相。他顯然地衰老了，並在一八八八年春逝世，人們疑懼心更增加了。許多人都知道：繼位的新君的母親，妻，及許多他的最親近的朋友，多年來就惱恨俾斯麥的政策。並且也知道富非得利承襲皇位時，他因同情反對俾斯麥的人而離開了首都。許多人又知道，這位宰相的老式的普魯士的理論，其實連那一些新德國的理論，恰與這位新皇帝立於相反的極端。這位新皇帝很受在英國所度的生活的影響，而最重要的是受他的妻室的影響。她是英王王后之女，頗具天才。一般人都怕他們起衝突，怕這位新君後來與他的父親的顧問發生決裂。

但是出人意料之外的事情發生了。非得利雖然在理論上喜歡英國式的君主立憲制，並且因此而減輕了德國專制程度，但他仍然知道尊重這位偉大的宰相。並且在各種危急時期，特別在薩多瓦戰爭之後，老皇帝，朝廷，以及將軍們都反對俾斯麥，但他却堅決地與俾氏站在一條線上。

然而在此際另有其他原因使宰相仍握政權。這個情形是在人類歷史中一件最令人悲哀的：這位新君竟漸漸要死，不斷地為疾病所苦。他知道既無時間也無力量去與老普魯士的制度起衝突。並且雖然他在

位祇有九十九天，但他所作的革改以及賜給國家官吏的恩惠，都表示他對於新時代的想慕。因此他保留俾斯麥不肯放手。

對俾氏所表示的信任，得到了很好的報酬。雖然他在位期間很短，這位宰相也把握這個機會以證明其愛國的忠心。以各方面來看，這個機會祇是一瞬間事——最感到時間不夠用的，就是有人提議將一位霍亨索倫公主嫁與一位由德國家族出身的一位王子巴登·亞歷山大 (Alexander von Baden)。他先是保加利亞的元首。這件事使世界一般人均感到興趣，因為人人都知道他們是一對情侶，並且因為「全世界都愛情人」。

皇室中的婦女們及大多數男子們都喜歡這件事。全德國及全英國的全體婦女以及大多數男子讀到這段新聞時都喜歡這件事。並且在議會中在報紙方面的某大黨的領袖們看出這是一個使俾斯麥陷於困難境地的機會，無論誰如反對此事，便加責罵。假如俾斯麥是比康斐爾 (九五)那一類的政治家——急於希望

(九五)譯者註：Beaconsfield 係指狄斯累利 (Benjamin Disraeli 一八〇四——一八八二)而言，因狄氏被封為比康斐爾的伯爵。在一八七六年他是英國的首相及著作家，代表保守黨，當他執政時曾通過第二次改革案 (Reform Act)，使英國代議制更近於民治精神。

得到宮廷婦女的幫助，特別要得到新皇后的幫助——急於希望得到全德國一般家庭中男人與女人的贊許

——急於希望在戲院中在散步場得到彩聲——他一定要贊助這種結合。然而他看清了這件事所含的政治危險——與保加利亞其實也是與俄國糾纏在一起的危險，及因此而要締結新同盟的可能性。因為締結新同盟則他的與俄國皇室恢復友好關係及不過問巴爾幹事情的政策必受牽扯。因此他決然反對這件婚姻——他竟說服了這位新皇帝，甚至還使英國王后也贊成他。

這個無疑地令很多人不喜歡他，但是他却使有思想的人知道：要與國家的福利相比，則他把宮廷的贊揚與民衆的贊揚是看得多麼微小了。

皇帝非得利死了，一般人均爲之悲哀。因爲他是自從奧雷流 (Maurus Aurelius) (九六) 以來的一位最高貴的皇帝。當他逝世後，有一件事像是表現特別好的預兆。即繼承他的人是青年皇帝威廉第二。他曾受很好的教育，並且也很受到教育的利益。他的創造天才與能幹都很卓越，並且因讀書與實地訓練而使他的天才與能幹更發展了。這真是帝王承繼人中很少見的。在高等學校中他與平民子弟坐在一起。他在大學，陸海軍學校中很得了些益處。在陸軍，海軍均曾得過實地的經驗。他曾在行政領袖之羣中受過

訓練。他對藝術，科學，文學的進步均感興趣。他對德國與歐洲的歷史知道的很多。很顯然地他受了高度的愛國心所鼓舞並且他特別認識宰相之偉大。

這位青年王子用很多方式表示敬愛這位老政治家，所以人們都知道他是認識他的偉大之人。全都覺得在這位新皇帝之下，俾斯麥時代一定要繼續下去。

但是又發生了出人意料的事情。這位青年皇帝活動的範圍太廣，無事不管。凡是國家的利益，他均認為是他自己的利益。他所研究的題目，並且，真的很有思想，其範圍之廣博有如百科全書。假如在帝國之中無論在什麼地方，無論是誰，無論作出一些什麼可令人注意之事，這位青年君王，便急急地要知道牠。如果在別的國家有任何科學發明，或新發現，只要有價值，他便立刻將與這種發明有關係的教授召到皇宮去解釋牠。在他登極不久，他不僅遊遍全帝國，並且除了法國外，把德國周圍各國全走到了。並與牠們的君王及政治家相熟識。這位宰相對德國與歐洲的理解很廣博，對於皇帝的這種活動無他觀感，祇有感覺頭痛。顯然地，這位皇帝的意志不肯遵循舊例，要獨出己見。並且他不與宰相商量便任命官吏——使年青的抱負不凡的人代替老官僚。偉大的「戰事思想家」毛奇退休了，由瓦德西（Waldersee）伯爵繼任。實際上他成了軍事領袖。這位皇帝似乎對他很親愛，時常與他商量，時常與他作長路程的散

步。紐約先驅報 (New York Herald) 記者與瓦氏會後說道：瓦德西覺得德國自己便足以與她的敵人對抗，就是沒有同盟國的幫助也可以。這種事實顯然地惹起這位老宰相的疑懼，因為他正用了許多時間與思想去得到這些同盟國。

俾斯麥時時發出不平之鳴，如：由不負責任的人干預國事；未聽取他的意見使任命官吏；作事所取的步驟與他相左，等等都使他不滿。

有一件事特別令人激怒。這位新皇帝喜歡直接與他的大臣接洽事情，同時，也令他們直接與他接洽。這個正與宰相的觀念相衝突。俾氏認為良好的政府應是：凡君主有事與他的大臣相接洽，都必須經過宰相。他的見解是根據他未作宰相以前普國王很久以來所採取的老規矩。

雖然如此，無論什麼時候如果發生事件須與全國及世人相對時則君主與宰相之間仍然保持舊的和協。其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當那位傑出的神學家與歷史家哈耐克 (Harnack) 被召到柏林列入大學教授之羣時，正教的高級黨人利用佈道，演說，及報紙激烈地反對他。這位年青的皇帝與俾斯麥堅決地站在一起幫助他。有一件事冷眼看去很是可笑，但却很有意義。即基森 (Gießen) 大學在路特的生日贈給俾斯麥神學博士學位。他早得到了哲學與法學博士學位，而這件光榮的贈品使學術的光榮圈完全了。他

接受了，寫了一封信表示很大的宗教同情。這個如果在他的早年他一定是恨之而不屑一顧的。

但新題目發生了，使皇帝與宰相意見不能一致。在這些題目之中有一個是社會主義。

在瑞士集聚了許多無政府主義者，虛無主義者，以及與紅旗有關聯者，這個引起了很大的驚懼。而更直接令人驚懼的是帝國大部分礦場都羣起罷工。俾斯麥曾在國內作了許多大膽的社會主義的工作——凡意外，疾病，年老均由國家保險。但這個社會主義的工作，竟得到大罷工的報酬，實在令他氣憤。顯然他又使用他的老方法，一方面施用懲罰，一方面施用恩惠。

但是他將請求給他特權去放逐特異的人及壓制報紙的議案剛提出議會，立被駁斥。皇帝願採用不甚激烈的法律——他清楚地決定他剛掌握大權不能一開首使用流血的辦法。

這是君主與大臣間第一次發生的主要裂隙。但不久又發生一件事情，使他們的關係告一結束。這事很簡單。宰相允許與他的老政敵文德和斯特會見。固然這次會見是由於文氏的請求，但那些與俾斯麥相敵對的人們，都認為這是他想得僧侶的幫助以反對皇帝的一個證據。

因此，文官長由皇宮發給宰相一個通知書，說：此後無論何時，他如接見議員討論政事必須事先告知皇帝。俾斯麥的答覆是：「除他自己，任何人都都不許管轄他家門以內的事」。關於這件事，在次日清

晨很早的時候，皇帝親到俾斯麥府邸，俾氏尚未起床，皇帝要立刻與俾氏相見。他與宰相一見面便問他與文德和斯特商量的的是些什麼事情。俾斯麥答稱那是一件私人事情。皇帝立刻又說：無論何時他的宰相與一黨的領袖相討論事情時，他應當知道所討論的內容。這個理論，俾斯麥立刻拒絕。他仍然堅持沒有人可以干預他家門口以內的事。皇帝問道：「甚至就是我，一國之主，命令你說，你也不說嗎？」俾氏答道：「我的主人的命令早與我的內人的待客室一同結束了」。他又說，他僅僅因為遵守皇帝的祖父的諾言，所以他才仍然為國服務，無論何時他與他的君主如發生攙扭，他早就準備好辭職去度私人生活。過了兩天宰相尚無辭職的表示，皇帝派韓克 (Hahnke) 將軍持一通知書，說：皇帝正等候他的辭呈。對於這個，俾斯麥答稱：現在辭職等於離棄職守，他不能將如此龐大多年苦心造成的事業就此地輕易結束。只要皇帝命令他上辭呈，他在任何時都可辭職。因此，便按照格式通知他，請他在某一定鐘點內呈遞辭職書。對於這個，俾斯麥要求緩一些時間以便預備一個合適的公文。最後在一八九〇年三月二十日將辭呈送出，在其中詳細陳述他對於與此事有關的主要原則的見解。

皇帝接受他的辭呈，並寫一動人的文件贊揚他的功勳，而不提所以令他辭職的原因，並賜他一個封他為老恩堡公爵的證書，又口頭通知他賜給他一片足以與那樣大的顯職相適宜的產業。

在這個緊要關頭之際，俾斯麥的整個行爲與以先他的被世人所確認的性恪很不一致。雖然他早就很熱心地宣佈他希望能辭退公務願度退隱的生活，但現在他表現出來很不願捨棄他的職位。他對於曾經反對他的人，或似乎曾反對過他的人，表出極端的惡感。他顯然相信：假如他不繼續在位，德國很難維持生存。（九七）

現在及以後，在他的生涯中，有一種奇怪的混和，一部分是強力，一部分是軟弱。贈與他的老恩傑公國他謝絕了。他宣稱：像他那樣的功勞，不能像在聖誕節扔給郵差一點酒錢就算報答了。至於證書他接受了，他時常拿牠作爲嘲弄的對像，說道：假如他願意微服旅行，他可以用得到牠。所幸運地是一般民衆並不知道他辭職時所用的方式。就是曾經發生的那幾幕不很高貴的景象也未被一般民衆所知道。俾斯麥的信也未被公佈，但皇帝的賜物以及皇帝賜給他的與身體一般大小的像片，却爲人所週知。

俾斯麥一退休，全國人的情緒都爆發了。在歐洲歷史上很少見到有那樣熱烈的情緒。當他乘車走向皇宮與皇帝告別時，及他離開城的時候，集了無數的人向他表示敬意與依戀。其情況是德國以往的政治

（九七）關於俾斯麥在此期間的行爲，見 Munster 親王的敘述，這是按照 Blowitz 在倫敦泰晤士報及後來在 "The Patriot" Magazine 報告所寫的。

家所未得到的。俾斯麥流淚了，無數有力量的人也都涕泣不已。（九八）

威廉第二要求這位偉大的宰相辭職這件事，時時受到尖刻的批評。但有思想的人，愈來愈覺得那種舉措是聰明的。假如要採取另一辦法，則將使皇帝，他的朝代，甚至也許帝國，均陷入嚴重的危險。在威廉第一時，俾斯麥因受反對，失意，身體不健康的壓迫，常常請求辭職，並且有時候，幾乎是怒惱地一定要辭。但是這位老皇帝，多年以來，在戰時，在平時，都表現出他的力量與決斷已贏得了全世界的尊敬，所以對於俾斯麥可以屈服。很有幾次，這位偉大的宰相愾怒執拗，這位老皇帝驅車到威廉路的宰相府用和藹的敦勸與請求使他又去工作。對於這個，凡國中具有正確思想的人，都對皇帝表示感謝。但這位剛剛即位的青年皇帝使不能照這個樣子作。假如一開首他就作那樣的讓步，一定被人認為他軟弱無能。並且他使變成爲一個 *roi l'aîné* —— 一個青年，他掌握主權但是並不管轄 —— 及使普魯士及德國的整個的君主制度均將流於老朽與腐化。無疑地，這個辭職對於這位青年皇帝是一個嚴格的試驗，但是他的勇氣及主張之堅決，無問題地要惹起全帝國，其實全世界，對他更加尊敬。

（九八）關於俾斯麥在威廉路（Wilhelmstrasse）及在菩提樹路（Unter den Linden）與國人分別時之景象，曾有許多人親眼看見，並向本書著者加以形容，並且所有這些人都證明：強有力的人們以及俾斯麥他自己均不禁揮淚，可見悲哀之情緒普遍之廣。

在以後的期間，景慕宰相的人及他的最好的朋友將要願意爲他掩飾。在他的長期的作官生活，沒有一件事能像他辭職後那樣不好。他的好朋友希望能有到他度莊嚴地的生活，可是竟沒有。他不但不肯溫和地向政府進一點聰明的忠告，並且還時時批評繼他後任的宰相。凡新政府所採取的辦法，無論外交，內政，或殖民地的事情，他均批評。他的住宅弗得利斯魯（Friedrichsruh）變成爲特探醜聞及製造聳動人心之消息的人們特殊集聚所了。對這些人們他永遠不遲疑地說一些極令政府感到困難的事情。在另一方面，政府的措置其不足令人滿意的程度也與俾斯麥差不多。政府向帝國各代表發出公文宣稱：凡是前任宰相所發表的意見都不值得考慮。當俾氏長子在維也納結婚時，俾斯麥去了。德國政府竟發出那樣的通告，說：俾斯麥的老朋友們，薩克森國十及奧國皇帝，均拒絕與他見面，並且德國公使遠遠地躲着他。這個惹起了俾斯麥的憤恨。他在各地方都狂放地亂說亂講，並且幾乎是叛逆地。他不斷地顯示他自己是那樣的一位可憐人，一位心懷愛憤的人。甚至對於偶而來拜訪他的入也如此表示。他與魏拉（Henry Villard）（九九）談話時，他說他自己是「被踢出職位的」。魏拉先生試着勸告他，說服他，說：這種說法即使是對他自己也是不應當說的。而俾氏猶又憤怒地重說了一遍。

（九九）譯者註：魏拉（一八三五—一九〇〇）德國的新聞記者與財政家。

幸而當這位老宰相病得利害時這位青年皇帝藉機會，送給他極端熱情的信，並且用他的名字作為新海軍的一隻大戰艦的名字，當時還發表一篇適當的演說。因此，兩人又起始互相拜訪並具有好感了。

(100)

他時時得到進獻的禮品，足徵國家以及君主均未忘掉他的功績。在一八九八年他死了，全國的情緒又為之爆發，將那以往的令人痛苦的記憶永遠抹除了。除了帝國議會中一些極端份子而外，全國，以皇帝為首，都起立對他的遺愛表示敬重。當他的身體被運到他的最後安息地薩克森林地時，當全帝國各地都建立紀念物以追憶他一生中可以注意的時期時，或他的活動的狀態時，當最後國立紀念像在首都帝國議會前揭幕時，對他有無數的感謝與尊敬的表示證明，他的缺點是被遺忘了，他的功績是印刻在全國人的心中了，他的地位是安安靜靜地列於德國所曾出現的兩個偉大的國僕之一了。(101)

(100) 見 *Horst Kohl, Bismarck Jahrbuch* 卷五，第三四五頁。

(101) 關於石太因與傳斯夢的比較，見 *Dr. Nombauer* 在 *Horst Kohl, Bismarck Jahrbuch* 內，卷六，二四三頁及其下。這個比較是很用過一番心思的。並且用的方法也很聰明，因為著者編重兩人之相似點而不甚注意其差異點，並且一點都不斷了這兩位政治家以那一位為較優越。

六

當我們回顧俾斯麥一生的事業，在我們眼前現出他的歷史上的人格——偉大，可怕，如同用印度的或尼羅河上游的天然岩石所砍成的巨像一般。在這個像上顯出各種地層。中世紀的封建統治與責任觀念，非得利式的以專制君主為國僕的觀念，普魯士應居領導地位及德國必須統一的虔信，德國式的自由思想及所含的對於全體人民之依賴，美國的民主觀念以為必須有地方政府及一個聯邦——放任自由，保護關稅，專制主義，社會主義，保守主義，急進主義。從石頭上的紋理顯出來——在各地層都佈滿了不信任虛梭的感情主義及曼徹斯特（1848）的自由主義，蔑視喜歡破壞別人計劃的人，惱恨那些煽動的政治家——這些東西漸漸退化，乃變成為對立憲主義之厭惡了，並且甚至變成為對合理的自由之輕視了。

他的各種體質，集合在一起，賜給他強大的力量。他的大身量，他的腦，在他死後發現他的腦子比所知的與他同時代的人都大，他控制環境的自如能力，是騎士，是獵師，是喜歡山林的人，是一位天生

（1011）譯者註：Manchester 係指曼塔卡，曼德華（Edward Mouton 1601—1671）。他是英國的政治家，曼徹斯特的伯爵。

的領袖。(1011)

次一步再看看他的智質，我們首先要想起他的洞察力——他有一種技能，在任何情形之下或任何複雜錯綜的情形，能立刻辨明中心的事實——這是他能夠得勝利的理由。次一點，令我們注意的是他的遠見——這是一種能力，能夠知道如何地可以自然而然地將作事的原則產生出來，或者怎樣設法幫助牠們產生。就是由於這種洞察力與遠見，使他在克里密戰爭期間反對德國加入西部列強與俄國抗爭，使他在普法戰爭期間得到俄國中立，在丹麥戰爭期間也是這種品質引導他去抗拒皇帝，統治階級，及全德國去爲奧古斯敦堡人參加戰爭。並且還使他能夠爲普國得到什雷斯維——荷石坦及基爾港口，因此，而給德國愛國人士們一個新刺激。當他將奧國置於普國的下時，又是這種品質使他說服國王，軍隊與人民，抑制感情不以勝利作報仇之工具，並且使他能在普法戰爭時得到奧國的服從。德國惟一的目標是建立一個統一的德國，所以又是這種品質使他在整個的普法戰爭中，拒絕一切旁牽側掛，而祇向這個目標努力。

他的另一種智慧的品質是他的眼光寬闊。學問最淵博的英國歷史家阿克吞 (Aiton) 爵士說拿破崙比

(1011) 關於俾斯麥的腦子的大小及其重量，按照屍體解剖所得的結果，見 Gustav Schmoller, Vier Briefe, 見如上述。

擅擅還偉大。他下這個論斷特別根據一件事實，即這位法國皇帝不僅對於歐洲每個傑出的人有正確的認識——無論這個人在戰場或內閣，是贊成他或反對他，並且他早就佔定了他們每個人的能力，及預見出其將後的行動；並且，無論這位偉大的戰勝者是在巴黎，或在華沙，或在維也納，或在柏林，或在馬德里，而全歐洲的事情都圍着他轉。除了軍事的智識而外俾斯麥也有這同樣的一切品質。但他把握事實的能力更遠較拿破侖清楚妥當。並且他那種先見之明的巧妙能力更比拿破侖強得多多。所以拿破侖建立的帝國十年之間便完了，且使那些信任他的國家遭受無限的窮困與不幸。而俾斯麥所建立的帝國在重壓之下屹立四十年之久，並且力量愈來愈大，且給本國帶來繁榮，給歐洲帶來和平。(二〇四)

看一看俾斯麥的道德品格。我們早已看出，他的道德品質中的最主要的一個，織入他的整個的道德纖維之中的一個，是他的勇敢。在他童年時期，這點就特別顯著。無論他是領着同學作模倣戰爭的遊戲，或躍入深水去救他的傳令兵以免其被淹，或在進軍之時不顧生命與肢體騎馬狂奔，或在人煙稠密之區身無寸鐵就在出事地點與刺客互扭，這些都是他的天性的一部分。不過他後來把這勇敢的形態提高，成爲偉大的歷史形態，如他與議會鬥爭，敢於去接受斯德拉福的命運及使國王威廉與卡爾第一的命運相

(一〇四) 阿克吞爵士關於拿破侖的言論，在本書著者的自傳中曾有所敘述，見第二卷，四一四，四一五頁。

一致，如他不怕朝廷及黨徒的惡感，不怕全德國的，其實全歐洲的恨怒，而實行自己所信的愛國政策，如他自己擔負與丹麥戰爭的責任，又擔負與奧國戰爭的責任，又擔負與法國戰爭的責任。有一點必須直說，他雖然從來不暴躁性急，但是，有時他的勇敢竟墜到危險程度。可喜的是國家從來不需這個。因為他的勇氣有時是屬於亡命徒那一類的，屬於孤注一擲的賭客那一類的。這是一個問題，如果一個政治家不是為求國家的生存，而是為了一些別的事情，他是否有權像俾斯麥那樣有時以國家作抵押去賭成敗。並且，雖然他是那樣的勇敢，但我們必須說他的另外的一個偉大品質。這個是絕不可淹沒的，就是他的謹慎——他的「非常」的謹慎。他的事業正是一句警語的好例證——「要大膽，——要大膽：要別太大膽」。從以下諸點可以得到這種證據，他拉回他的國王及國家，不令他們陷入戰爭，而等待心理預備好時再開戰；他不立刻令小邦歸附帝國，而等待較大的邦有充分時間去反省；他忍受那些鄰國所作的使他痛苦的行爲。

從以下各點可以看出他的天才的特點——大膽與謹慎很適當地配在一起。他善看時機，知道什麼時候停止謹慎而起始用大膽，什麼時候停止用大膽而開始用謹慎。在這種交替之際，他的心靈的作用似乎是直覺的，但無疑的，那是由於他能够在可能的發生的事件之外更能多看幾步，及永遠將他們放在心中

而加以比較的這種驚人的才能所致。在許多次公開的談話中，都顯示出來他自己確已意識到他的這種天才。他說：「我在年歲不大的時候就是一個獵人與漁人。作這兩件事的原則是：等待恰當的時機。我便將這個原則用在政治上了。」他處理歐洲事件，每一次都是當那件事發展到最要緊的階段時他成功了。由這個事實可以作為他所說的話之明證。在他的事業中，我們找不到向西班牙出兵，向莫斯科進軍，在來比錫打仗，所以也找不到滑鐵爐。阿克吞爵士說拿破崙的能力是他能在任何時機，對於歐洲的人及情形有整個的瞭解。但是有兩件最要緊的事情拿破崙竟未能明白：第一，十年有餘的工夫他一直地在喚起他的敵人的愛國心；第二，他不斷地教他們如何地可以打倒他。

尚不止此，雖然俾斯麥是一個善於恨人的人，但是他從來不因為解恨洩憤而計劃或處置他的偉大的事業。拿破崙因為恨英國結果他瞎作起來，使他狂熱地推行他的大陸政策，因而在他的事業的中途發生了大禍患。而在俾斯麥的政策中便沒有與此類似的事件。

但是關於他的品格，與他同時的人，特別是英國人與美國人所下的判斷很責難他。人們攻擊他，說他欺騙他的敵人，特別是拿破崙第三。並且有一位英國論文家作得更過火，將泰尼松（Tennyson）著名的詩句

（一〇五）譯者註：Alfred Tennyson（一八〇九—一八九二），英國桂冠詩人，見原註。

應用在俾氏的事業上，但是刪掉了最後四個字。

「漪歎上帝，

有一人兮，

其心，其頭，其手，

若已逝之樸厚偉人，

一去兮永不再臨；

雖處芸芸之世間兮，

彼仍不減其貞賢，

或稱彼為貴族，民治者，專權者，

然彼實一善統治者，且不敢說言。」

不能否認，俾斯麥在他的事業中有許多時期，使用陰謀與策略，並且每一使用使佔上峰。並且真的，有些陰謀幾乎損及了他的名望。不過，祇就事實而論，無論外交方面或其他方面，政治家們從來未曾比他能够更澈底地不屑使用欺詐的。他自己很驕傲地宣稱道：「我從來未舉過撒謊，就是當外交官時

也不作那事」(一〇〇)他的驕傲使他討厭欺詐。這就是使他爲什麼那樣坦白的原因。他的坦白常常使他的同時的人爲之驚訝。無論公開地或私人地——他在佛蘭克府的綠桌上所發表的談話以及他的公文——他與拿破崙第三或亞歷山大第二或約賽夫(二〇七)的討論，或在柏林，維也納，巴黎，倫敦與政治家們之會見，以及他的家信，他都坦白地預先說出奧國所取的政策將要產生的結果，並且預先暗示他自己對於奧國政策所要採取的對策。他在佛蘭克府與維也納如同在柏林一樣，公開求奧國要改變她那輕視普國的故態。並且公開誓言除非奧國作這種改變，他一定將奧國逐出德國。就因爲這種坦白，才使拿破崙第三說他「成不了大患」，及狄士累利說：「留心那個人，他所說的就是他思想作的」。無論何時何地只要他演說，他便坦白地預告說：在權利方面假如奧國不對普魯士作適當的讓步，不滿足德國的希望，則一定引起戰爭。並且他將這種言詞會坦白地向奧國說過。他坦白地向拿破崙第三，向狄士累利，向亞歷山大

(一〇六) "Das Augen habe ich auch als Diplomat nicht gelernt" 見 Dohn 在 Bismarck als Erzieher 八頁，所引讀者。

(一〇七) 譯者註：Franz Joseph I (一八一〇—一九一六)，由一八四八年至一九一六年爲匈牙利國王及柏門(Bahmen)國王，及爲奧國皇帝。

第二，向當時一切領袖說出他要以普魯士爲領袖去建立統一的德國的野心。

常常有人攻擊他，說他只是利用真話以使欺騙人可以生出更大效果。在他的發言之中也許有這一類的瑕疵，但他的不可抗阻的驕傲使他討厭用避諱這一點，仍是真的。大概有一件事頗令人覺得奇異，不知他的動機到底是什麼。在普奧戰爭前一年，他與薩克森駐柏林公使的夫人女伯爵霍恩塔 (Hohenhausen) 有一次著名的談話。她坐在他的下位，她談諧地向他道：他願意引起戰爭嗎？他雖然知道他完全與奧國表同情，但他立刻答道：「是的」並且炫示說普國軍隊已經預備好了。她接右便問他道：「我有兩塊地產，一個在柏門 (Bohmen)，一個在來比錫 (Leipzig) 附近，你告訴我明年夏天我擇居那一處呢？」俾斯麥答道：「無論如何要住在來比錫的地產，普奧間的大戰將來大概是在你的柏門的地產附近打起來。」果然，俾斯麥的預言一點不錯。下面的事實告訴我們，甚至他的敵人也不相信他的話的用意只是在迷惑他們。因爲不久這位夫人便忠順地將他的話告知奧國的負責人了。而奧國使在她的柏門的地產附近集中軍隊。俾氏說這話的用意以爲人們不能相信他的話，或者也許以爲這話更成挑播奧國以使一定引起戰爭。但是在某限度之內，他的回答足以證明他真是極端不屑撒謊。這一類的事情在他的談話中常常出現，特別是在他自己的家中，在他自己的桌上。關於他自己的過去生涯，以及他的同僚們的作

爲，他均直言無隱，不斷地令人驚駭。(一〇八)

當他在議會作鬥爭時，也是如此。他的忠實往往幾乎流爲野蠻，並且有時還甚於野蠻。他生來便不喜欲說半真半假的話。普魯士的一句農家語「Ein Mann, ein Wort」足以表現他的感覺。與他同時代的偉人格蘭斯頓先生常常被人攻擊，說他故意說含糊話以爲退步之用。常常有人引用格氏的詭辯作爲笑談，特別是有人勸告一個重婚的人說他要格蘭斯頓先生去用巧辯將他的兩位太太解脫掉一位。倫敦諷刺家所說的諷刺語常常被人引用，那語是「格蘭斯頓能够在他袖子里藏四個骰子，而令他自己和別人相信那是上帝放在那兒的」。阿克蘭(Aolan)警告格氏說：「爲他的聲望着想，當於處理問題時，一定不可太機巧，不要牽扯到一些奧妙而不爲一般人所瞭解的意見——不要像毛里士(Maurice)那樣，而要更多的像惠靈吞公爵」。但俾斯麥的朋友從來用不着像阿克吞似地去警告他。許多人都知道狄斯累利有許多言談都是不真實的。爲他作傳的人必須將這一類的言論加以適當的潤飾。然而爲俾斯麥作傳的人使用不着這樣。(一〇九)

(一〇八)關於俾斯麥與女伯爵的談話，其詳細的敘述見 Kentell, Lismerck et sa Famille, 三二七頁。本書著者，在他的自傳之中，舉出各式各樣的例子，其坦白之處均與此相似，其中之「是」，"Affaire Kottin"。

(一〇九)關於阿克蘭的警告，見 Morley, Life of Gladstone。第二卷三六頁。

關於狄斯累利對於威實之通常的態度，見 Bryc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Biography。特別是關於格蘭斯頓及狄斯累利的文章。這本書的言論雖然很謹慎，但是依然清楚明白。

有人攻擊俾斯麥說他欺騙拿破崙第三。但平心而論，假如俾氏有罪，那他的罪是讓拿破崙去欺騙他自己。充其極也可以說，那無非是早已開始的戰爭中的一種戰略而已。固然無人承認俾氏具有石太因那樣倔強的忠實，並且也用不着否認他的事業中有許多次表現出他的雙重人格，例如他將奧倫堡 (Eulenburg) 伯爵逐出普國內閣便是一個具體的例證。石太因便不具有這種性格。然而整個地來看，俾氏一生都顯示着絕大的驕傲。由於此點，乃使他的外交行為坦白，公開，直截了當。

爲使此點更加明顯，我們可將拿破崙第一的外交與他對照。剛剛在締結卡姆波·否認條約 (1804) 之前，拿破崙給威尼斯上議院及法國五執政內閣的信件，對兩方面都充滿了謊言。在訂托楞廷歐條約之前的預備工作時，法迪坎的教皇之參事官們才發現他們的說謊能力如與拿破崙相比可太不足道了。拿破崙努力偽造文件，將他自己所應得的責罵均推到他的兄弟約賽夫國干的身上。(111)

關於俾斯麥處置他的敵手，最可令人攻擊之點可以說是他所採取的野蠻手段。他同朋友們以及不甚利害的敵人相處時是很愉快的，可是對那些惹惱了他的人，他能恨他們到極點。關於此點，最顯明的是

(110) 譯者註：一七九六年，法國遣三路軍隊攻奧，其一由拿破崙率領，趨阿爾卑斯山入意大利，以攻奧國及撒地尼亞。祇用一年期間，拿破崙平定北意大利，直迫維也納，奧不得已乃與之締結卡姆波·否認條約，時爲一七九七年。

(111) 譯者註：約賽夫爲意大利半島之拿那利 (Napoli) 國王。

他對魯德哈特(Rudhart)的行爲。魯氏是帝國議會中的巴燕代表。德國各邦除了普魯士以巴燕爲最強。這位代表具有極高尚的品格與極吸引人的品質。他的家系也頗有名。但是有一次他爲巴燕的愛國心所要求，於投票時竟違反了俾斯麥的意志。此後不久，他攜同他的夫人蒞臨俾斯麥的宴會，他竟在全體赴會人之前受到俾氏的斥責。這叱斥太利害了，並且所受的恫嚇太令人憤怒了，以致他立刻離開了相府，向政府遞辭職書。並且無論德國皇帝與巴燕國王怎樣安慰他，他仍離開了柏林。這種無理舉動對魯氏影響太深，雖然巴燕國王爲表示對於他的行爲之贊許任命他爲駐俄公使，但他竟失掉了他的理性。

我們用不着袒護這一類的事情。但是我們可以記着俾氏的這種舉動大都是由於過度的愛國熱情所致。假如我們回憶幾件事，我們對這種舉動的批判更要持寬大態度。在這些事件之中，有一件最爲顯然，即當他接見柏林會議的代表時，所表現的一幕。照例這些代表都是各大強國的最傑出的政治家。在土耳其的代表之中，有一位是屬於德國血統的。他在土耳其軍隊中得了顯赫地位，當然他是用土耳其的手段得來的。不管他早年在德國的生活是怎麼樣，而他現在却是居在高位的總督，具有外交的一切權利與自由，所以他與他的同僚走向宰相伸出手與他行握手禮。手是握了，可是握完之後，俾斯麥立刻命人取水與手巾在大衆面前洗他的手。(一一二)

(一一二) 有一位赴會(指柏林會議——譯者)代表，身份很高，他目睹此事，曾將這一幕情景，向本署記者敘說得十分詳細。

如果專就政治家的手段而言，如以他與其同時代的兩個偉人相比，必須承認他缺少加富爾所表現的首爲反對他的人充分設想的胸襟，也缺乏格蘭斯頓向反對者所常表現高貴的禮貌。

在這裏可以比一比這三個同時的偉大應付議會所取的一般的手段。此三人天資之不同無與倫比。格蘭斯頓外表動人，態度嫺雅，令人敬畏，聲調之優美足令聽者迷惑。他從將他的材料與議論處理得非常地好，表現得極爲嘹亮透闢。加富爾壯健粗矮。聲音不常悅耳，態度像個事務家，像受過土木工程師的訓練。他的議論直白，實在，線索井然有如以算學之邏輯所組成者——但是偶而忽然流利動人，並且因爲這種情形太少見，太真摯，故說話的效力也最大。俾斯麥身材偉大，威風凜凜，但其聲音高尖而不雄壯——他的態度很少時候對他的聽衆表現任何特殊友誼。他的演說材料，往往鬆散，混淆，特別自傲自大，常常譏刺人，並且有時還侮辱人。然而，在緊要關頭時他却能將聽衆操在掌心。他曾說過：「我們德國人祇怕上帝，此外別無所懼」。如與格蘭斯頓相比，在普通的情形下，俾斯麥與加富爾都不是演說家。雖然俾斯麥對於引用拉丁格言與農民的諺語，有驚人的妙技，雖然他與加富爾有時各用自己的方法，能像格蘭斯頓一般，準能達到聽衆的心底，但是格氏的響亮語句，及從魏吉琉 (Virgil) (111) 與

(111) 譯者註：魏吉琉 (紀元前七〇—一九) 爲羅馬詩人。

陸克雷手 (Turcius) (一一四) 所引用的華美成語，絕非這兩位大陸政治家所能比。這兩位都不能像這位偉大的英國政治家那樣，在平凡的題目上甚至在預算表中，能加上一些可愛的魔力。但可以說格蘭斯頓從來沒有像加富爾反對曼利巴爾的 (Garibaldi) 時，爲自己所作的辯護，或俾斯麥的赦免演說那樣深刻地打入全國人的心中。(一一九)

其次，人們常攻擊俾斯麥政策之不一致。他以先對於普魯士懷着一腔中世紀式的虔誠，對於奧國具着中世紀式的同情，但後來又轉變爲贊助德國憲法之自由與德國的統一。由於這種改變使他後來變成爲凡是他以先所反對的，現在他都以大的努力去贊成了。並且，後來他與他的舊政黨決裂，屢屢入黨，脫黨，以期獲得對於他的政策之擁護——這都是受人攻擊之點。然而所有這一切改變都是向着他既定的目標努力。對於這些攻擊，他的答覆是簡潔的。他說：「只要時機與國家的利益需要我與我自己相衝突，

(一一四) 譯者註：陸克雷去 (紀元前九六—五五)，羅馬詩人。

(一一五) 關於俾斯麥與格蘭斯頓對於議會的態度與方法，及其個人的特點，本書作者所取的材料，大部分都是取之他日記的風憶，及與俾格兩人相接近的人們的建議，關於加富爾，所取的材料完全是取之於與他有密切關係的同事之口述，特別是尼哥拉 (Nicola) 培盧齊 (Portusi) 奧明該提 (Minghetti) 三人所口述者。

我使如此作去」。他又說：「假如有人向我說：『在二十年前你與我是一條心，現在我的意見還與以先一樣，但是你却正相反了』，我將答他道：『是的，在二十年前我與現在的你是同樣的聰明，可是現在我更聰明了，因為在這二十年間我已學了一些東西』。』沒有比這個更清楚的了，凡是他的見解之改變，都是以謀國家的最大利益為準，所以政策也隨之而改變。我們應當記在心中自他握政權之後，他再不是屬於一黨一派的人，而是屬於國家的人了。他常常地說：他的黨祇有兩個黨員，一個是國王威廉，一個是他自己。與格蘭斯頓一樣，從青年到成年，他的政見整個地改變了。與加富爾一樣，他以為對國家最有利益的是利用各黨之長。他從國家自由主義者變成保守主義者，並從自由貿易的理論變成爲保護貿易，這種大的改變都是根據他所認爲的國家的最高利益。

但是還有些攻擊他的人所根據的理由要比以上各種理由有力。譬如，他從心不相信合理的自由，他所認爲的最好的制度是專制的，他所喜歡的方法是獨裁的。他已準備好了，只要有人挑惹他，只要有人挑惹他便將憲法的自由奪去一部分或整個地毀了，並且凡是對於憲法的自由這一類的事，他都不像加富爾那樣具有好感。任何相信用自由方法去使自由得到發展的人，都在加富爾與格蘭斯頓的身上發現他們兩人均不肯破壞憲法上所載的權利，均討厭專制；均堅信用較好的人與較好的方法，一點一點地演化；

均肯允許合理的自由。這些點使他們超過了俾斯麥。最近有一位作家提到加富爾臨死時部一幕人所週知景象。當加氏作最後呼吸時，他請求他的君主用憲法的方法，而不要用包圍式的壓迫方法，並且對意大利及西里下部的人民要有忍耐不可操之過急。真的，這是忠實，希望，與仁慈的表現。並且表現的極高貴動人。以加富爾的整個事業而論，他對於高貴的人道思想的同情心比俾斯麥大得多。並且，他們兩人整整相反，加富爾是自由的信徒，而俾斯麥則是威權的擁護者。然而當於我們承認在這方面加富爾比俾斯麥為優越時，我們不能仍然可以為俾氏再找出一些可取之點麼。在我們自己的共和國內，似乎很少考慮到權威。在獨立宣言之中曾主張三種權利，第一個便是生存權。但這個權利常常被損害，並且比任何其他文明國家，都有更多的免除刑罰的待遇，並且有許多戴着自由的假面具的出產特許證，將法律的尊嚴給除掉很多，我們能不羨慕俾斯麥那種堅決擁護威權的態度麼？（一一六）

（一一六）W. R. Thayer 於一九〇九年三月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中發表一文，對於加富爾與俾斯麥的政治特點方面，有一個很好的比較。在我們自己的國家中（指美國——譯者），在最近十五年中，對於重安犯罪罪所作的統計，顯示出來，在此期間殺人的罪犯所增加的數目，每年由三千左右增加到一萬左右，而犯殺人罪者，每七十人中尚不足一人能得到嚴厲的刑罰。見芝加哥論壇（Chicago Tribune）所發表的統計數目，在與上述之同一期間每年最末一日所刊佈者。

最後有一點，令觀察他的事業的人們都覺得困惑難解，就是他的宗教。要想將這一點略而不談，就像談克倫威爾而忽略了他的宗教一樣。祇於提一提不夠的，必須多說一些。因為牠在他的思想的經緯中佔很大一部分。在某種程度之內，牠是值得研究的。因為無疑地，在他的整個生命中那樣顯然的責任感便是由宗教而生。

「道德觸動感情是為宗教」，這種宗教的定義，是不能應用到俾斯麥身上的。關於他的宗教，我們所知道的要比其他大部分政治家多得多。因為他與議會鬥爭時，及在危難期間，在與他的最親近的人們的信中，不斷地流露他的宗教觀。有一次他談到他的早年生活，他說，「有許多時間我陷於無可救藥的絕望，相信我與別人的存在都無目的無用處。我們大約僅是造物主偶然發散出來的東西，就如同在滾輪下的塵土，飛起又消滅了。」後來，我們從他給他的夫人的信中看到，他整個地將這種看世方式改變了——有許多表示，表示對他早年的放縱生活之懺悔，對於較好的將來之渴望。

對於這些個，他有時攙雜一些神學的討論，特別在「信仰與工作」的討論中，他引證許多章句以顯示工作的價值，他完全站在反對路特的立場。路特由於他的信仰之熱忱曾稱聖·詹姆士 (St. James) 的使徒書為「一個草包使徒書」。俾氏說：「我發現詹姆士的使徒書是一部偉大的書」。他敢於堅信自己的

信仰。在他的回憶錄中，他舉出他與攝政王卽後來的威廉第一皇帝的一段談話。這位攝政將「敬神者」(二一七)一詞加於某位傑出的人物。凡是那些能像著者這樣，尙能記憶「五十年代」時的柏林的社交情形，當然能記得，在好的、穩健的德國家庭之中，敬神者這一詞都是暗指那些虛偽的信仰者而言。在方才所提到的這個時機，俾斯麥立刻使替「虔敬派」作辯護，並請攝政王說出理由，這個使攝政王摸不清是怎回事了。(二一八)

凡關於宗教信仰的事，他從來不保持緘默。此點是與加富爾相一致的。格蘭斯頓喜歡華美的形而上學，但俾斯麥比他差遠了。

他給他的岳母信中常常提到他的宗教感，他所用的名詞，像似英國國教的「宣傳福音者」所用的。這些信表示：當他在大學讀書時他曾丟掉了的他幼年的新船儀式，現在又恢復了。在萊茵旅行時，他的衣袋中常帶一本新約。與法國戰爭期間，他常讀麥輪文派(二一九)所每天發行的聖經原文。當他在塞丹荒

(二一七)譯者註：Trost 字面爲成品的教徒之意，而實指保指教派或成者而。

(二一八)俾斯麥與這位未來「普蘭於一虔敬派」之談話，見 Truchatz 編刊的，英文譯本，俾斯麥的回憶錄 (Reflections and Reminiscences)，三卷，二二四、二二五頁。

(二一九)譯者註：麥輪文派是基督新教的一派，信仰胡塞特的教義。爲麥輪 (Mahn) 的移民者在薩克森所創立的。

忙地離床去會見拿破崙皇帝時，在他床邊做着一本聖經，那是他在前一晚所曾閱讀的。

有一封給他夫人的信，他說，「晚安，親愛的。已十二點了，要上床去讀彼得第二部第二章。我現在正作有系統的閱讀，等我讀完彼得第一部，我便讀希伯來使徒書」。當他讀新約時，他表出他的特別感觸，說道：「我的敵人饑餓瀕死的時候，我想我能願意去給他食物，但是要爲他祈福——即使我能够作，也不過是循例照行而已」。他更有一個比這個還發自肺腑的話：「用不着提醒我爲我們的親愛的小馬利祈禱。我每天都爲她祈禱。」

甚至就是在他一生中的最危難期間，他也是每年參加兩次聖晚餐。並且在參加之前，一定讀經及祈禱以爲準備。然而就是對於這個，他也表現出來他的老的俾斯麥的脾氣。當他與議會相鬥爭時，有一次他與普魯士演說家文克(Vincke)相決鬥。他的牧師勸導他不要決鬥，但俾斯麥用理論將他說服，並且強迫他不僅爲他祈禱，並且還要爲他主持聖餐。這個是頗與牧師的意志相違的。關於這個決鬥，俾氏曾給他岳母一封信，述說這件事，頗能表示出他的個性。他說：「我覺得與死相距很近，並且已準備去死。我相信這種感覺對我很有益處。我知道對這點你不能贊同我的觀點。但是在這次決鬥，我信賴上帝的意志並且完全順從上帝的意志之堅決程度爲以往所從未見過。我的敵手提議，假如我肯爲我所說的話表示

敵人，便可不決鬥。但我不能如此，因為我的話是按着真理而發。於是各就各位，雙方開鎗均未射中。我未能立刻認識上帝的寵眷是一件嚴重的罪過，但我的上帝或許原諒我了。然而我不能否認：當我從鎗煙之中，看見我的敵人直條條地在那站着時我便生出一種不安之感，使我不能去加入一般人一同歡呼高興。我準備繼續這場爭鬥。但是因為並非我開，所以我無言可說。……我一點不猶疑，我必須去對付我的敵人，不過是否我應當鎗殺他，這個，在我心中到是不很清楚。我作這件事情並無害人之意，因此並未射中。」

在十年之後，他向傑出的病理學者魏爾效（Virchow）教授挑戰。當時有一位基督教的朋友諫誚他。他寫道：「關於魏爾效這一類的事，我用不着與肉和血去商量，因為我已經過了與肉血商量的年齡。假如我要犧牲我的生命去作任何事，我只是在上帝之前作懇切的虔心的祈禱，這個是不能因為人的話所能推翻的。我之所以肯以生命作犧牲，那是根據我的信仰，這種信仰是我從多年的嚴重鬥爭中獲得的，並且也因這些鬥爭而使我的信仰更加强了。」

還有一件令人可注意的希奇事，就是他在佛蘭克府時，爲了聯邦而與奧國公使在每一點上都相爭鬥。以戰爭相威脅，挑惹奧國與普國相戰，與普勒爾士（Prokesch），雷須倍（Raebberg）及其他人們

相決鬥，完全是天不怕地不怕，儼然不顧利害。然而從他給他的夫人的信看來，則對她的宗教勸誡完全服從。她很懷疑在佛蘭克府的那一類的新教派，因此便勸他到嚴格的路特派的教堂。他一再向她保證並且說：「前天我曾參加此地的路特派教堂——這位牧師不是一位有特殊智能的人，但是一位信仰者。參加的聽衆，除我而外，整整二十二位婦女。」更出奇的是，雖然他告訴他的夫人，說有一位牧師「並不能從他得到大的安慰」，但是他仍然宣揚這位牧師的名字，並且與他談話。這位牧師變成德國的名人了——從北海到阿爾盆 (Alpen)，從萊茵河到美美河 (Memel) 都嘲笑他。他成爲諷刺家的得意材料了。

他是克那克 (Knaak) 牧師。因爲他宣講太陽圍着地球而運行的理論，使他名聲大噪。他的理論是以聖經爲根據。他與我們的顯赫的愛國志士賈士頓 (Jaspert) 同樣地出名，因爲賈氏也是以聖經的道理證明「太陽是動」的。在俾斯麥事業之末年，他認爲牧師的範圍應當更趨寬闊。他更不喜歡老的路特派的神學家了。他稱他們爲「小暴君」，並且說：「每個牧師都是一個小教皇」。他反對卡爾文 (Calvin) (110)，特別是關於火燒塞維徒斯 (Servetus) 一事，他最反對。他贊同非得利大王主張：「讓每個人以自己的方

(110) 譯者註：加爾文(1509—1564)，法國人自成一教派，視路博，跳舞，裝飾爲惡事，主張每人每日應作禮拜。此派分佈於法，荷，英，瑞，德。

式走入天堂」的宣言。他又給基督教下一個實際的界說，他說基督教「並不是禮拜堂裏的牧師們的朝廷所發出的教條」。(二二)

如果將俾斯麥的宗教與他同時代的另外兩個偉大的政治家相比，覺得他們互有不同。他的理論以及他的談話都沒有優美組織的推論與論證。使阿克蘭 (Thomas Aelard) 警告格蘭斯頓去避免使用毛里士之方法的那種組織優美的推論，俾氏是沒有的。格蘭斯頓能運用智慧的手段，去克服內普頓 (Nepom) (即海神——譯者) 的三叉戟與三位一體 (即聖父，聖子，聖靈——譯者) 兩者間的玄妙關係。而俾斯麥是沒有這種智慧的。至如與加富爾相比，二人也不相同。加氏在早年期間所作的溫和的關於自然神教的言論，及他在死床上所作的祇要在形式上求得輿論之統一的勸言與俾斯麥的粗陋的路特主義截然不同。就是在他的晚年，兩者仍然距離極遠。(二三)

(二二) 司佩特 (Speeth) 曾從俾斯麥給他的夫人及其胞妹的信中及其他文件中，將俾氏對於宗教的意見，及與宗教的關係，作一優美的概述，請看 Prof. Adolph Speeth, Bismarck as a Christian。關於他晚年時，他的宗教趨向，由窄而趨寬闊這一點，見 Bismarck, Our Chancellor, 第三章。

(二三) 關於格蘭斯頓對於內普頓的三叉戟與三位一體說的玄妙關係之疑惑，見 Juvenius Munda, 關於加富爾早年的宗教觀及以後的發展，見他給他的姑母的信，及其他文件，請看 Herli, Cavour avant 1848, 第十九章。

他的日常生活與清教徒的理想很不一致。他說：「在英國與美國那樣地過星期日簡直是一種可怕的虐待」。並且，當布赫 (Lothar Bucher) 替英國式的星期日作辯護時，俾斯麥說道：「我不是反對過星期日。恰恰相反，因為我是一個地主，我要盡我力量之所能及去過牠。……在星期日不工作，這並不算太過，在星期日工作是反對上帝的命令，因為人們都需要休息以恢復疲乏」。在事實上，凡在俾斯麥的田地作工的工人如果工作不急需時他們在星期日可不工作。當他在佛蘭克府當大使時，他在星期日避免用他的馬車，以便他的僕人可以去教堂。

在與法國戰爭期間，他在費列爾 (Friedel) 的羅特士爾德 (Rothschild) 宅第，向許多不信有上帝的人說道：「假如我不是服從上帝並且依賴他，我一定不管塵世間的事。……假如我不是為上帝而必須盡我的職分，為什麼我要憂愁，使我自己苦惱，和辛辛苦苦，使我自己忍受煩擾與虐待呢？假如我不信任天神，而天神又註定德國一定要作些偉大的事業與好事，我將立刻放棄我的外交官的地位，或者我將永遠不作這種工作了。」

三年之後，他在普魯士議會說道：「無論何時，國家的根本如受到防害，及受民主主義的信仰者攻擊時，我認為去站在這縫隙之間乃是我的職分。……這是我的基督教與我的信仰命令我去作的。」

在此要提一提俾氏的家庭生活。那是頗堪贊美的。在他之前有位顯赫人物——哈敦伯(Hardenberg) (二二三)。他的家庭生活很暗淡。但俾斯麥則不然。他與他的夫人，妹妹，兒輩間的關係，就其信中所表現的看來，真是理想的。許多朋友都知道他的整個家庭生活特別美滿。對每位客人都給以美的印象。並且也給全帝國以良好的道德影響。(二二四)

當他在佛蘭克府時，工作很為煩雜，情況令人煩擾不安，他寫道：「在我結婚之前，多年以來，我的靈魂遮滿了冷落與寂寞，但上帝賜予我愉快的婚姻與兒輩，他們對於我如同彩虹，如同在一大陣冷落與寂寞之後的清靜的禮品與保障一般」。

在他的性情之中，很奇怪地混和着兩種質素，一是奉行淡泊主義，一是縱樂的。無論在戰鬥期間或和平時期，他所遇到的堅強反對，考驗，艱難，其次數之多，及程度之甚，無人能及，然而在他的身上仍具有他的波羅的海岸的祖先的嗜慾。像他的祖先一樣，他是一個剛毅的保守者，並且對一切侵犯他的

(二二三) 譯者註：哈敦伯(一七五〇—一八二二)普魯斯政前家，與石太因同時，請參看拙譯之石太因，中德學史三卷二四。

(二二四) 關於他在佛蘭克府及其他各地之生活，見 *Moltke's Correspondence* 及 *Kendell* 及 *Abeken* 等通譯集，其中均有生動的描寫。

人均作疊掘壕抵抗之。爲了這個他出了很重的代價。在他晚年，他患顏面神經痛，使他很受苦惱。特別以口部爲最甚，幾乎使他不能張嘴。他常常說笑道：這是十分自然的，因爲吃，喝，說，都用嘴，所以牠的嘴所作的罪過很大。他特別嗜食雕鳩卵，每一餐常常吃十五枚。有一次他在飯館中吃了一百七十個蠔類，使飯館的侍者都驚訝了。他對於食物的過度縱慾，是那樣地著名，人們稱他的莊宅克尼破夫 (Kniephof) 爲 Kneiphof (狂飲院)。當他向他的老同事格耐斯特 (Gneist) (1125) 訴說他的病苦及不幸時，格氏送給他一打強烈的布爾工省 (Burgund) 造的烈酒，並告訴他每天吃中飯時飲兩杯，以爲補身之用。後來俾斯麥抱怨說，那酒對他並無好處。於是格耐斯特便問他如何飲法，他說：「如你所告訴我的，每天中飯喝兩瓶」。與這個相聯繫的，大概也可值得注意的是在他辭職之後，從柏林宰相府向他的菲得利斯魯田莊送三千瓶酒這件事。大部是別人贈他的禮品，都是從德國中部，南部各地最好的製葡萄酒的地方製造的。

但在他身上也具有溫雅的特性。當他在他的森林中時，他最快樂。對於他的最佳美的樹木，他特殊愛好。對於林中的鳥雀，他具有一副與路特相似的眼光。與路特一樣他對鳥具有異樣的觀察。在菲得利

(1125) 譯者註：一八一六—一八九五，德國的政治家及法學家。

斯魯時有一天他說：「今天噪林鳥開會，大概春天快來了」。於爲他便想入非非地形容鳥雀是在作些什麼，大概說些什麼。又有一天，在發爾津他看見樹上的白嘴鴉，他乃記述他們的行爲——牠們怎樣教導牠們的小孩去飛翔，如何地領導牠們到海邊換空氣換食物，並且「像有地位的人一般在冬季要在城中找一個別墅」，就是在鄰近的教堂塔中。最有趣的是在憂斯太因 (Garten) 一天早晨，他在公園中閑遊，他對於住在園中的各種鳥的家庭生活是那樣的發生興趣，以致他竟完全忘了並且整個地忘掉了與德奧皇帝相見的事，而他去見皇帝又是特別重要的。

他的整個戶內生活，有一特殊安慰他的力量，就是他對於音樂的愛好。他最喜歡貝多芬 (Beethoven) (二二〇) 的音樂。他的夫人奏樂的技術很好，他非常能欣賞。當他工作緊張到使他的神經差不多到不能忍受時，音樂對他很有幫助。一般好說閑話的人常說，德國駐羅馬公使開德勒 (Kendell) 所以能夠對俾斯麥有大的影響，並不是由於他的外交才能，而是他善於解釋德國音樂的傑作。(二二七)

最近有一位作家說，解釋俾斯麥生活的惟一方法是認他爲一個幽默家。當有人疑惑不決不肯立即承

(二二六) 譯者註：一七七〇—一八二七，德國最偉大的作曲家。

(二二七) 關於他喜歡戶外生活，見 Ernst Wilhelm 等人所著的書：關於他對於音樂的愛好，特別請看 Kendell 的書。

認普魯士的領導地位時，俾斯麥巧妙地以幽默口氣說道：「普魯士政府就如同一件法蘭絨襯衣，起頭感到不快，可是以後却很舒服」。當他早年時，他曾表示出令人可怖的幽默，甚至就在議會鬥爭中也是如此。有一個革命家反對俾氏說道：「假如你的黨勝利了，你將要把我放在你的翅膀之下，假如我這方面佔上風，我也將同樣地對待你」。俾斯麥答道：「你那黨如果得勝，活着將要一點意思都沒有，必民不聊生，假如我們得勝，每天所議的事就是如何吊殺你們——不過要非常地溫雅，一直到絞架的根部都要充滿了溫雅」。他的機智也是刻薄的。當他提醒奧古斯教舉人時，他說：「普魯士能够扭扭她所孵育的小雞的脖子」。當他立凡爾賽條約時，他的幽默是殘酷的。特別當於兩位傑出的演說家鐵爾與糾利斯（Jules）想要利用動人哀憐的口才去說動他時爲更甚（二二八）。他的談話常常帶着憂鬱的調子。這個因他的機智而能將所進行的事賦與一層幽默的色彩，否則便要太呆板，太莊嚴了。然而當他認爲他不能阻止國王在戰勝之際進兵維也納時，那種失望的情況，如忠實的布史（Büchel）所描寫的，却將他最深的感觸揭示出來了。

他的機智——特別在他的信中，與在桌邊與人談話時，時時顯現；他的幽默——甚至在公文中也放

光彩；他的鋒利之言詞，全國皆知——其中固然有許多憤世嫉俗的話，有一些不公正的話，然而其中之能鼓舞人心，指人路徑，增強各地愛國志士之力量者，亦復不少。但是，一切事情的根本點，由他全部工作，一直到他的勞績的末尾，都充滿了深沉的嚴肅。這種嚴肅，祇有從盡職與負責的觀念方能產生。這是保持政治人格的堅固的基礎，最低限度也足以使德國，其實使歐洲不受到無理的紛擾，並且給俾斯麥在歷史上一個位置，一個自路特以來的一個最偉大的德國人的位置。

專名詞譯音表

專名詞譯音表

A

Aachen	阿痕	Androssy	安德拉喜
Abraham	阿布拉罕	Arndt	阿倫特
Acland, Thomas	阿克蘭	Arnim, Harry von	阿內姆·哈利
Acton	阿克吞	Auerstadt	奧爾士大特
Alexander	亞歷山大	Augustenburg	奧古斯敦堡
Alpen	阿爾法	Anrelius, Marcus	奧雷流
Aison	阿爾森		

B

Babelsberg	巴勃勒斯忒	Blome	柏禮木
Baden	巴登	Blucher	布蘇歇
Balkan	巴爾幹	Böhmen	柏門
Baneroft, George	班羅夫特	Bouaparte	博拿帕特
Baitenberg	巴伊特	Bonn	撥恩
Beacon-field	比波夫	caux	柏爾多
Beethoven	貝多芬	u	波斯頓
Belfort	貝爾福	naki	步爾巴其
Benedetti	貝內得狄	carbon	布爾邦
Benedict	貝內的克	Brandenburg	勃蘭登堡
Berst	標斯特	Branschweig	布勞史恩外
Biarritz	比阿利茲	Bremen	布雷門
Biese	比色河	Breslau	布萊斯勞
Bingen	賓根	Bucher, Lothar	布赫
Bismarck-Schönhansen, Otto v	俾斯麥-仙豪森·奧	Bunsen	本森
	古	Burgund	布爾工
Black Sea	黑海	Burnsidi	柏恩賽德
Bleichroeder	布萊喜羅得	Busch	步史
Blind, Carl	布林德·卡爾	Butler	巴特勒

C

Caesar	愷撒	Carneillé	卡奈耶
Calvin	卡爾文	Caroline Islands	卡羅林群島
Cambridge	康橋	Castilna	卡德里那
Campo Formio	卡姆波·西謨	Cavour	加富爾
Carlos	卡爾羅斯	Cleveland, Frederick A	柯李威爾·非得利亞
Carlyle	卡來爾	Cohn	柯恩

Columbus	哥倫布	Cornica	科爾西卡(島)
Congo	剛果河	Conreel, M. de	庫賽爾
Corday	科對	Cromwell	克命威爾
Cornell	科內耳	Czaslau	寨斯路

斯 D

Dante	但泰	Dresden	德雷斯登
Danton	丹敦	Duppel	度浦爾
Darseli	狄斯累利		

E

Elbe	埃爾貝河	Erlangen	愛爾根
Eldena	愛爾登拿	Ermland	愛爾姆蘭
Elsass	埃爾薩斯	Ernst-August	安斯—奧狄
Ems	埃木斯	Eugénie	厄熱尼
Erfurt	艾府	Eulenburg	奧倫堡

F

Falk	法爾克	Franz I	凡慈第一
Favre, Jules	法大爾	Franz Joseph	凡慈·約賽夫
Ferdinand	斐迪南	Freiburg	夫賴堡
Ferrières	費列爾	Friedland	夫利得蘭
Florenz	佛羅倫斯	Friedrich der Grosse	弗得利大王
Follen, Carl	否楞·卡爾	Friedrichsruh	弗得利斯魯
Frankfurt am Main	邁恩河畔的佛蘭克福	Friedrich-Wilhelm der Grosse	弗得利—威廉大皇帝

G

Gagern, Friedrich von	噶哥爾恩	Goethe	歌德
Gambetta	甘普塔	Gortschakoff	哥查科夫
Garibaldi	莫利巴爾的	Gotha	歌塔
Gastoin	莫斯大因	Gottengen	格廷恩
Gibraltar	直布羅陀	Girumont	格拉蒙
Giers	蓋爾斯	Grant	格蘭特
Glessen	基森	Granville	格蘭維爾
Gladstone	格蘭斯頓	Gravelotte	格拉維洛特
Gneisenau	格耐色瑙	Greifswald	格萊福華
Gneist	格爾司特		

H

Habsburg	哈勃斯堡	Heidelberg	海岱堡
Hahncke	韓克	Hessen	黑森
Hamburg	漢堡	Hessen-Darmstadt	黑森-達姆城
Hamilton	漢米爾頓	Hessen-Kassel	黑森-卡賽爾
Hannover	漢諾威	Hohenzollern	霍恩羅
Hardenberg	哈敦伯	Hohenthal	霍恩塔
Harnack	哈爾克	Hohenzollern-Sigmaringen	
Hatzfeldt	哈茲費特		霍亨索倫-西格馬林根
Heeren	黑倫	Holstein	荷石坦
Hegel	黑格兒		

專名詞譯音表

I

Isabella	伊薩伯拉	Ismail	伊斯麻爾
----------	------	--------	------

J

Jacobi	雅克比尼	Jona	耶拿
Jacobin Club	雅克賓俱樂部	José	若瑟
Jackson, Andrew	食克松	Johann	約翰
Jasper, John	賈斯頓約翰	Jeterbog	俞特伯

K

Kant	康特	Knuk	克那克
Kari I	卡爾第	Knuophof	克尼威夫
Kassel	卡賽爾	Kohl, Horst	高爾
Kelly	開利	Kolu	可洛
Kondall	開德勃	Konigsberg	科尼斯堡
Kiel	基爾	Kotzebus	寇次布
Kirkpatrick	基克派拉克	Kullman	庫爾曼
Kissingen	基興恩	Kurland	庫爾蘭

L

Laibach	萊巴和	Leo	雷歐
Lasker, Eduard	拉斯科·愛德華	Leopold, Otto Eduard	雷歐波德
Lausselle, Ferdinand	拉薩爾	Lotten	雷特
Lateran	拉特蘭	Lieber, Francis	李波爾
Lausenburg	老恩堡	Ligny	林尼
Le Maus	雷蒙	Lincoln	林肯
Ledoehowsky	雷多科夫斯基	Lincoln Burr, George	
Leipzig	萊比錫		林白爾·喬治
Lenz	楞茲	Lombardei	倫巴底

三

	London	倫敦	Labeck	呂貝克
	Lothringen	羅丁根	Lucca	盧卡
	Louis XIV	路易十四	Lucretius	陸克律土
俾	Louis Napoleon Bonaparte	路易·拿破崙·博那帕特	Luther	路特
			Lützen	呂岑
斯	Lourdes	盧爾德	Luxemburg	盧森堡

M

	Maas(Meuse)	馬司	Memel	美美爾河
	Macmishon	馬克凡敏	Menzel	門澤爾
	Madrid	馬德里	Methuen	梅特溫
	Magdeburg	馬德堡	Metz	美次
	Magenta	馬根塔	Mexico	墨西哥
	Mann	曼恩	Milano	米蘭
	Manenoster	曼嫩斯特	Minghetti	明該提
	Manifield	曼菲爾德	Molona	摩得拿
	Marsé	馬拉	Molke	毛倫
	Marcus Aurelius	馬庫·奧利利	Monroe	孟羅
	Maria Theresia	馬利亞·特西亞	Mont-Valerion	蒙特—瓦雷遜
	Marungon	馬里戈	Montague, Edward	蒙塔古—愛德華
	Mars la tour	馬斯·拉·圖	Motley, John Lothrop	摩特利
	Mary	瑪麗	Motz	摩次
	Massachusetts	馬沙諸士	Mouster	摩斯德
	Mathias	馬提亞	München	明興
	Maurice	毛里士	Münster	敏斯德
	Maximilian	馬克西米廉		

N

	Napoleon	拿破崙	Niger	尼吉爾河
	Napoli(Neapel)	拿波利	Nigra	尼格拉
	Nassau	那蘇	Nikolaus I	尼克老斯第一
	Noptun	內普頓(海神)	Nikolsburg	尼克爾斯堡
四	New England	新英格蘭	Nil	尼羅河
	Newton	牛頓	Norddeutscher Bund	北德意志聯邦
	Nico(Nizza)	尼斯	North Sea	北海
	Niederrland	荷蘭	Novara	奧瓦拉
	Niemen 見 Memel			

O

	Oldenburg	俄爾登堡	Orléans	俄賴安
	Olmütz	俄爾木次	Ostsee(Baltic)	東海

P

Paderborn	巴德博	Piedmont	別蒙
Padua	巴多瓦	Pius	皮由斯
Palatin	巴拉丁	Poltava	波爾塔瓦
Palm	柏爾穆	Pommern	波美倫(省)
Palmerston	巴麥斯頓	Pompon	彭培森
Paris	巴黎	Portugal	葡萄牙
Parma	帕馬	Posehinger	波星格
Parlson, Friedrich	帕爾森	Posen	波森
Payson Evans, Edward	裴森·伊文斯·愛德華	Potsdam	波茨丹
Petar aer Grosse	彼得大帝	Prag	布拉哥
		Prokosh	普勒開士

專名詞譯音表

R

Rabelais	拉伯雷	Roseoe Jhayer, William	羅斯扣·李爾·威廉
Radziwill	拉濟威非	Rosbach	羅斯巴何
Ranke	蘭克	Ross	羅西
Rochberg	魯爾伯	Rotenschul	羅特！爾德
Rhona	萊茵	Roussau	盧梭
Rohespierre	羅伯斯庇爾	Rudhart	魯德哈特
Roland	羅蘭	Rudo	魯爾
Roma	羅馬	Rudloff	魯勃夫
Romanoff	羅曼諾夫	Russell, Odo	羅素·奧夫
Roon	魯恩		

S

Saalfeld	賽費爾得	Schiller	席勒
Sachsen	薩克森	Schlenormacher	世萊瑪哈
Sadowa	薩多瓦	Schlesien	施雷仙
Salonica	薩羅尼卡	Schleswig	什雷斯維
Salzburg	薩爾次堡	Schlozer	施雷則
Samoa	薩摩亞	Schmitt	施米特
Samson	參孫	Schurz, Carl	舒爾茲
Sand	散德	Schwarzburg-Soudershausen	五
San staufano	聖·斯泰法諾	S. 古堡—保德樂森	
Sardinia	撒丁尼亞	Schweiz(Switzerland)	瑞士
Savagay	薩文宜	Seotland	蘇格蘭
Savoie	薩瓦伊	Sodaa	塞丹
Scandinavia	斯堪的那維亞	Sorvotas	塞維徒斯
Seharuhorst	沙里赫爾斯	Soward	西華德
Schill	席爾	Shukoepara	莎士比亞
		Sheridan	射利丹

	Siberia	西伯利亞	St. James	聖·詹姆士
	Simson	西木孫	St. Petersburg	聖·彼得堡
	Sizilien	西西里	St. Quentin	聖·康廷
普	Solferino	索非里諾	Strafford	斯特拉福
	Sparta	斯巴達人	Strassburg	斯特拉斯堡
斯	Spieheron	石庇協爾恩	Stuart	斯丟阿特
	Spinoza	斯賓諾莎	Stuttgart	斯圖加德
	Squeers	斯奎爾斯	Sultan	蘇丹
麥	Stein	石太因	Sybel	徐貝爾
	Stendhal	石騰達爾	Syria	敘利亞

T

	Teba	代巴	Tolentino	托楞廷歐
	Tennyson	泰尼松	Toscana(Tuscany)	多斯卡納
	Thiers	鐵爾	Tulleries	推勒里
	Thuringen	圖林根	Tunis	突尼斯
	Tilsit	梯爾西特	Turgot	丟哥
	Times	泰晤士		

U

Unter den Linden 菩提樹下路 |

V

	Varzin	發爾津	Villard, Henry	魏拉·亨利
	Vatican	法迪坎	Vineke	文克
	Venice(Venezia)	威尼斯	Virchow	魏爾敦
	Versailles	凡爾塞	Virgil	魏吉威
	Villafranca	維拉夫朗卡		

W

	Waldensee	瓦德西	White, Andrew Dickson	懷特
	Warschau	華沙	Wien	維也納
	Wartburg	瓦特堡	Wilhelmstrasse	威廉路
六	Waterloo	滑鐵盧	Wiedthorst	文德和斯特
	Weimar	威瑪	Wittelsbach	維特路斯巴和
	Weissenburg	外森堡	Worms	威爾司
	Wellington	惠靈吞	Worth	邁爾特
	Wendell Phillips	文得爾·菲利浦	Wrangel	吳郎爾
	Westfalen	維斯特法倫	Wurtemberg	魏登堡

Z

Zurich 促里喜